

巴西足球唯一正史

企鹅（英国）出版集团出品 致敬巴西世界杯扛鼎之作



足球王国

巴西足球史

Futebol Nation: A Footballing History of Brazil

【英】大卫·戈德布拉特 著
搜达足球 译




中国长安出版社

 指文图书

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

【英】大卫·戈德布拉特 著
搜达足球 译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 / （英）戈德布拉特著；搜达足球译．—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107-0712-4

I. ①足... II. ①戈... ②搜... III. ①足球运动—体育运动史—巴西 IV. ①G843.97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5021号

Futebol Nation: A Footballing History of Brazil

Copyright © David Goldblatt, 2014

First published 2014

First 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

（英）大卫·戈德布拉特 著 搜达足球 译

出 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 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 箱：capress@163.com

发 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 话：（010）85099947，85099948

印 刷：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6开

印 张：18

字 数：298千字

版 本：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7-0712-4

定 价：5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足球王国的异军突起](#)

[第一章 香槟足球：美好时代的足球运动（1889-1922）](#)

[第二章 摩登时代？足球与旧共和国的灭亡（1922-1937）](#)

[第三章 巴西特色：足球与新秩序（1932-1950）](#)

[第四章 巴西利亚和足球：漂亮游戏的发明（1950-1964）](#)

[第五章 强硬流派：独裁统治下的足球（1964-1986）](#)

[第六章 艺术和梦想的幻灭：实用主义、政治与足球的关系（1986-2002）](#)

[第七章 足球帝国归来：卢拉的执政史（2002-2013）](#)

[第八章 足球王国的内战（2013-2014）](#)

[尾声 2014年2月](#)

[参考书目](#)

前言 足球王国的异军突起

足球是在体育场里踢的么？不，是在沙滩上踢的。

——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

巴西不需要我们！巴西受够了我们！

我们的巴西在未来世界。这不是巴西。

巴西不存在。真的可能会有巴西人吗？

——卡洛斯·德拉蒙德，**1934**年

周日下午巴西万人空巷，对吧？

看啊，桑巴舞者，这就是足球王国。

——米尔顿·纳西门托和费尔南多·布兰特，**1970**年

I

不管是从人口上还是面积上看，巴西都是世界第五大国。目前巴西的经济水平大约排名世界第6或者第7位，即将赶超法国和英国。然而这个大陆国家却几乎没有确立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管是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大众流行文化方面，还是在小众高端文化及科学领域，巴西都仅仅是一股暗流。^[4]巴西美食，或者说是以牛肉为主的南半球地方性美食，均可在北半球国际都市以及少数新兴的巴西侨民散居地（比如马萨诸塞州和伦敦）寻觅到。但比起真正把触手伸向世界各地的中国菜、印度菜和泰国菜，巴西美食显得微不足道。就连曾是巴西代名词的咖啡，也在北半球遭到了意大利咖啡的文化侵蚀。巴西曾经笑傲全球的咖啡产量如今已大幅度减产。星巴克提供的是卡布奇诺，而非巴西式的咖啡被统称为“咖啡西尼奥（cafezinho）”。在鼎盛时期，全球70%的咖啡均由巴西供应，而现如今供应量还不到三分之一。

音乐和狂欢节或许是巴西最广为人知的两个符号，一般作为主题出现在明信片和图片上。抛开巴西政治和社会背景不谈，这两个符号与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和大西洋沿岸种满棕榈树的海滩一样，代表着热带地区特有的散漫享乐主义，成为巴西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名片。这些传统文化名片看似诱人，但其实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不如从前，比如桑巴舞和融合了桑巴元素的音乐被萨尔萨舞和牙买加瑞格舞抢去了风头，而带有桑巴主题的音乐作为新流行起来的音乐流派，是从一个人口仅占巴西1%的小岛上流行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波萨诺瓦曾在美国音乐市场上占据一定地位，同时也享有广泛赞誉，但很快被音乐产业定义为一种俗气又过于甜腻的音乐形式——20世纪70年代酒吧、餐馆里的助兴音乐。巴西流行音乐家群星荟萃，为世界音乐贡献了奇科·布科、吉尔伯托·吉尔和卡耶塔诺·费洛索这样的人才，但听众还是更喜欢加勒比和非洲音乐的韵律。非洲裔巴西人的卡泼卫勒舞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如今在全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但与柔道相比大约落后了一个世纪之久，至今还在追赶战后源自东亚的空手道、跆拳道和柔术。

我们并不需要通过诺贝尔奖和评审人的观点来判定巴西的科学和艺术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巴西人尚未获得过任何一项诺贝尔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巴西大批高校和资金充裕、涵盖面甚广的科研基金基本上都是在自娱自乐。在全球得到广泛认可的大约只有政治哲学家罗伯托·昂格尔的作品。巴西文学传统毫无疑问十分深厚，马查多·德·阿西斯精彩的短篇小说作品集和若热·亚马多被译成多种语言的文学作品都不算边缘作品，但拉丁美洲的西语文学写作在世界上的地位已超过巴西，代表人物包括博尔赫斯、阿连德、聂鲁达、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

尽管巴西是最早启用电影技术的国家之一，也曾阶段性地创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民族电影产业，但巴西电影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潮电影运动。即便在那时，巴西电影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力也只局限于一小批西欧艺术电影爱好者。近些年，一些优秀的巴西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比如《巴士174》（Bus 174），但对全球票房造成冲击的也只有《上帝之城》（City of God）。和巴西电影牺牲国内市场来迎合好莱坞口味不同，巴西电视行业竞争力更强，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技术先进，尽管涉及的政治和社会话题范围比较狭窄，但毫无疑问非常具有“巴西味”。在这个领域，巴西电视剧开创了独特又大众化的电视剧类型，足以与英语国家的肥皂剧相提并论，而不是简单效仿欧洲电视剧。

视觉艺术方面，巴西的绘画和概念艺术在20世纪欧洲和北美艺术运动大行其道时得到多样性的发展，但在伦敦、纽约的交易市场和艺术画廊的影响力依然很低。巴西唯一最著名的耶稣像（张开双臂站立在里

约热内卢基督山上）是由一位法裔波兰雕塑家完成的。只有曲线蜿蜒、具热带风情和现代主义的巴西建筑在世界艺术领域真正占据一席之地，而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位艺术家——奥斯卡·尼迈耶，以及一座建筑——位于巴西利亚的联邦政府建筑。

但是巴西在一个领域里不但引人注意，更令人瞩目，不止实力强劲，简直是所向披靡——这就是足球运动。耐克对全球品牌商业价值的判断一直令人信服，最近耐克公司打算以高出任何一家公司的出价、超出任何一项运动装备赞助合约的价格来赞助巴西国家队。巴西足协可以为巴西国家队出现在国际足球友谊赛上收取最高出场费。自20世纪70年代起，通过电影和电视报道巴西足球队逐渐被亚洲和非洲所知，巴西队在南半球受到普遍拥护，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本国足球队。在东亚和海湾地区，英超联赛球队、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队由于进入市场的时间较长在球迷和消费者中有大批拥趸，令很多国家的国家队相形见绌。巴西队是这那些从未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的国家的寄托。除了阿根廷和厄瓜多尔，几乎所有国家的球迷在世界杯开赛后都视巴西为第二主队。

尽管1992年里约热内卢承办了重要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巴西在国际组织中做出的贡献寥寥可数。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若昂·阿维兰热成为国际足联主席之前，FIFA是由欧洲人创立并在欧洲人的统治下近70年，但是FIFA现在已经成为巴西全球形象代言人。阿维兰热为世界杯的知名度和经济价值的显著提升以及国际足联在全球政治领域中文化资本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国际足联带来了巴西统治阶层的独特信条：专横的热忱、无情的庇护式政治，以及为了本集团利益而将公众与个人领域、组织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模糊化。阿维兰热卸任大约20年后，虽然国际足联中的事务决定权已不在他手中，也没有了他的风格，但FIFA却依旧按照他框定的模式运作。

在足球领域，巴西的霸主地位不光是靠品牌价值或广泛支持度，更是因为巴西足球已成为足球运动的黄金法则，即使没有体现在专业足球的日常训练中，至少在大众认知中是这样。自1938年巴西在世界杯上震惊欧洲开始，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媒体都把巴西足球描述为独特和超凡、兼具音乐和舞蹈性、实用足球和艺术足球的完美结合。尽管可能是老生常谈了，要知道球王贝利那句著名的“美丽的运动（O Jogo Bonito）”⁽²⁾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语，而很少有巴西俗语得此殊荣。休·麦吉尔温尼对1970年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决赛的描述是在成千上万首单调的赞美巴西足球的诗歌中最出色的，彼时巴西足球已稳坐全球霸主的位置。他这样写道：

“其他球队的表现令人兴奋，令人尊敬。而巴西队在决赛上的表现让人如此愉悦，这种感觉自然而又深刻，如同亲身体验……巴西队向我们展示了足球运动之所以成为最优雅、最刺激的集体项目的原因。巴西人为他们的天赋而自豪，不难想象他们对这项运动及他们本身都想急切地表达些什么。如果你不爱一项运动，那你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们坐在阿兹特克球场的座椅上，兴奋得面红耳赤，感受到了某种致敬。”⁽³⁾

站在英国足球的立场上，赞美巴西足球的卓越不凡确实是一种褒义，但当现场球迷大声歌唱“就像在看巴西人踢球”时更像是在讽刺球员的踢球水平不行。在贝尔格莱德，无所畏惧的红星队把主场命名为马拉卡纳，是为了致敬里约热内卢的伟大球场。这些致敬的方式不是胡编乱造或者充满东方幻想主义。要知道世界杯每4年才举办一次，自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开始到现在也就举办过20次，它不只是单纯的足球锦标赛，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杯和奥运会一样都是罕有的、世界性的文化盛宴，受到全球瞩目。巴西是唯一一支参加了每一届世界杯的国家，曾夺得五次大力神杯和两次世界杯亚军。除了是世界杯赛场上最大的赢家，巴西足球的踢法、巴西的胜利方式和失败都深深地融进了世界足球文化中，这是任何其他国家不

可企及的。重要的是，远在其他国家认为足球是巴西的国家名片之前，巴西就证明了这一点。

II

不到40年的时间，由巴西20世纪中期的杰出诗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提出的、本前言开头处提到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米尔顿·纳西门托在其畅销单曲《这里是足球国度》中反复唱到了“在比赛中”。的确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足球成为巴西举国的仪式，是巴西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当巴西国家队踏上世界杯赛场，巴西国内超过90%的人在电视上收看直播，整个巴西空前一致和团结。这不单单具有象征性意义，足球产生的需求也带来实际可见的变化。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巴西不仅赢得了第三次世界杯冠军，最令人信服的大获全胜，更是首次搭建起连接南北半球的通信设施网络，以保证比赛的全球覆盖转播。这只是巴西用足球创造民族性的多种方式之一。

巴西国家民族的形成以及巴西国家和人民的存在感的成型，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二者都必须克服资源贫乏带来的困难。巴西在1822年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宣布独立，直接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并未经历对南美西班牙语国家来说塑造民族性所需的重大突破。一开始，为躲避拿破仑军队，葡萄牙人大规模从里斯本逃亡到里约热内卢。在定居差不多20年后，葡萄牙皇室统治着巴西这个葡语国家。当多姆·佩德罗一世不情愿地回到欧洲继承王位时，他任命儿子多姆·佩德罗二世为如今已经独立的巴西帝国的皇帝。所以巴西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什么奇怪的帝国试验品是从1889年正式开始的，当时的军队在一场短暂、无流血冲突的军事政变中摧毁了帝制，首次宣告巴西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以国家的名义存在，但巴西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产物。巴西边界问题直到20世纪初才最终得以解决，而从地理上看，巴西并未在实质上对争端边界进行管辖。不管在宪法上享有何种特权，巴西联邦政府和总统既没有魄力，也没有足够能力来管辖这样一个国家——一个从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一直向南延伸500英里至厄瓜多尔边界、深入亚马逊盆地2000英里、沿着加勒比海岸一直向北的国家。造成的结果是各州及其地方政治精英拥有极强的自治权。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不管是从经济还是地理上看，巴西可被划分为四到五个区块。在南方，几乎全由欧洲人构成的一拨人控制着富有的牧场；东南方是最重要的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这一区域的咖啡种植经济令全世界瞩目。现在人们所知的中西部地区、内陆州马托格罗索和戈亚斯所在地，仍是巴西土著的避难地。虽然已经在该区域的地图上划定了一个未来的内陆首府，但这一地区不曾有欧洲人定居，也未被开发。大西洋沿岸东北地区是糖料种植园、奴隶制建筑的历史遗留物、地域辽阔、干旱的大牧场与庄园的结合，这片区域几百年来被世袭统治，目前仍在这些大家族的管辖之下。在北方，除了玛瑙斯、贝伦和创造了当地经济但寿命短暂的橡胶业，巴西并没有在辽阔的亚马逊雨林区域留下开发的痕迹。此外，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空运才逐渐普及，在此之前这些地区之间的连接和运输极不发达。沿海海运仍是连接南北部地区最便捷、最可靠的运输方式，公路运输不发达，20世纪初巴西的铁路还没有比利时的多。

20世纪下半叶，巴西逐步从乡村向城市化社会转变。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发展成了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农业经济在巴西仍然很重要，但集中于东南部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更迅速。人口迁徙，包括迁入和迁出，都加速了这些进程。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由此诞生了一大批丧失土地的非裔巴西农户，他们与东北部地区贫穷的白人和黑白混血人种一起向巴西沿海地带迁徙。与此同时，成百上千万的欧洲人，主要是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德国人，跨越大西洋到巴西定居。这些变化带来了许多社会与文化变迁，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诞生，以及识字人群逐渐增长并向低社会阶层缓慢扩散。在选举体系中，识字与否对拥有投票资格至关重要，识字率的增长使选民人群扩大并且构成更复杂。

巴西脆弱的联邦政体和陈旧的军事体系以牺牲个体州的利益为代价，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以此建立国家政府。但这让人不禁要问，这个不管是从地理还是社会因素上看都四分五裂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巴西独立后的一个世纪里，一小拨知识分子开始向欧洲寻找灵感。向葡萄牙学习文化理念是行不通的，葡国的文化和它的资本、劳动力一样匮乏。巴西高级知识分子转而向法国看齐。大量的巴黎美好年代时期的装饰建筑被照搬到里约热内卢。法国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广为流传。社会学奠基人奥古斯特·孔德的理论为密谋策动的底层军官提供知识层面的帮助，从而推动了巴西的共和国革命。归根结底，这是孔德“秩序与进步”的理念在巴西的一次实践；让人想起这样一个时期：人们相信欧洲科学可以用来诊断一个国家的顽疾，并且提供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

除了类似荒谬的乐观积极主义，巴西还吸收了欧洲生物学理论方面的优生学和人种学理论。一方面为欧洲白人的优越性提供科学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这些理论的巴西支持者开始担心欧洲巴西人口状况和种群健康度下降，他们提倡整个国家的“白人化”。这场运动之所以没有跨越南大西洋，是因为法兰西共和国更为彻底和民主的理念，因为公民权理论及其实践。这些成系统的文化理念本可以开创上流社会、白种欧洲人的巴西这样的观念（尽管一直受到巴西人口和种族现状的威胁），但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无法再实践下去。

对战争工业化的需求是推动形成民族国家体制和集体民族意识的最好催化剂，但巴西没有经历过这一切。尽管巴西军队一直忙于各种战争——19世纪与邻国巴拉圭打得不可开交，镇压东北地区独立的前奴隶群体，镇压暴动和地区叛乱，甚至在二战快要结束时向意大利出兵代表盟军参战——但没有一个体现了民族气节、英雄式的胜利或者不屈不挠的集体主义精神。考虑到巴西低得惊人的识字率，指望通过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来推动形成民族性也是不可行的。

这么看来，卡洛斯·德拉蒙德显露无遗的尖刻其实掩盖了20世纪初巴西民族主义者的深刻问题。巴西在寻找自身的过程中处于这样一个随时都在变化的时刻，白人、教育和精英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巴西必须结合自身非洲裔人口的状况、复杂的种族问题、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想法以及正在崛起的城市大众阶级的情况。实际上，巴西文化在许多方面有丰厚的积淀：流行音乐领域，从轻音乐到桑巴及舞蹈和狂欢节；坎东布雷教是奴隶制压迫下非洲文化的杂合体所形成的非洲宗教和精神实践活动的统称；巫班达是随着城市兴起的坎东布雷教的一种变体，融合了非洲神灵、天主教圣徒、异教徒仪式和古罗马圣礼。尽管巴西上流社会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让这些形式合理化，或某种层面上将非洲优秀文化融入巴西人的生活中，这些举措统统没有体现出现代性，相反，都根植于陈旧文化。巴西民族主义需要的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它可以涵盖、涉及整个巴西复杂的社会、种族阶层，既认可巴西的过去，又着眼于未来。足球运动满足了这一点。足球起源于英国，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具现代性的国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足球运动在巴西万神殿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它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一种集体仪式，一种盛大狂欢，更是一种历史叙事方式。随着巴西国家队在世界赛事上斩获冠军，收获如潮的赞美，足球运动在巴西的地位也得到巩固。

巴西足球运动最早由英国人带到圣保罗，一开始踢球的也主要是外国人。但这些外来的影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而彻底地消失。一战结束时，也就是圣保罗开展第一拨足球赛事大约20年后，英国对巴西足球的影响几乎已经销声匿迹。英语对足球词汇的影响迅速被葡萄牙语取代。圣保罗工人阶层球队科林蒂安仍然保留了“英语-古希腊语”的名字。但英国人这种绅士味十足、娱乐消遣式的精英足球文化在巴西只剩下最后的生存空间了，到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足球的影响彻底消亡。英国足球的特色是职业球队到处巡回打比赛，这和处于上升期的巴西足球截然不同。在20世纪下半叶的巴西，足球成为最流行的集体运动项目，球迷人数最多、广受各类媒体欢迎，并且成为探寻和描述各类巴西流行文化和高雅艺术的主体。在艺

术领域，英国的艺术家当中只有劳里的油画体现了足球元素。

在20世纪的视觉艺术领域，英国的艺术家中只有劳里的油画体现了足球元素。但是数十位顶尖巴西艺术家的作品中都体现了足球元素——从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到民族超现实主义，到伊凡·赛尔巴的抽象几何图形，再到克劳迪奥·托齐的波普艺术。巴西作家和小说家也不断在作品中提到足球这项运动——从马里奥·安德拉德的《马库纳伊玛》，到霍斯·林斯·雷格描述里约热内卢周边地区史诗传奇生活的《水就是母亲》，到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文雅、诙谐的纪实作品，再到埃迪尔维托·科蒂尼奥精彩的短篇故事集《再见，马拉卡纳球场》。足球运动还将巴西人不同的生活领域串了起来。

若昂·卡夫拉尔·梅洛·内托是一位诗人兼外交官，他写了许多关于球王贝利的诗作。贝利是前足球运动员，后转行从商，当过文化部长、歌手和作曲家。作曲家阿里·巴罗索涉足足球评论领域，之后转向政治圈。政治家想当足球俱乐部主席，足球俱乐部主席想从政。球迷成为音乐家，而音乐家一直为球员和俱乐部写歌。诗人和剧作家评论足球。足球评论员成为足球教练，比如华盛顿·罗德里格斯和若昂·萨尔达尼亚。

当赛场上巴西队的对手漏球或者传球失误时，环球电视台资深足球评论员加尔瓦·布埃诺如此评论道：“他们和足球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这说明不管是布埃诺还是他的听众都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不管足球起源何处，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巴西才是足球真正的家，整个国家都在围绕足球编织着一张充满意义和回忆的网。”

III

对足球产生的这种亲密感是一把双刃剑。就像音乐家、作曲家霍斯·米格尔·维斯尼克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有毒疗法》^[4]中描述的那样，足球是一种有毒疗法。一方面是因为足球比赛的不可预知性。大量统计表明，任何一天，踢得最差的球队都可能赢；足球强队失利的可能性大于任何其他运动；足球运动中随机、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大大存在。以国家足球队的表现来衡量一国的精气神甚至终极命运是非常不靠谱的，即使在巴西这样看重仪式胜过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也是如此。但赢球的逻辑与足球运动创造性审美之间自有其智慧。罗伯托·达玛塔就认为：

“足球运动中有艺术、尊贵、天赋、坏运气、上帝和魔鬼、自由和命运、旗帜、赞美和眼泪，但首要的是，尽管巴西很多方面都不行，但球踢得好。巴西是足球冠军，这很重要。毕竟，当足球冠军、桑巴冠军、狂欢节冠军比当战争冠军和军火商冠军强得多。”^[5]

足球成为巴西代言人真正的价值在于足球运动与巴西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和政治进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深层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对巴西人或是外国观察家来说，都不具备太大的启迪意义，至少远不如足球本身。巴西足球的历史和巴西历史一样涉及严酷的社会现实。首先，巴西在全球经济中依然处于原材料供应商这样一个位置，巴西向世界出口的原材料从大豆到足球运动员不一而足，却只收获了其生产力的一部分经济价值。

其次，巴西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地区、阶级之间以及不同种族之间极其不平等。巴西大城市中南北分化严重，数个世纪前建立起来的社会阶层如今还存在着。这既是巴西源源不断涌现出这么多足球天才的原因，也是这项运动弊病多多的原因：球员和球迷遭遇的严苛、不公平的待遇，种族主义和猖獗的性别歧视，导致实力强劲的俱乐部和球员优势越来越大。

此外，巴西足球是在一种努力与宪法民主看齐的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角色而造成的。军队在仲裁政治冲突、军事政变偏好和政府当局任期长短中发挥作用，造成了巴西特有的政治文化。但即使是在军队不发挥作用的时期，巴西政坛依然被腐败和裙带关系困扰，公益事业意识很差，政治透明度和公信力很低。这导致其足球俱乐部和联赛都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当然，在足球界巴西没有这样的垄断行为，但巴西足球政策无疑是丑陋、恶性和混乱的。

最后，巴西社会暴力严重。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法律不健全、武器泛滥、多级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亦正亦邪，加上巴西历史遗留的强制劳动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在过去30年中，巴西有将近200人死于足球暴力，上千人因此受伤。球员、官员、警察和球迷的混战不管是在高水平球赛还是边缘草根阶层中均十分常见。

本书简述了巴西足球的多维历史：它的辉煌与神奇，风格与特色，以及与之相关的传说和故事；关于巴西足球的悲剧与痛苦；足球所反映的巴西人民面临的经济和政治不公；还包含了一些社会实例，旨在反映足球所强调的是欢乐与创造力，而非野蛮残暴和保守主义。

^[4] 此行的灵感来自P·安德森在1994年11月24日发表于《伦敦书评》16（22）上的文章《巴西欢乐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Brazilian

Conviviality)。作者对巴西政治的理解完全来自以下作品的介绍：P·安德森于2002年12月12日发表在《伦敦书评》24（24）上的文章《卡多佐的遗产：卢拉的继承》（The Cardoso Legacy: Lula's Inheritance）；P·安德森于2011年3月31日发表在《伦敦书评》33（7）上的文章《卢拉的巴西》（Lula's Brazil）；T·斯基德莫尔，《巴西政治》（Politics in Brazi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T·斯基德莫尔，《巴西军规政治》（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T·斯基德莫尔，《巴西：五个世纪的变化》（Brazil: Five Centuries of Change）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普遍认为这是贝利的名言，贝利在1977年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叫作《我的生活与这项美丽运动》（My Life and the Beautiful Game），而在此之前有人认为这种表达是源自H·E·贝茨、迪迪或斯图尔特·霍尔

(3) H·麦克伊万尼，《麦克伊万尼看足球》（McIlvanney on Football），爱丁堡：主流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4) J·M·维斯尼克，《有毒疗法：噢，足球，噢，巴西》（Veneno Remédio: O Futebol o Brasil），里约热内卢：信函公司出版社，2008年

(5) R·达马塔，《探索：社会学散文释义》，里约热内卢：罗卡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原文引用自T·马森，《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Passion of the People: Football in South America），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

第一章 香槟足球：美好时代的足球运动（**1889-1922**）

第一只虫子落在好几英里外的坎皮纳斯市，化作一只毛毛虫；第二只虫子也落在附近，化作一只灯蛾毛虫；而皮球落到了地里。就这样，马纳佩带来了咖啡虫，吉克带来了棉花象鼻虫，而马库纳伊玛带来了足球——这就是当今巴西国内的三害。

——德·安德拉德，**1928**年

如今足球在里约热内卢的重要性，就好比剧院在巴黎的重要性。

——胡奥·卡洛斯，**1919**年

I

足球，或是迷倒众生的魔咒，或是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或是巴西本土反英雄式角色的神奇产物，或是这个国度与众不同的热带都市现代化的精髓。但不管作为何种身份，根据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在其史诗般的小说《马库纳伊玛》中关于足球起源的叙述，以及里约当地报纸《记录报》对这项运动的描述，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中，巴西上流社会不仅踢球、观看球赛，而且思索足球问题、撰写关于足球的作品，希望借此代表巴西这个新兴国度的一些重要、甚至是意义深远的东西。⁽¹⁾

安德拉德的小说将当地民间传说注入了他的故事中。马库纳伊玛被塑造成一位“没有特定性格的主角”，他是一个拥有多重生命和声音、能够施法让事物变形的角色，他千里迢迢从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前往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寻找失落的护身符。小说以嬉笑式和超现实的表现形式，大胆尝试将古老神话叙事和零散现代散文相结合，即拉丁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当时这一术语尚未被造出来，书中的象征意义同角色般狡黠多变。足球也许是一种魔咒，但这种魔咒源自巴西本土，并非来自海外。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安德拉德还是个不起眼的狂热球迷，对着自己最喜爱的球员感叹“好一位绿茵舞者！”还念叨着“让我留在球场里的350个理由”。⁽²⁾

他并不是唯一一位捏造“足球起源于巴西”这一谣传的人。热衷体育教育事业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也曾声称，源自于本土的球类运动为巴西独特的现代运动文化提供了背景和范例。卡洛斯·迭戈的电影《理想国》（1984年）以巴西东北部形形色色的逃亡奴隶和贫苦民众所建立的独立群落为背景，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两个男孩正在练习卡波耶拉舞。镜头外，不知从何处飞来一个足球，男孩们即兴将足球融入他们的舞蹈中，而舞步却没有因此被打乱。这样的描述并不属实，但这并非重点。

更普遍的说法是，正如巴西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巴西上流社会记忆中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奴隶、市区的贫民和码头工人从英国商船水手那里见识了这项奇特而魅力十足的球类运动，他们试图即兴创造自己的玩法，同时出生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也尝试着去模仿旅欧时所遇到的踢球的同龄人。⁽³⁾然而并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拥有真正的足球或者英足总在1863年首次印刷的规则手册。直到英籍巴西人、圣保罗咖啡世家的后裔查尔斯·米勒从英国公立学校留学归来，巴西人才拥有了上述的两样东西。他于1894年乘船归来，行囊中携带了两个皮球和一本足球规则手册。这两样东西像恐怖的虫子一样迅速繁衍和蔓延开来。

乍一看，巴西帝国并没有肥沃的土壤来孕育足球或任何一项运动。经历三个世纪的奴隶经济，所有形式的体力劳动都带着一种低下的污点；统治阶级鄙视劳动人民，而且在流行病盛行的年代，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大量聚集的人民群众亲密接触。20世纪初巴西帝国里约历史学家路易斯·埃德蒙多回忆道：“这个世纪末以前，我们实际上一直对运动所带来的欢乐和好处视而不见。”“运动”一词实际上早在1840到1860年间就已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上，但它的意思接近于游戏或娱乐，它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市民对赌博、纸牌和斗牛与日俱增的兴趣。⁽⁴⁾19世纪70年代后，城里的上流社会人士前往欧洲游历，而且当时出现了欧洲上流社会向里约热内卢移民的新潮流，受到这些因素的推动，里约市的上流社会开始放松，并参与运动。起初，他们开始学游泳，从养生的沐浴转变为娱乐的戏水活动，并最终转变为游泳竞技。19世纪末，瓜纳巴拉湾浴场林立，不仅供男士使用，还接纳了首批女性游泳爱好者。此外还出现了溜冰、自行车赛和田径运动新潮。因此到1885年为止，里约市已有了两家溜冰场、一个室内赛车场（圣保罗也有一个）、几个游泳池、健身房以及可供男士们击剑、格斗和打台球的俱乐部。板球在英式俱乐部中很受欢迎，但很少有当地人受到影响而爱上这项运动。老牌报纸和杂志用更多的版面来报道体育新闻，而当时新创办的报纸，比如

1891年创办的《体育》和1900年首次发行的《船桨》，除了体育内容其他一概不报道。每家出版社的报刊上都开始刊登体育用品和保健品的广告。

然而，所有的这些运动在里约的流行程度均远不及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划艇和赛马，因为只有在这里，运动员才能被塑造成最有气派的角色，而且体育运动最容易与社交活动相结合。最早进行的一场有组织的赛马比赛要追溯到19世纪头十年，最初是由殖民地的英国商人举办。而到1895年，里约已拥有4家赛马场，电车轨道为顾及地点而改道，当地新闻社每天都在大幅地报道赛事现场的传闻轶事，还有点评和比赛前瞻。从赛事的组织方面而言，这项运动掌握在拥有俱乐部、赛道和马匹的富人们手中，但几乎人人都可以前去观看比赛。正如1875年报纸《日志》的头条所写的：“我们去看赛马吧！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年轻男士还是年长者，无论老太太还是年轻女孩。”^[5]除了一些知名的赛马俱乐部坐拥富有的赞助商为他们提供的与之身份匹配的昂贵装备和比赛场地外，在普拉多瓜拉尼和圣克里斯托弗还有更多的基础赛道供工薪阶层社区使用。人们对赛马如此狂热，有钱人乐此不疲地穿越城镇，屈尊来到贫民窟，不仅有失身份，而且还可能遇上非法赌博。

尽管赛马运动带来了许多欢乐，但它给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的感觉。它代表着过去的景象。为了走在时代的前沿，里约人民最先开始转而参与划艇运动。基于南区海湾沙滩上的一家高级且有多项运动结合的社交俱乐部，卡里奥克年轻人（里约市居民的昵称）对划艇运动的热情标志着人们从简单观看比赛转变为参与其中。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多达3万人围在里约湾的海滩和码头上观看划艇比赛，整日饮酒聊天，然后徒步走向不远处的海滨小屋参加派对，或者上划艇俱乐部会所那豪华的餐厅里饱餐一顿。这项运动在当时真是风靡一时，1903年里约市长佩雷拉·巴索斯就曾因为拨公款改善博塔福戈赛艇设施而得到了公众的掌声和拥戴。这便是赛艇运动的巅峰期。而仅仅一年后，里约市最大的赛艇组织方就给市足球赛事组织方去信，请求他们不要在举办赛艇比赛的同一天举行足球赛，因为球赛所吸引的观众会让赛艇观众大大减少。

II

查尔斯·米勒那多愁善感的声音表明他已完全被巴西人的行为规范所同化，他回忆起自己在1894年10月从英格兰返回圣保罗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时的情景：

“码头上父亲神情庄严，仿佛是在参加一场葬礼，他正等待着我手握学位证书乘船归来。但我却捧着两个足球出现在他面前，一手拿着一个……老人家惊讶地问道：

‘这是什么，查尔斯？’

‘我的学位证书啊。’我回答道。

‘什么？’

‘是呀，你儿子从足球专业毕业了。’

老人家心情不错，笑了起来，我这才得以脱身……”(6)

米勒在汉普郡巴尼斯特学院接受教育，先是为校队踢球，接着为县级球队踢球，甚至还为刚职业化不久的南安普顿俱乐部踢过球。不管他归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久后他便在圣保罗竞技俱乐部安顿了下来，打打板球，试着去说服圈外人来踢足球。

1895年春，米勒和俱乐部的一些其他成员来到了老城中心以东一块平坦的灌木丛生地，拉车的骡子正在那儿吃着草。骡子被赶跑了，两支匆匆集结的球队组成了圣保罗铁道队和燃油队，两队的队员均来自城市现代化的先驱——新电车公司和城市燃气供应公司。不久后对手便出现了：贵族院校麦肯齐学院的学生们开始迷上了这项运动，成立了一支球队。随后的1897年，一位名叫汉斯·诺比灵的德国移民者抵达了这座城市，带来了自己的德语规则手册，以及他在汉堡踢球时的一些比赛经验。起初，在被圣保罗竞技俱乐部极其排外的英国成员拒之门外后，诺比灵协助成立了巴西国际俱乐部，球员均来自城市的许多侨民社区；虽然说来也怪，但他接下来迅速成立了一家从侨民中脱离出来的俱乐部——SC日耳曼尼亚队，球员均由日耳曼人组成。随着保利斯塔人竞技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等独特的巴西上流社会俱乐部的出现，市里已拥有了6支球队，保利斯塔人竞技俱乐部的主席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的球员均由工科和法学专业的学生组成。在米勒回国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市里已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小但运转流畅的锦标赛。

圣保罗开始出现足球热潮，而里约也毫不落伍。1897年，一位拥有瑞士和巴西双重国籍的英裔超级富豪奥斯卡·考克斯从洛桑留学归来，在那儿他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学会了踢球。起初考克斯说服了里约板球和田径协会去尝试足球运动，海湾对岸尼泰罗伊市的英国派桑杜板球俱乐部和里约板球俱乐部也同样加入了足球赛。1901年，考克斯组织了首场在里约代表队与圣保罗代表队之间进行的比赛，球赛于当年10月在圣保罗竞技俱乐部举行。当地媒体对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报道不停：“那群球员……个个都是精英，而且人高马大，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群优雅的姑娘们用欢快的嗓音为这个盛会添彩。”^[7]第二年圣保罗锦标赛决赛结束后，比赛用球沐浴在香槟酒的洗礼中。巴西与这项运动的关系被定格于欢乐与华丽的基调之中。

但并非人人都被说服了。一家报道了里约一场早期足球赛的报社似乎认为这项运动真的十分令人费

解。“在邦雷蒂鲁，”报道语无伦次地指出，“有一群英国人，全是疯子，他们时不时地会聚在一起，将一个看起来像牛膀胱一样的东西踢来踢去。这个棕黄色的膀胱状物体进入到一个由木头柱子围成的方形区域内，就会让他们产生极大的满足感，或者让他们伤透了心。”⁽⁸⁾

在圣保罗，足球被一些报社认为仅仅是一时的流行，而还有一些报纸认为这种运动不仅野蛮，还是危险的外来运动。一家报社否定了足球，将它视为“盲目而愚蠢的体力战，人们无须用到更高级的人体官能”。这位记者得出结论：“足球是一项英式运动，应该让英国人自己玩去。”一位圣保罗竞技俱乐部的队员身穿队服在前往比赛场地参赛的途中被巴西警方拦下，警方以他“在非狂欢节期间身穿节日服饰，在市中心公开场合无礼露大腿”为由逮捕了他。但对于大多数开始接触这项英式运动的巴西人而言，这既不会太过暴力，也不会过于前卫。足球的魅力难以抗拒。查尔斯·米勒在1904年给他在英格兰的学校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在这些上流社会竞技俱乐部微小的领地间蔓延开来的足球新潮：

“你们将会很惊讶地听到，足球已成为这里风靡的运动。光是在圣保罗市就有不下六七十家足球俱乐部.....一场联赛总会有两到三千人到现场观战，但决赛就会有6000人.....一周前我应邀做一场少儿足球比赛的裁判，每队由20名男孩组成。我告诉他们，每队20人这也太荒唐了.....但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他们踢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比赛，而我只需要动动两只手.....就连这种比赛都有大约1500人前来观战.....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儿卖出了2000多个足球：在这儿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家俱乐部。”⁽⁹⁾

足球的这种迅速扩张所导致的社会和文化结果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变得清晰可见。20世纪头二十年，巴西足球仍局限于上流社会的角色中。任何关于权贵人士对足球所抱有的热情的怀疑，以及任何对于足球有可能太过野蛮的担忧，均因弗卢米嫩塞的成立而一扫而空。这是一家为里约热内卢的超级富豪而成立的超级俱乐部。俱乐部的创始人是奥斯卡·考克斯和他在里约上流社会跨行业的一干好友，那些人对他们时常光顾的各种板球和划艇俱乐部缺乏对足球的热情而感到不满。马里奥·菲利浦随后将这些更衣室内和豪华餐桌边的人物形容为“公司高管，富家子弟，曾留学欧洲，挥金如土”，理由是他们那有没完没了的游戏、宴会、派对和舞会。1907年，受雇于同样声名狼藉的保利斯塔人竞技的英国教练杰克·哈密顿发觉，他的球员需要“好一番哄劝才肯好好训练”。

1917年，拉兰热拉斯球场落成。球场毗邻王室公主的故居瓜拿巴拉宫，是功能性与装饰性、平民大众与上流社会的惊人结合体：球场为全封闭式，入口设于那些带有多个一模一样的新帕拉第奥拱式建筑风格的墙上，有三级台阶通向公众；最佳观看视野是带座席的俱乐部成员看台，那里的布局和细节设计让人联想起海滨宫殿。后方就是俱乐部会所，包括一间大到可容纳500名宾客的镀金舞厅，还有充足的空间来饮酒、进餐、社交和发展人际关系网。贵诺兄弟的角色象征着弗卢米嫩塞在巴西上流社会的地位。卡洛斯和古伊列梅曾三次担任主席，此后长兄阿尔纳多在1916年开始掌权，任期直至20世纪30年代。

古伊列梅来自一个古老而富有的贵族家族，起初他是一名土木工程师，而后他在巴伊亚州开办了一家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他成了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最核心的经济决策者，开创了国家钢铁工业，随后他曾在短期内担任过巴西银行的行长。卡洛斯是一位作曲家，还是该市艺术领域的重要赞助者，而阿尔纳多则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弗卢米嫩塞中。此外，弗卢米嫩塞的管理层名册上令人自豪的大腕还包括那个时代一流的作家，从小说家恩里克·科略·内托到诗人奥拉沃·比拉克。

在里约，弗卢米嫩塞成立后不久，博塔福戈划艇俱乐部内便诞生了一支足球队，球员来自附近贵族学校阿尔弗多·戈麦斯学院和吉纳西欧民族学院。第二年美洲俱乐部成立了，创始人是来自东北部古老家族的

子弟，他们是慕名来到首都的没落乡绅，时下似乎已接受了现代都市文化。坐落于豪华湖畔社区加维阿的弗拉门戈划艇俱乐部起初曾抵制过足球的吸引力，许多划手认为这项新运动缺乏男子汉气概，但在1911年，一群从弗卢米嫩塞脱离出去的球员在弗拉门戈找到了自己的主队。圣保罗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圣保罗市，这项运动的伟大编年史家托马兹·马佐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间曾就40多位球员做过调查，发现他们之中有“工程师、建筑承包商和商人……零散的还包括会计师、医生、银行家、部队军官、教授、建筑师以及一位诗歌学院的老师”。⁽¹⁰⁾

在这个时代，球队会正式地进入到球场内，在主看台前面排成一行，向球迷敬礼或鞠躬，而球迷则用三次集体喝彩声、掌声和欢呼声回应。尽管比赛具有激烈的竞争性，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礼仪得以保留下来。圣保罗的报纸赞扬了一支里约的球队，指出：“他们这项运动的正确性……这是人们期望从受过精良和杰出教育的男孩们那里看到的。”里约报纸《日志》报道了1908年博塔福戈和美洲队在里约市进行的一场比赛，写道：“在争执和比赛结束后，球员们仍然是朋友。他们在社会中是懂礼貌的年轻人，彼此相互尊重。他们并不是动真格的。”⁽¹¹⁾球迷被形容为“乐呵呵的”。每家俱乐部的支持者都会一视同仁地为双方球员鼓掌。看台上的观众们着装正式而时尚。男士一般是一身浅色的西装、硬草帽、手杖、别致的同系列马甲和上了蜡的胡子。一部分真正的支持者的帽子上会有一圈带俱乐部颜色的帽檐，这个细节对于那些上过英国公学的人而言十分熟悉。

然而，关于球迷群体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足球社会功能的一个指示物——就是里约的姑娘们会到场观看比赛，并且人数众多。她们的着装打扮是夏季最新潮的时尚，一般戴着设计灵感源自巴黎的帽子，披着纱巾，用头巾精心包裹着卷发，头发上佩戴着花饰。半场休息时，球员会抓住机会到看台上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相聚，和吸引他们视线的姑娘聊聊天，或是混入到那群优雅地倚在俱乐部会所木雕栏杆上的女孩当中。在观看1913年派桑杜对阵弗卢米嫩塞的比赛时，一位观察者看着人群，瞧见了“一排排水灵美丽的姑娘们，她们似乎想蹦跳着高唱球员的名字之歌，姑娘们因热情而脸色发白”。直到1919年时，这位作家才声称球迷中“最容易倾注情感、最恒久不变、人数最多的，说来也怪都是女性”。⁽¹²⁾这不仅仅是一种调情，还潜藏着一股清晰可见的性感的暗流。

那个时代有一对知名的足球夫妇——诗人安娜·阿梅利亚和银行家转行为历史学家的马尔科斯·德·门度卡，安娜就是在观看一场马尔科斯为弗卢米嫩塞守门的比赛时与他相识的。她的诗歌《一跃而起》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今日当我看到你

无拘无束，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跃而起

宛如《伊利亚特》中的人物

我内心最私密的部分在颤抖

我被一股狂热的冲动所笼罩，好似我跟前站着一位希腊人

一位奥林匹亚的英雄⁽¹³⁾

也许在1910年确实有种感觉，古希腊在里约的足球场中重生，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局面开始看起来更像罗马斗兽场里的乌合之众。若奥·多·里奥在1916年撰文指出：“我在许多国家看到过无数的人

群，充满健康和新鲜空气的超棒的狂欢节，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那样的一群人，燃起这样的焰火，拥有这般热情。”⁽¹⁴⁾当然，足球比赛中的观众群体从那个世纪头十年的几千人涨至20年代的10000人，特殊场合的观众甚至会更多。俱乐部现如今已建起了围墙和大门，向公众售票，虽然会员们仍能免费入场观赛，在最好的看台预留座位上拥有一个座位。对于其他的普通人，球场设有梯形看台，而且票价仍然十分低廉，无疑会低于去一趟剧院的花销，与在市里的劳动阶层去小餐馆里吃上便宜的一餐价格差不多。然而这仍然超出了贫民和边远地区人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经常坐在四周的山坡上观看弗卢米嫩塞的比赛。但对于中下层阶级人民而言，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拥有一份正规工作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可负担得起的娱乐活动。

被这种新式社会阶层的到来所影响的球迷群，也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开始更加带有偏向性，总体上的态度更加激动。在报社和当地方言中，他们被称为“托尔西达”，字面意思为“扭动的人群”。这个词是从庆祝的球迷在空中挥舞手帕的影像，以及气氛越来越紧张时他们心态的变化而产生的。据体育报纸花边专栏的小道消息称，弗卢米嫩塞球迷头领若奥·佩雷拉在一场比赛中由于过度紧张而“弄丢了他的胡子”。⁽¹⁵⁾伊塔拉雷男爵阿帕里西奥·德·布林克尔霍夫·托雷利在这个无疑缺少幽默的年代本有可能继续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一流幽默大师，而他却开始讥讽起了里约的足球。他的诗歌《足球比赛》让这项运动参与者的高等社会地位与当时地位明显低下的球迷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疯狂的人群，野蛮而粗鲁，

向尊敬的家族首领发出嘘声。

又有一人摔倒在地。人们向他发出嘘声。

他站起来大发雷霆，但再次摔倒。

所有的这些看起来，依我三思之见，

就像二十二个怒汉，追寻着他们的世界。

在一个半小时的战斗后，

裁判吹响了哨声。

比赛打成了平手。⁽¹⁶⁾

社会底层人民也许已抵达旧共和国的各个城市，处于社会边缘的他们或许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有存在感，但足球以及最重要的弗卢米嫩塞的运动从根本上仍是一件上流社会的事。1919年卡里奥卡锦标赛弗卢米嫩塞与弗拉门戈的关键战前一个小时，为能容纳18000人而新扩建的拉兰热拉斯球场人满为患，5000位无票球迷被挡在球场外。一场热身赛给球迷带来欢乐，但在比赛开始半小时后，佩索阿总统携第一夫人以及海军部长进入到了高层的包厢中，比赛暂停了五分钟，双方球员在他们面前排成一行，海军仪仗队奏起了国歌。最终弗卢米嫩塞以4比0的比分完胜对手，赛后球员和球迷都涌入球场内，和海军仪仗队一同游行，组成了一支很棒的胜利游行队，浩浩荡荡地前进。弗卢米嫩塞连续拿到三个联赛冠军——三连冠——庆祝方式既有传令官鸣号，也有21响礼炮。马里奥·菲利欧写道，从今往后弗卢米嫩塞球迷就会像朗诵奥拉沃·拉克的十四行诗那样去朗诵这支球队中球员的名字：“门度卡、拉伊什、奥斯瓦尔多、斯特隆德、马诺、泽

泽.....”

III

那微观而深奥的世界屹立于旧共和国社会之巅，如奥拉沃·比拉克十四行诗中所刻画的那样，如弗卢米嫩塞的舞厅和里约以及圣保罗那闪亮夺目、魅力十足的足球圈所呈现的那样。拉兰热拉斯被看作是一座上流社会的堡垒，一座贵族的享乐宫殿。但社会稳固性和政治的部署慢慢招致破坏，而二者正是凌驾于大众之上的魅力与特权的根基，也正是将社会其他阶层拒之门外的原因。而深度干扰着它们的两个进程是人口迁移和城市化。

人口迁移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在长期以来的贫困之下，东北部贫穷的黑人、黑白混血儿和白人迁往沿海城市。旧共和国时期萨尔瓦多和累西腓的人口均翻了一倍。与此同时，从欧洲过来的移民如洪水般涌入。帝国末期每年大约有25000人，而到了1895年，移民人数每年多达165000人，并且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增长率。到20年代，在此前的半个世纪里已有400多万移民抵达巴西。新移民中意大利人最多，占总移民人口的三分之一。其次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以及包括瑞士人、法国人和俄罗斯人在内的一长串鱼龙混杂的移民群体。

20世纪初圣保罗咖啡园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大，这让巴西接收了100多万无地可耕的日本农民，日本政府资助了这些农民横渡太平洋的费用。除了他们外，还有一股源源不断的英国移民涌入，尤其是运输业、电力行业以及制造业的工程师、技工，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犹太人。这股移民热潮势不可挡地朝着这个国家的南部涌去，而当许多开始从事农业的人也搬迁去了圣保罗和里约，那儿的人口增长真是天文数字。在共和国初期全国仅有50万居民，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光是里约就有120万居民。圣保罗人口同期增长了8倍，达50万，并且在大约十年时间内就超过了里约。

这些进程结合起来，在巴西都市中上流社会的家门口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有文化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小规模但一直在扩张的工薪阶层。这两个阶层中都混杂着黑人、黑白混血儿和白人。这些人无法完全被驱逐出这个国家的公众生活，但他们也不容易被自视为欧洲白人国度的上流社会所吸纳，他们聚集在国家东南部的两大城市。在20世纪头二十年中，足球为这些地理上和社会阶层上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中他们能够被接纳。俱乐部可以将球员扫地出门，球场可以建起大门，但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踢球。1914年埃克塞特城队的主席离开里约时在码头观看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球赛，他记得自己惊奇地“发现那场比赛是青少年足球赛……他们全都是黑人，皮肤黑得像你们的帽子一样，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光着脚踢球。”^[17]1922年巴西作家兼记者利马·巴雷托写道：

“在里约这座美好的城市，倘若人们的脚没被灌铅，或至少他们的脑袋没有被灌铅，人人都会去参与这项所谓的英式运动。无论富豪或穷人、老人或年轻人，白人或黑人，街头穷孩子或有钱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属于一家俱乐部，至少非正式说来，都属于一家注定要靠双脚创造艺术让人们变得完美的俱乐部。”^[18]

与大部分的其他新兴流行文化形式不同，足球为巴西都市和劳动阶层的男性提供了一个公共的空间，让他们成为球员、球迷和赛事组织方，让他们接触曾经只能在工作场合接触到的上流社会圈子。以里约港口区域的工薪阶层社区的名字来命名的圣克里斯托旺俱乐部成了这些进程的象征。它成立于1909年，人们在一块露天的公共区域上划出了比赛场地，非正式的比赛和球队逐渐使俱乐部成形。人们对这个运动项目是如此满怀激情，到1910年时他们已在里约大都市联赛踢上了比赛，并组织了一系列范围很广的社会活

动。1913年至1916年间，俱乐部靠着许多成员的技术和资源零零散散地修建起了自己的小型体育场——菲盖拉德梅洛体育场。

1917年首场比赛，他们在6000名球迷面前对阵桑托斯，客队长途跋涉好几百英里从圣保罗州来到这里；虽然，令人遗憾的是比赛仅仅进行了15分钟，就因裁判投诉来自主队球迷的恶意恐吓而被取消。不用说，圣克里斯托旺球员并没有条件过上奥斯卡·考克斯那样的生活。就像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部分新兴俱乐部一样，他们的球员来自社会底层，来源于不同的种族，从俱乐部的董事会那里接受工作、住房和食物方面的接济。同样遭到排斥的群体还有里约北部的葡萄牙中产阶级，尽管他们十分富有，但新近到来的他们发觉自己还是被挡在了主流俱乐部的门外，在里约不断变化的人口数量中面对着更大范围的经济和政治衰退。1898年他们成立了瓦斯科达伽马划艇和社交俱乐部，他们采用了和圣克里斯托旺同样的引援方式，并于1915年在自己的场地上举办了首场足球赛。1922年，他们已升入了和上流社会球队同一级别的联赛。

随着20世纪头十年里约工厂球队的涌现，这些来自底层的提议被上层阶级试验性地采纳。其中的首支，也是最著名的一支球队是班古队，俱乐部成立于1904年，创始人是里约北区边远地区的纺织公司巴西普罗格雷索工业公司的英国管理人员和技工。起初球队成员均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技工以及管理人员组成，但他们不久便接纳了意大利人，接着是巴西黑白混血儿和黑人球员。和市中心的球队不同，在他们的群体中存在一种相似的混合性，能在球场的任意一个区域自由地交融。班古是最成功的工厂球队之一，他们升上了里约的顶级联赛，名气大大超过了成立这支球队的工厂和公司。来自公司外部的引援越来越多，他们随后在公司被安排去做那些不那么费力的工作，留给他们时间和精力去训练。这种公司球队制被证实对许多其他巴西公司都具有吸引力，那些公司正为巴西第一次真正的工会组织浪潮产生的问题所困扰。这个国家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于1906年召开，1908年全国性的工人运动确立，因移民大热潮中地中海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到来而得到了强化，工人代表大会在十年间制造了一系列的罢工和骚动。里约北部的安达拉伊队诞生于纺织公司，而1908年在沿铁路轨道距离市区80英里开外，波格兰德队由美洲法布里尔公司成立。

在圣保罗，对现状的首次挑战来自工人阶级。1910年，一群铁道工人和油漆匠在城市的东北部集结，效仿曾经造访过这座城市的英国球队科林蒂安队而成立了SC科林蒂安队，这支球队很快就吸纳了来自这座城市日益壮大的各民族劳动阶层的球员和支持者。圣保罗的意大利人当前在巴西上流社会的种族架构中占据了一个中间地位：他们是白人，因此地位高于有色人种，但仍少于那些北欧后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起初是农业劳动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在圣保罗市中心建立起了重要的意大利社区，拥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上百个文化和社会机构，包括一家意大利语报纸《凡富拉》（*Fanfulla*），人口兴许占据了城市总人口的10%至15%，人们还在弗朗西斯科·马塔拉佐的书中找到了一位在城市商业圈颇有声望的意大利籍巴西百万富商。在意大利俱乐部普洛维尔切利和都灵于1912年造访圣保罗之后，《凡富拉》写道：“在圣保罗，我们有……德国、英国、葡萄牙俱乐部，有国际俱乐部，就连天主教和新教教徒俱乐部都有，但就是没有一家俱乐部完全由意大利‘运动员’组成，我们的侨居地是这个州面积最大的，但仍然什么都不曾尝试过！”⁽¹⁹⁾

第二年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成立，球队征战保利斯塔锦标赛。其他的球队均效仿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像赛利欧（*Syrio*）、厄斯班哈（*Hespanha*）和葡萄牙人（*Portuguesa*）这样的俱乐部在这座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体拼图上增添了公开的新面孔。至于在里约，这些因没有时间、精力和金钱而无法从大学学生和年轻职业球员中招到队员的新俱乐部，只好支付实物和现金来招揽球员。

在里约-圣保罗轴线以外的区域中，足球俱乐部和足球热潮首先在重要性和影响力紧随其后的南大河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各大城市兴起，成立了一些至今活跃在足坛的俱乐部。1903年在南部的大城市阿雷格里港，为数众多的德国籍巴西人社区成立了格雷米奥足球俱乐部。坊间流传，移民人潮中有一位重要人物甘迪度·迪阿斯去观看一场圣保罗球队间的表演赛，其间比赛用球被踢爆，他便将自己的皮球借给了球队，让比赛得以完成，就这样他被标榜为一位足球爱好者，当晚与几十个人在酒后便成立了俱乐部。

格雷米奥就队内语言和成员身份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家德国俱乐部，并且他们希望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将来自其他种族的球员和会员拒之门外。1909年迎来了新形势，那些西班牙和葡萄牙后裔中的足球狂热爱好者，尤其是市里的学生，有意识地成立了国际化俱乐部。

19世纪末，米纳斯吉拉斯州的新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规划重新建设一座“美好年代”的花园城市，但这座城市已拥有了一切豪华的城市景观，在娱乐领域已很少有能改进的空间。1904年，一位此前在瑞士踢过球的里约大学生维托尔·塞尔帕和一小群由公务员、商店职员和商人组成的群体成立了该市的首支球队——SC足球队。一年内，城市新加入了由酷爱历史的学生和职员组成的临时球队，他们将自己的球队命名为普林尼FC、哥伦比亚和韦斯普奇队，也正是在那时，当地的新闻社开始发布锦标赛的积分榜。但大学重新开学以及秋季暴雨也意味着比赛球员阵容从未齐整过。此后流行了几年公园足球，新成立的俱乐部又开始涌现：1908年米内罗竞技成立了，这是一支来自当地开放式上流社会的球队；1910年耶鲁竞技俱乐部成立，这支球队仅由意大利人组成，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还成立了仅接纳人脉通达且思想保守的当地的达官显贵——美洲队。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种形式的州锦标赛在巴伊亚州、巴拉州和亚马逊州成立。而到了1920年时，南部的巴拉纳州和南大河州也加入了队伍，新加入的还有一连串的东北部地区，包括伯南布哥州、帕拉伊巴州、塞阿拉州、北里奥格兰德以及闭塞的皮奥伊州和马拉尼昂州。几乎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里的州锦标赛绝大部分均集中于沿海州的首府，这是原先的上流阶层聚集地，也是新移民涌入的地带。一旦里约的上流社会赋予足球合法性，前者便开始迷恋足球。城市中的民众也都纷纷照做。

而在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足球在带着贵族气派的亲英派维多利亚板球俱乐部中孕育而生。在伯南布哥州首府累西腓市，纳蒂科于1901年作为市里的英籍德国商人的划艇和帆船俱乐部而成立；1905年古伊列梅·德·阿圭诺·方瑟卡为起初无法加入俱乐部的巴西人成立了累西腓体育俱乐部，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工程学院，在那儿踢过球。不到十年间，一支直接来自穷人的球队圣克鲁斯队由一群相约在教堂墓地踢球的青少年创立。当前各地在地理和社会因素上与弗卢米嫩塞的距离，已成为了衡量足球热潮将在巴西不断发展的省城传播得有多远和有多快的标尺。

IV

安娜·阿梅利亚和阿帕里西奥·托雷利的诗句表明，足球已进入了巴西人的诗歌和信件中。在视觉艺术领域，首幅球员画像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罗多尔夫·詹贝朗德于1914年创作的《带球的男孩》和伊斯梅尔·纳里于1917年创作的《进球》。救世基督像的设计者卡洛斯·奥斯瓦德此前在博塔福戈俱乐部的墙壁和天花板创作了壁画，把足球运动员塑造成希腊神话中的半神。第一首与足球有关的录制单曲于1913年发行。《足球》就是由萨克斯管、长笛、尤克里里和吉他所演奏的波尔卡和华尔兹系列舞曲中的一支，由格鲁普·利马·维埃拉在《78s》中一起发行。然而，对于巴西城市公众文化圈的小世界，报纸是足球最经常被审视和探讨的地方。绝大多数的评论是正面的。三位巴西文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弗拉尼翁·佩克索托、恩里克·科略·内托和奥拉沃·比拉克均撰文肯定了足球，他们均是久负盛名的文学研究院成员。

恩里克·科略·内托是一位来自北方马拉尼昂州的混血儿，留着大胡子，父亲是巴西白种人，母亲是印第安原住民。他成名于19世纪末的里约，是一位极其多产、行文华丽的记者、诗人、小说家兼剧作家。他同时也是弗卢米嫩塞的支持者。这项运动于1908年首次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斯芬克斯》中，小说讲述了里约的一位英国人詹姆斯·马林在星期日的下午神秘失踪，原来他是去看球赛了。科略·内托自己也是观看比赛的常客，他称自己在观看14个孩子中的几个在弗卢米嫩塞青年队踢球时，一天就能看多达4场比赛。其中的一个孩子若奥此后开始了漫长且多样化的竞技生涯，他在体育界的名字叫佩雷瓜伊诺，曾为弗卢米嫩塞和巴西国家队效力，在1930年世界杯上担任巴西队队长，同时还涉足水球、排球和田径领域。据坊间流传科略·内托是首次闯进巴西足球赛场的带头人，当时是为了抗议裁判在弗卢米嫩塞对阵弗拉门戈的德比战中的一个判罚。他也为俱乐部创作了一首赞歌，歌词难以置信地契合了《去蒂珀雷里路漫漫》的曲调：

弗卢米嫩塞是锻造我们能量的熔炉，

于空气中，于明媚的阳光下。

公平的战斗充满喜悦，

我们尽一切努力成为男子汉的典范。

振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巴西。

与许多和他来自同一阶层的人一样，科略·内托吸收了种族生物学模式和欧洲科学种族的优生行为计划。如果欧式巴西想要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就得走出去，适应环境。科略·内托认为，“.....一个新兴的民族会将他们死气沉沉的文化遗产抛诸脑后.....”⁽²⁰⁾球员就是新兴巴西的竞技与优生观念的传教士，而对于那些不踢球的人，他总是不停地倡导人们在清新的空气中走走路，或进行贝登堡式的侦查和游泳运动。

阿弗拉尼翁·佩克索托是巴西众所周知的一代名医，是20世纪初公共健康和心理健康现代化改革的领军人物。1918年他曾透露自己是一名球迷。科略·内托将他对于足球的热情基于人种的生物学理论，总体上佩克索托认同这种观点，而自身的科学和医学知识让佩克索托看到足球对将国家塑造得更有文化性和教育性所做出贡献。“足球，这项运动让我们强壮、健康，”他坚称，“它教会我们纪律与秩序，要求合作和团结.....这是一所一流的学堂，将重新塑造巴西的国家性格。”⁽²¹⁾但对于个人性格还不够。足球的重要性，至少以英国人和德国人那种方式去踢球的重要性，在于它赋予了个体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来这儿的拉丁人和所有的拉丁人一样，彼此没有联系，不会为了群体而放弃自身独立性，而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赐予一个民族力量，赋予一个国家胜利。那些.....安格鲁·萨克逊人受过教育因而自律。一个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才会有价值，球员并非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团队”的一部分而存在。这种在种族间和个体上的长期合作总能确保他们所争取的最终胜利。体育中如此，生活中亦如此.....⁽²²⁾

一些足球比赛的反对派和这些民族主义者活跃在同样的文化圈里，却运转着不同的逻辑观点，比如里约地方法官兼新闻记者卡洛斯·苏塞金·德·门冬卡。足球无法成为提高国家储备的一种方式，反倒成了衰退和堕落的途径。在1919年撰写的《体育和巴西青年的堕落》一书中，作者声称“一般而言体育项目，尤其是足球，孕育了理性和知性”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它的热情和愤怒的情绪反倒是削弱了理性和知性。足球是“传播愚蠢行径的微生物”。⁽²³⁾利马·巴雷托和格拉希利阿诺·拉莫斯均是足球批评家，他们身处这个框架之外，然而对此的观察却更加敏锐。

巴雷托是那个时代一流的讽刺作家。他是一位黑白混血儿，出生于并不富裕的里约中产阶级家庭，以小说家和城市生活编年史作家为职业谋生，他拥有犀利的视野，不仅仅能看到里约富丽堂皇、传说中的一面，还能洞悉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事情。他的讽刺矛头直指旧共和国僵化的特性，即上流社会暗中对国民的黑白混血儿天性感到羞耻。他抨击他们的阿谀奉承、崇洋媚外，并使用本地方言让文字变得辛辣，这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他对欧洲之于巴西的影响心怀戒备，在这样的戒心下他对这项运动进行了谴责：“将傲慢和可恶的英国职员带入到我们之中。”他谴责用公款去支付上流社会俱乐部和足球锦标赛的花销，而那么多的社会需求却遭到了无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项运动十分野蛮，它导致球迷群体产生的感情亦如此。“足球是一所暴力和野蛮的学堂，不应该得到公共权力机构的保护，除非这些机构想教我们如何杀戮。”写完这段话一年后，1920年在描述里约11人队和圣保罗11人队之间的一场比赛时，他记录下了巴西足球赛场上有史以来的首次火爆冲突。在拉拢了其他对这项运动有意见的的医学和社科批评家后，他在1919年发起了反足球联盟，声称：

“不可能不提到人们称之为英式的运动。每天中的每时每刻，它都让我们的报纸充斥着新的暴力行为，不仅如此，还有杀戮。警方不可能看不到这种行径。里约热内卢是一座文明城市，绝不能落入那些伪装成体坛人士的暴徒之手。那些斗鸡行业的赌博者的表现都比这更好。在他们当中不会存在问题，也不会有争执。赌博都是在平和的氛围中进行的，警方无须介入。而那些所谓的‘足球运动员’则每周日都会卷入争议与互殴当中，警方却只是拍了拍他们的头。”⁽²⁴⁾

巴雷托还指出，足球似乎还让观看比赛的女性变得粗俗。他在评论一场比赛的女球迷时写道，“最值得欣赏的是她们的语言。粗话形式丰富多彩、感情强烈，只有码头上手拉车的那些人的语言能与她们的措辞媲美。”

格拉希利阿诺·拉莫斯出生在东北部的阿拉戈阿斯州，虽然他在里约生活了很长时间，但塑造他写作风格和思维方式的是他的家乡文化。拉莫斯随后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曾在瓦加斯统治期间入狱，他无疑反对比赛的贵族气息，但他以东北部人民的身份发出了他最有力的抨击。在1921年发表的《记录报》上，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种来自异域和大城市的运动在东北部将无法流行起来：

“为什么非得是足球呢？让年轻人去参与国家传统运动锻炼身体难道不是更好吗？比如格斗、舞棍、飞刀，而不是同国外的运动混杂起来。我并不排斥来自国外的事物，但我喜欢先看看我们能否吸收这些事物。

即使可以，为什么整个国家的文化就应当呈现出异域色调呢？为什么关于新兴的、现代化的巴西都必须建立在南方城市的基础之上呢？

重新拾起被抛诸脑后的当地运动：棍术、拍掌、掰手腕、跑步，这些运动对于热衷高风险活动的市民而言是多么有用，如偷鸡、擒公牛角、跳跃、骑马以及最重要的绊脚游戏。运动起来！这才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运动！”⁽²⁵⁾

拉莫斯此后几乎没有再写过关于足球的文章。而巴雷托在1922年就英年早逝了。巴西足球失去了最有出色和最犀利的批评家。一切将会变得更糟糕。

V

阿根廷俱乐部曾于1907年和1912年到访，随后意大利俱乐部普洛维尔切利和都灵队也曾来访，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这些比赛在参与者的思维或大众的想象中从未被认定是国际比赛。1910年，阿根廷足协曾邀请巴西代表队参加五月革命百年庆典，正是五月革命开启了阿根廷人脱离西班牙帝国统治的过程，然而巴西并未派代表队前往。

英国业余球队科林蒂安——一批云游四方的贵族运动员——曾于1910年和1913年做客里约和圣保罗，这更加接近国际赛事的诞生。精心选拔的巴西11人阵容成了他们的对手之一。此外，人们开始注意到一种球风上的显著差异，英国球队看起来始终更倚重身体条件，组织得更好。1914年英国职业球队埃克塞特城于南美巡游时中途在里约逗留，在这座城市踢了三场比赛。他们0比2不敌里约精英11人队的比赛被公认为是巴西的首场国际赛事，并且也是巴西队的首场胜利。

刚成立不久巴西足协——巴西体育联合会（简称为CBD，是CBF的前身）派出了同一阵容出战当年晚些时候在阿根廷举办的胡里奥·罗卡杯。罗卡曾两度担任阿根廷总统，阿根廷政府曾对当地印第安人实行近乎种族灭绝的政策以将他们驱逐出潘帕斯，罗卡就是负责人。然而这个比赛，他如是说道，“是为了鼓励参与这项崇高运动的年轻人，为了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巴西凭借前锋阿图尔·弗雷登里希的全场唯一进球赢下了三场比赛中的第三战。这个事件本身并不起眼——除了进球者是一位黑白混血儿的事实。^[26]

弗雷登里希的父亲是德裔巴西人，母亲是非裔巴西人，双重遗传条件让儿时的他能够踢上城市里的自由式街头足球，由于父亲是SC日耳曼尼亚队俱乐部的成员，这也让他能够从俱乐部的训练和设施中受益。成年后他主要效力于上流球会的俱乐部保利斯塔人竞技队，并曾经毫无疑问是他那个时代的头号射手以及媒体的宠儿，乌拉圭媒体为他取了个绰号叫“老虎”，而巴西媒体则称他为“金靴”。一位特征明显的黑白混血儿能够成为圣保罗的一流球星，这表明了巴西的种族分化并非不可逾越，说明了才华与社会等级在某些场合能让人忽略肤色。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这般好的待遇。里约摄影师之子混血儿卡洛斯·阿尔伯托在1916年曾效力于二线队美洲队。他得到了召唤，有机会参加一线队弗卢米嫩塞的比赛，当然，他抓住了机会。马里奥·菲利欧在大约十年后将这件事当作一则寓言故事来讲述。据他介绍，那位球员姗姗来迟，站在首发队友的身后，他在更衣室里耽搁了些时间，因为他要用米粉抹在脸上让肤色变白。当他为弗卢米嫩塞出战旧主美洲队时，球迷对着他高唱“白色粉末”，此后弗卢米嫩塞自己的球迷也都这么称呼他。

阿根廷球迷和作家的种族歧视观念也不会比巴西人缓和。他们的报社将1916年征战南美锦标赛（美洲杯前身）的巴西队称为“猴子”。诸如此类的种种情况对于巴西足球权力机构而言是一种极度尴尬的境地，因此他们在第二年的锦标赛上派出了一支全部由白人球员组成的球队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巴雷托从未如此尖锐地写道：“足球的神圣学院聚集在一起，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派遣带有一点点黑人血统的球员出战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锦标赛……我们的反击是，阿根廷人并不以肤色来区分我们。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全都是猴子。”^[27]

故而到了1919年，当巴西首次举办南美锦标赛时，足球成了一方舞台，舞台之上的巴西人开始决定了这个国家真实的身份。锦标赛印证了里约足球热潮以及这项运动作为国家象征的程度，大约有200000人到

场观看了7场在拉兰热拉斯举行的比赛。巴西和乌拉圭之间进行的决赛，有不可思议的25000名观众涌入了仅能容纳18000人的球场，还有约5000人爬上球场四周的山坡和树梢，更多的人被挡在球场之外。数以千计的人们汇聚在里约广场以及一些宽阔的大街上，在那些地方会有广播不断播报实时赛况。总统下令让银行和政府机构提早关门。总共进行了4场加时赛，0比0的僵局才被打破。阿图尔·弗雷登里希攻入了制胜球，人群爆发出一波又一波“巴西万岁！”的口号声。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总统出席了这一特殊的场合，谈起球队时他说道：“我以国家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这是一场由欧裔和非裔足球运动员取得的巴西式胜利，伟大的长笛手、萨克斯管吹奏者兼作曲家皮辛古因阿送上的庆祝最让人难忘。他的歌曲《一比零》，事实上他的超级乐队“神奇八重演奏者”在那个时代所创作和演奏的所有音乐均为复杂和原版非洲式巴西旋律、美洲爵士风、欧洲华尔兹和波尔卡风格的混合体。这种混搭无疑也是巴西这个国家以及巴西足球的未来，但人们需要熬过旧共和国时期挣扎和崩溃的十年方能开始将其变为现实。

-
- (1) M·德·安德拉德，《马库纳伊玛》，纽约：兰登书屋，1984年
- (2) 保罗·门德斯·坎波斯引用，“通信”，《每天下午》，里约热内卢：巴西文明出版社，1981年，第92页
- (3) 详见何塞·莫拉埃斯·多斯·桑托斯·内托，《游戏概述-足球在巴西的开端》，圣保罗：Cosac Naify出版社，2007年
- (4) 此段大部分引用自V·德·梅洛和J·曼甘，“财富之网：19世纪里约热内卢文化背景下的现代运动”，《国际体育史杂志》14（1），1997年，第168-173页
- (5) 同上，第170页
- (6) A·汉密尔顿引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运动：英国对巴西足球的影响》（An Entirely Different Game: The British Influence on Brazilian Football），爱丁堡：主流出版社，1998年
- (7) 同上，第44页
- (8) 引用同上，第40页
- (9) 查尔斯·米勒给《班尼斯特宫廷学院》III（31）杂志的信件，1904年3月，汉密尔顿于1998年再版，第42页
- (10) 详见T·马森，《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 (11) T·马佐尼引用，《巴西足球历史1894-1950》（História do Futebol no Brasil 1894-1950），里约热内卢：编辑阅读出版社，1950年，第69页，以及马森，1995年，第12页
- (12) B·布阿尔克、J·马拉伊亚、L·恩里克和V·安德拉德引用，《巴西球迷》，里约热内卢：7Letras出版社，2012年。
- (13) 马森，1995年，第14页
- (14) 若奥·度·里约（若奥·保罗·科略·巴雷托的笔名），《蓓尔美尔街的里约-足球》，出自报纸《O Paiz》，1916年9月4日
- (15) 布阿尔克等，2012年
- (16) A·托雷利，“足球比赛”（Match de foot-ball），M. 佩卓萨版，《进球字母：巴西文学中的足球》（Gol de Letra: O Futebol na Literatura Brasileira），里约热内卢：Gol出版社，1967年，第112页
- (17) A·贝罗斯引用，《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Futebol: The Brazilian Way of Life），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 (18) L·巴雷托，“我们的运动”，《A. B. C. 》，1922年8月26日
- (19) G·博克蒂引用，“意大利移民、巴西足球与民族意识的困境”（Italian immigrants, Brazilian football, and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identity），《拉丁美洲研究日报》40（2），2008年，第275-302页

(20) L·佩雷拉引用,《感官游戏:里约热内卢的足球与文学》,S·查洛卜和L·佩雷拉引用,《计算历史:足球在巴西社会与文学中的历史章节》,里约热内卢,新边境编辑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

(21) 阿弗拉尼奥·佩克奥托,“为了赢得足球”,《商报》,1916年10月25日

(22) 同上

(23) 卡洛斯·苏塞金德·德·门东萨,被L·佩雷拉引用,《足球热:里约热内卢社会历史,1902-1938》(Football mania: Uma História Social do Futebol no Rio de Janeiro, 1902-1938),里约热内卢:Editora Nova Fronteira出版社,2000年

(24) L·巴雷托,“反抗足球联盟”,《里约日报》,1919年3月12日

(25) G·拉莫斯,笔名为J·卡利斯托,“印第安”,《印第安人的手掌》,1921年

(26) 详见M·库里谈弗雷登雷希,《阿图尔·弗雷登雷希(1892-1969):巴西足球档案》,《足球与社会》,2013年11月18日

(27) L·巴雷托,“幸福的足球”,《卡雷塔》,1921年10月1日

第二章 摩登时代？足球与旧共和国的灭亡（**1922-1937**）

发动机的轰鸣欢庆着这场胜利。

足球场仿佛成了被排空了的水箱。

米奎琳娜沉浸在忧伤里，容颜憔悴。

——安东尼奥·阿尔坎塔拉·马查度，**1927**年

I

就在十年前，巴西的诗人们一直笔耕不断，创作诗歌来赞美足球的超凡力量，将足球运动员塑造为南方新生的希腊神明形象。1927年，安东尼奥·马查度发表了短篇小说/散文诗《科林蒂安（2）对阵帕莱斯特拉（1）》，在其作品中，他用机器时代的隐喻——发动机和水箱来描绘足球。工业城市里的足球运动不再是史诗般的宏伟叙述，而是变成了含蓄婉转的片段描述。在工业化城市及文化方面与之相关的“现代主义”的形态下，现代性已经来临，并开始重塑巴西足球文化。1923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了《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一文，她这样写道：“大约在1910年12月，人性发生了变化。”随后，D·H·劳伦斯在文章中将旧现代时期的终止时间定义的稍晚了一些：“旧时代是于1915年结束的”。作为大西洋现代主义的大祭司，埃兹拉·庞德则坚称现代性的到来是在1922年，也就是他所说的“元年”，即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新历启用之前。当时，鉴于巴西显著的前现代时期的种植园经济和周边地理环境，人们料想巴西很有可能会落在时代的后头。然而，在巴西最发达的地区——里约热内卢和日渐发展起来的圣保罗，巴西在科技与文化方面明显表现得早熟。^[1]

世纪之交，也就是卢米埃尔兄弟初次进行电影试验后的几年内，法国的电影技术和设备传入巴西。当时无线电广播早已在欧洲许多国家得以实现和推广。1922年现代艺术周在圣保罗的市政剧院开展，彼时圣保罗已在全球新兴先锋派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成了那个世纪自巴西独立以来文学和艺术界唯一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同年圣保罗随后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开端，这些活动宣告了巴西社会现代化的诞生，同时也暴露了旧共和国政治文化结构的局限性。

1922年9月，独立一百周年国际博览会在里约热内卢拉开帷幕，现代艺术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对此次展览会的刻意还击。这次活动由政府发起，既是交易会，又是文化艺术节，还是城市发展规划，试着将独特的欧洲怀旧之光照进巴西。圣保罗的艺术激进派希望能够展现与众不同的一面。但在分出伯仲之前，巴西还得经受6个月的变化和动荡。当年4月旧秩序似乎还牢不可破，在总统大选中，候选人阿图尔·达·席尔瓦·贝纳德斯获得了前任总统以及咖啡产业巨头的青睐，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共和党对手尼洛·佩萨纳。然而反对派操纵选举，破坏胜利的果实，进一步给联邦政治和总统制抹黑。尽管贝纳德斯赢得了多数选票，但在其执政的4年里，大多数时候他不得不动用军队来维持统治，在里约热内卢实施戒严，还建起了关押反对派的亚马逊拘留营。而实际上仅有不到5%的成年人参与了总统选举投票，而且两位候选人都不是巴西广大新兴城市阶层的代表，也不以他们的利益为己任。

1922年，为了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人们做出了三次不同的尝试。首先，巴西共产党（PCB）在里约热内卢海湾对岸的尼泰罗伊市成立，尽管规模较小，在一段时间内也不具备合法性，但日后却成了颠覆共和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长期仅服务于富人的巴西天主教会开始宣扬一种更加激进的神学理论，通过开办天主教工人阶层的社交俱乐部并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活动，试图在工业化的巴西确立一种物质与精神一体化的身份。最后，同年7月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及对巴西超现代化的渴望已经深入人心，军队里憋着不满情绪的底层士兵终于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驻扎于里约市科帕卡巴纳要塞的部队迅速将现代化起义的标准进一步升级，他们随后在大街上遭到了武力镇压。此后诸如此类事件还将发生。

1922年，伴随着《尤利西斯》和《荒原》的问世，全世界的现代主义艺术创作达到高潮。同年二月中旬，圣保罗现代艺术周作为全球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市立剧院开展。但活动展示出了独特的现代主义特征，并向欧洲中心主义发起了挑战。活动的组织者是画家艾米利亚诺迪·卡瓦尔康蒂和知识渊博的混血儿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二者在圣保罗的艺术家、音乐家、雕塑家和诗人圈子里交友甚广，后来的几十年里，这批人成了国家精英文化阶层的核心人物。这个圈子中的主要人物都曾游历欧洲，并将部分现代主义运动精髓带回了巴西：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汲取了意大利未来主义中的野性主义宣言和机械美学，画家安尼塔·马尔法蒂先后将德国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的手法与风格引入巴西。安德拉德、迪·卡瓦坎蒂等人带来了民族主义的激进形式，重视艺术灵感来源于巴西本土而非欧洲的理念，将这些引入世界主义的先锋潮流。安德拉德已开始投身于他一生的事业——汇编巴西本地的民间传说和音乐；作曲家海特·魏拉·罗珀斯尝试着将现代主义融入现代古典音乐；诗人梅诺蒂·德尔·皮齐亚辩证地提倡“巴西本土的巴西化”，并极大地认可了非洲对巴西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而又时常不容易被发觉的影响。现代艺术周的内容包括朗诵、展览、讲座和音乐会。这可把许多思想陈腐的观众吓坏了，有的唏嘘不已，有的夺门而出。里约热内卢的保守派感到震惊之极，巴西学术界唯一参加艺术周的格拉萨·阿拉尼亚因此遭到了他的保守派同僚的抛弃。

当这些艺术家们采用由欧洲现代主义演变而来的手法来创作新作品时，他们潜意识里会试着将其应用到巴西文化背景中，以达到各自的目的。两大主题脱颖而出：其一，从今以后巴西艺术的正常主题都必须包含都市语言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提出的巴西食人文化观。巴西食人文化观更多是一种修辞手法，而非条理清晰的人类学理论。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认为巴西文化是吸收与消化的产物，是咀嚼欧洲、非洲以及当地土著文化的血肉而后自我改造而成的结果。如果说一开始时足球并不能显而易见地成为巴西现代主义文化的缩影——1922年时足球在他们眼中还是外来物——那么足球可以成为他们笔下的绝佳题材。创作真正的巴西艺术需要艺术家们走出画室，来到大街上，审视市民阶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件。这必然会涉及城市中的地方特色词汇，以及转述别人的话时的一些古怪的腔调和字眼。这两条规定在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的诗歌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二者的诗歌并无关联——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足球是都市景观中随处可见的特征。在长诗《幻觉之城》中，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将城市中足球比赛日的一些微小片段、场上场下一闪而过的动作以及关于球赛的断断续续的交谈拼接到一起，而此前诗人自己都未曾想过这么做是否有意义：

今天谁在踢球？园林美洲队的保利斯塔，

那是一片玫瑰与足球的花园！

弗雷登里希进球啦！角球！

那个裁判！

你问我喜欢比安科吗？我爱死他了。

巴托怎么样.....

那位不可思议的与我同名者！

徒劳与开化.....⁽²⁾

在小说《若奥·米拉马尔激动人心的回忆录》中，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将足球描绘成都市梦境中的一景，在那儿进球如电车般飞驰而过，空气中弥漫着足球颂歌，足球比赛呈现出了歌舞厅的风采。

进球如电车呼啸而过，

加油啊！

锦标赛的梦游者

和尘埃。

伴随着午后的欢愉

网球少女摊开裙摆

在保利斯塔跳起了

斗牛舞⁽³⁾

马里奥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都曾对足球运动有过疑虑，事实上，他们都认识到了足球的发展恰好契合了他们对食人文化的定义，在这种文化中，巴西能够吸收、消化和重塑欧洲与非洲文化。马里奥像参加狂欢节和舞会般庆祝足球比赛的进行，奥斯瓦尔德在其随后的著作中将足球描述为现代主义的宗教形式。梅诺蒂·德尔·皮齐亚甚至还为巴西第一部虚构的足球电影《足球冠军》（Campeão de Futebol）写剧本，影片于1931年上映，由阿图尔·弗雷登里希和那个时代的其他球员主演。毫无疑问，这部电影并非现代主义诗歌，而是一部简单的流行喜剧，反映出作者正稳步迈向巴西政治文化生活的超民粹主义右翼。或许涉及足球最著名的作品要属安东尼奥·阿尔坎塔拉·马查度的短篇小说/散文诗《科林蒂安（2）对阵帕莱斯特拉（1）》，虽然他并未参加现代艺术周，但也属于同一个圈子中的人物。德·安德拉德的小说只有简短的描述，而马查度则记录了整场足球比赛，捕捉下了在帕尔克·安塔克蒂卡球场帕莱斯特拉主场比赛中的一举一动，以及围绕比赛的复杂社会和心理过程。

球落在左边很远的地方。

看台上的球迷站起身来。

她屏住呼吸。叹了口气：啊！

米奎琳娜把指甲掐进约兰达胖胖的手臂。

方形绿茵场的四周，两万人渴望胜利。

杀红了眼。触电般神经紧张。

身上的衣服有黑的，白的，蓝的，红的。

在帕尔克·安塔克蒂卡球场，足球令人生恨。⁽⁴⁾

短短的十年内，在支持者的想象中，足球的形象从科略·内托所描绘的充满清新空气的狂欢节变成了一种集体精神崩溃。

II

1919年举行的南美足球锦标赛决赛被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胜利。然而，尽管黑白混血前锋阿图尔·弗雷登里希参加了决赛并攻入制胜球，巴西足坛和政治界名流们仍然拒绝接受巴西是一个各民族混合国家的观念。1920年，比利时的阿尔伯特国王对巴西进行了国事访问，为了向其表达敬意，巴西安排了许多正式场合的活动，其中最隆重的一项活动是各个体育俱乐部在拉兰热拉斯球场的游行。不像1919年的国家队，这次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圣保罗或巴西其他地方。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头的绝大多数是由白人球员组成的俱乐部代表——弗卢米嫩塞、弗拉门戈、博塔福戈和美洲队，而来自郊区的小部分偏向于工人阶层的俱乐部，甚至是多民族混合的俱乐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摄影师记录下了当天的情景，足球与赛艇队的队员穿着各自俱乐部传统颜色的队服在比利时国王和众多巴西内阁成员前面站成排，手持划桨：一个清一色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国家绽放着欧式的生命力。

次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1921年美洲杯前夕，巴西总统埃皮塔西奥·佩索阿下令，国家队不会征召黑人球员参加锦标赛，以免整个国家因非洲人和黑白混血儿蒙羞。

正是一种类似于这样的冲动，要向全世界展示巴西种族血统健康的改善，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国家形象。这也推动了1922年举办独立一百周年国际博览会的计划。巴西的政治联盟和利益集团对此抱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期望，博览会将与都市环境转型的宏伟计划紧密地连在一起，巴西在21世纪成为许多大型体育活动的主办方，都是抱着这种期望。1917年，博览会将要举办的消息被首次公布时，《纽约时报》报道了主办方试图“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的物质与美学转型做出令人满意的计划，从特殊的视角来看待谋求发展的可能性”。⁽⁵⁾

世纪之初里约热内卢已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变革是由激进主义市长佩雷拉·帕索斯发起的。为了摆脱城市传染病的威胁，建造一座符合上流社会野心的首府，里约热内卢得以重建。一条条隧道穿过崇山峻岭，延伸至人迹罕至的科帕卡巴纳海滩更远的地方；沿海的路面铺设了城市的鲜明标志——黑白镶嵌的拼花地砖。在旧城区中心，大片底层人民居住的破房子和建于18世纪的狭窄小巷被拆除，采用欧斯曼风格建造了公共广场和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则是宏伟的市政大楼。举办1922年博览会的地点位于中心区的西南角，方案如出一辙。离海岸线不远的卡斯特罗山被铲平了，连同被清除的还有那些年代久远的贫民窟自建房，这些仅仅是当时因城市重新规划而被迫搬迁的居民中的一部分，此后搬迁成了承办大型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经过合理的清理，里约热内卢向全世界展现了一座欧式风格现代都市，一座对投资人和旅游者而言都很安全、卫生的目的地，而不是一座充斥着危险和疾病的热带港口城市。

巴西历史上首次有了影像的证据，记录下了这种转变，同时也记录下了拥有足球的城市。早期巴西对电影的接纳意味着，在新世纪的头二十年中许多短片已被制作出来，这其中就包括超过12部的足球比赛录像。1922年，巴西电影向时间更长、结构更好的纪录片迈进了一大步。这个过程里的领军人物是摄影师西尔维诺·桑托斯，他受政府机构的委托，制作关于他位于亚马逊州的家乡玛瑙斯市以及关于百年博览会的片子。他所制作的关于里约的影片名为《梦幻之地》（Terra Encantada）。影片气高志远并且富有新意。不同于往日一两盘的短片，该纪录片在巴西全线上映，播放时长达两个小时。影片拍摄了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作为都市场景，采用了淡入淡出的手法，摄像头似乎在捕捉这座新兴城市川流不息的动感。虽然只有13分钟的原片留存了下来，但在这段残缺不全的短片中仍然可以看到，足球自然而然地成了城市画卷的组成部分。除了熙熙攘攘的林荫大道、时尚的咖啡馆、狭长的白色沙滩和带着装饰物的建筑，桑托斯的影片中还

包含了拉兰热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足球赛。弗卢米嫩塞的先生们对着一大群拥挤而且似乎也很嘈杂的球迷高举着旗帜，上面写着标语：弗卢米嫩塞足球俱乐部降临里约，这是人类的巨大进步。^[6]

博览会的镜头大多数是国内外的展馆，这些展馆几乎都采用了葡萄牙新殖民主义豪宅的旧式风格，还有的风格好似法国美好时代的甜点。当时欧洲和北美的博览会主要尝试性地以现代建筑、工业产品、机械科技和消费者创新为特色，而里约热内卢的主导产业则是食品加工和出口。除了水上飞机圣克鲁斯号以外，博览会上最先进的科技元素就是游乐园里的过山车和旋转木马。主办方把最大的精力放在了健康、保健和卫生主题上，展览和讲座也都旨在展示里约近期重建的成功，和宣扬共和国的优越论保持统一步调，期待通过创造体育文化来促进一个健康国家的发展。这些内容促使巴西除了承办博览会外还举办了南美洲竞技锦标赛：包括篮球、游泳、水球、田径、拳击和帆船。巴西做了一次罕见的让步，一群帕雷西印第安人被带到里约，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们或许能对民族文化做出一些贡献的考虑。帕雷西人独创了一种球类运动，名叫兹努卡提（zinucati），1915年首先被一名巴西军官偶然间发现。玩法是用头部不停地去颠一个充气橡胶球。帕雷西人身穿弗卢米嫩塞球衣，头发打上了厚厚的发胶，梳成欧式风格、甚至是爱德华时期的发型，他们在拉兰热拉斯球场进行表演，而大多数观众都对此感到迷惑不解。

这些活动在1922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南美足球锦标赛上作为演出的一部分而呈现，然而这并未给比赛带来更多的力量或是赋予比赛更广泛的意义。为了迎接参加1919年锦标赛的各类人群，拉兰热拉斯球场扩建至能容纳25000人，但前来观看决赛的庞大球迷数量仍超过了预期。大约35000人挤进场内，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拥堵在街道上，或不顾安危跑到体育场附近的山上观看比赛。像此前一样，银行和商店提早关了门，人们为聚集在城市主要街道和广场上的球迷搭建了广播。相比1919年的锦标赛，本届比赛更热闹，也更具争议性。在巴西队的一些比赛中有少量球迷闯入球场，同样的情况在巴西对乌拉圭的比赛也发生了，媒体将此役形容为“真正的破坏性场面”。里约警方不得不张贴告示警示公众，他们将动用一切合法职权来维持秩序。

本届锦标赛拥有5支参赛队，在所有比赛踢完后出现了3支球队积分相同的局面——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的积分均为5分。乌拉圭队强烈抗议，认定在球队对阵巴拉圭一役中巴西裁判的执法带有偏向性，拒绝继续比赛。在决赛中巴西以3比0的比分一举击溃巴拉圭队，在巴西政治家和足球人士的眼中扛起了巴西国家大旗。在决赛中阿图尔·弗雷登里希的缺席（尽管他参加了此前的几场比赛），事实上巴西足球圈中任何其他非洲裔球员的缺席，都让本届大赛变成一届不完满的赛事。此役球员主要征召自里约和圣保罗，获胜方球员姓氏中包括了孔茨、帕拉莫内、多明戈斯、巴托，正如这些姓氏所揭示的那样，巴西的德裔、意大利裔、西班牙裔和葡萄牙裔球员均参加了比赛。报纸《公正报》认为这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报纸的头条标题印着：“所有巴西人为这次实至名归的胜利而欢呼雀跃”。报纸《日志》也祝贺了巴西在水球和帆船项目上的胜利，写道：“巴西——称霸水陆的冠军”。参议员本哈明·巴罗佐提议应对对阵巴拉圭一役的门票收入平分给巴西队员，也就是50000多美元，虽然15位球员平分后每人并不能得到一笔巨款，但这仍相当于一位普通劳动人民周薪的20倍。该提议通过了巴西国会的批准，虽然招致广大媒体的抨击，也打破了巴西足协此后对非正规球员的严格要求。一则漫画为球员得到的酬劳而辩护，漫画中4位球员全身伤痕累累，缠着绷带，拄着拐棍对化身为女性的共和国说道：“现在我们想要养老金，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为国征战’的过程中受的伤。”^[7]

有人担心足球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过度重要性。尤其是在与乌拉圭比赛中的积怨和暴力冲突为某些人敲响了警钟，考虑到巴西政府努力动用外交手段抢先于小邻国乌拉圭一步获得国际联盟席位，双方的交锋也明显带上了政治色彩。联邦副主席卡洛斯·加西亚干脆提出停止所有国际赛事的

提议。与此同时，在一则名为《新内阁》的漫画中，总统佩索阿坐在办公室内，一行字显示：他将在午餐时间“越位”。他的垃圾桶上挂着“进球”的标签。一位足球运动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里问道：“为什么政府不成立一个足球部？这难道不比其他任何部门都更管用吗？”⁽⁸⁾

对于继佩索阿之后的总统阿图尔·贝纳德斯和华盛顿·路易斯而言，这样的足球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失为一种令他们满意的分散民众注意力的方式，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两位继任者一直不断对付着军事叛变。最严重的是发生在圣保罗的一起叛乱，一群极端民族主义的底层军官占领了城市，随后撤退到丛林中，联邦军队花了三年时间一直无法将他们抓获。当前形势摇摇欲坠，上层社会的政体受到了攻击。业余足球圈子将会是下一个目标。

III

20世纪20年代，在巴西几个最大的城市，人们对足球狂热程度的一种表现就是报刊对足球报道的版面不断增加。在许多报纸中，报道足球的版面稳步从半页至一页扩展到了六七页，通常足球新闻会出现在头版和末版，并且成为了无数评论、纪实作品和漫画的主题。足球在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中越来越普及，为了迎合这种形势，报社的语言也开始有了转变，许多英语单词和短语融入了巴西葡萄牙语中。最明显的是“足球”的写法采用了“football”或“foot-ball”而非“futebol”，“射门”则用“shoot”代替了“chutar”，“后卫”用“backs”代替了“beques”，粗略的翻译中用“corners”代替了“escanterios”，用“forwards”代替了“atacantes”。一段时间后巴西葡萄牙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丰富、复杂的习惯用语：迪迪的任意球从弧线最高点急速下坠，踢出了一记落叶球（folha seca）。

巴西最早的无线电广播是在1922年百年展览期间播放的，由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工程师搭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在里约和圣保罗搭建的广播台一直用来播放五花八门的歌剧、古典音乐和教育讲座。这项新科技被巴西的足球热潮所占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31年，圣保罗保利斯塔教育电台的尼古劳·图马首次在佛罗雷斯塔球场通过现场直播解说了足球比赛。图马用高级宴会上司仪般的嗓音向收听这场足球比赛的女士们先生们表示了欢迎，他描述了比赛的一些细节以及足球比赛的现行规则，这对于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头一次。

体育版面的扩张与广播技术的应用本身正是劳动人民对足球的兴趣日益增加的产物，一场比赛到场的观众开始稳定在10000人，在地区德比大战中观众人数将会更多。这样的球迷群体意味着财路，金钱和竞争不可避免地让球队掏钱支付各自球员接受训练和参加比赛的费用。早在1913年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圣保罗在这方面就已十分明智，他们不愿同无产者和科林蒂安、帕莱斯特拉的意大利新移民者混在一起，故而脱离了保利斯塔联赛，成立了自己的赛事。事实上，他们的态度非常强硬，1916年他们将搞分裂的苏格兰流浪者排除在外，当时苏格兰流浪者队公开为球员支付薪水。1917年这座城市恢复到仅有一个联赛。在随后的几年间人们开始对私底下为球员支付薪水的情况视而不见，随后在1924年，上流社会豪门球队保利斯塔人竞技最终决定开始努力创建一个真正的业余联赛。这个联赛持续了5年，但是球迷和球员一直在向前看。1929年联赛土崩瓦解，保利斯塔人竞技连同这座城市的足球创始人一起退出了足球比赛。

职业联赛在当时仍然不合法，并且被里约足坛会议上的人士认定为不道德行为。兼任弗拉门戈俱乐部主席与城市竞技体育协会（AMEA）主席的里瓦达维亚·迈耶代表与其同一阶层人士发表了讲话。巴西以里约业余球员组成的阵容出战1923年美洲杯遭遇了失利，反思该事件时他说道，输球总好过“征召保利斯塔的那些为了金钱而踢球的唯利是图者”。在随后的十年间，随着以踢球为职业的情况如潮水般涌现，他几乎濒临暴怒的边缘。他认为，“职业球员就是与妓女厮混的小白脸。俱乐部给了他们踢足球所需的所有物质条件，让他们享受足球，他们却还想赚钱？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在弗拉门戈发生。足球的职业化有辱球员品格。”

业余联赛仍然保留了一项传统，那就是上流社会的封闭足球圈不会接纳巴西贫民，包括非白种人。这种情况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体育层面来看，都不是乐观的发展前景。里瓦达维亚及其家族都不愿意和平民球队混在一起，而最重要的是不能输球给他们，但数十年时间过去了，这两种情况均变得越来越有可能发生。重要的时刻来临了，1923年瓦斯科达伽马派出了最好的黑人球员，踢出了完美的足球，吸引了大批球迷的关注，一举夺得了里约市联赛的冠军。阵中拥有4位黑人球星：赛西、尼克利诺、博劳和内尔森·达·

孔赛萨奥。

瓦斯科达伽马并不是里约唯一的一支乐于派出黑人球员踢球并为他们支付薪水的俱乐部，但他们却一直是最有可能让这种情况变为现实的俱乐部。俱乐部由葡萄牙社区的一小部分商人创建，他们及其子孙们渴望参与运动，但空闲时间又无法与南区海湾的足球俱乐部的贵族和大学生踢球。因此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从社交圈以外去招收球员。葡萄牙社区正好处在城市的新兴工业区中心，而瓦斯科达伽马的主场也在那儿。在路面上、工厂里和大街上，瓦斯科达伽马的球员经常与穷人们接触。鉴于他们的劳动生活中所带有的强烈商业性质，他们认为支付薪水给球员并不是道德败坏。葡萄牙社区也希望能在这座城市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们也乐意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瓦斯科达伽马曾是里约最低级别联赛的球队，此后他们步步升上了顶级联赛，并获得了冠军。

那些豪门俱乐部感到震惊、羞辱和威胁，纷纷退出联赛，强烈谴责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暗地里的职业化做法，并于1924年建立了自己的AMEA联赛。然而没有了瓦斯科达伽马，球迷数量和俱乐部收益也有所下降，广大球迷都涌向了瓦斯科达伽马以及他们所在的联赛。美洲队、班古、博塔福戈、弗拉门戈和弗卢米嫩塞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邀请瓦斯科达伽马以及另外两家受欢迎的俱乐部圣克里斯托弗和安达拉伊加入。重新加入的条件就是必须引进AMEA联赛卡片，每位球员在监督下每场比赛前都必须亲手填写档案卡片，内容包括球员全名、地址、出生日期和出生地，以及他们工作和上学的地址。事实上联赛还成立了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确保审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像操控巴西的选举权一样，信息卡片就是一种粗暴的工具，试图将文盲驱逐出去，这样做的效果等同于将穷人和半职业黑人球员排除在外。瓦斯科达伽马的应对措施是将他们的球员送到夜校培训。

随后联赛开始调查球员的经济和就业状况，但是瓦斯科达伽马的董事们为了掩护他们的球星，在公司中给他们安排了有名无实的工作，而薪水却是真实的。瓦斯科达伽马的支持者们尽一切可能买下每一张彩票，都争着想赢得一辆新车，这一切都是以俱乐部一位球星的名义而做的，这位球星受了重伤只能坐轮椅。1929年瓦斯科达伽马再次夺得冠军，当局做出让步，废除了信息卡片，但仍然将职业化的做法保密。

黑人球员并非在所有的俱乐部都受到欢迎：圣保罗一直暗地里将他们排除在外，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了改善。早在1914年就已有了一些关于黑人球队和黑人联赛的报道，但直到1927年才举行了首场黑人球队和白人球队之间的比赛，当天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赛，以纪念奴隶制的废除。阿雷格里港的格雷米奥俱乐部依然坚持使用清一色的白人球员；里约的美洲队则就派出俱乐部史上首位黑人球员曼特加参赛而完全分成了两派。弗斯托在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深受爱戴，但是媒体却依然将他形容为饥饿的黑鬼，他在追逐皮球的时候“就像在追着一盘食物一样”。^[9]

真正能够衡量瓦斯科达伽马崛起的标志是新体育场的落成。圣热拿利奥体育场由葡萄牙流亡建筑师里卡多·塞维罗设计，短短的10个月就建好了，于1927年4月开放。一时间，这个城市的足球重心从弗卢米嫩塞的拉兰热拉斯球场转移到了北部。圣热拿利奥球场成了巴西最大、最现代的足球竞技场，能够容纳50000名观众。看台呈马蹄形阶梯状，其中一边的专区设有座席，供俱乐部董事和投资合伙人使用。两边看台和顶棚清晰简单的线条与主外墙交相辉映：建筑风格混合了新殖民主义细节、山墙、厅台、顶尖和马耳他十字架、彩色玻璃窗以及装饰性的蓝色瓷砖，将巴西过去欧式殖民风格同都市现代风格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巴西政界、教堂代表以及一些名人出席了瓦斯科达伽马球场的落成仪式，包括总统华盛顿·路易斯和另外五名内阁部长，这突显了瓦斯科达伽马的地位。此前的四年里，里约一直处于戒严状态，直到最近才解除戒严，政治家们因此赢得了观众3分钟的起立鼓掌。球场得到了里约大主教莱米的祝福。葡萄牙飞行员萨尔门

托·德·贝莱斯在瓦斯科达伽马和桑托斯比赛开始前为球场象征性地剪彩，贝莱斯近日刚刚横跨南大西洋在里斯本和里约之间进行了首次夜间飞行。桑托斯在这场疯狂的比赛中以5比3的比分获胜，瓦尔德尼尔·卡尔达在报道中提到球队中锋时称：“他们建造了一个舞台，而我们则上演了一出好戏！”⁽¹⁰⁾

IV

20世纪30年代初，巴西的政治正如巴西足球一样陷入了僵局。上流社会俱乐部仍主宰着足球比赛，并且坚持声称，于共和国时期形成的赛事业余化的意识形态在道德上完好无损，声称商业主义的力量和来自底层阶级的社会挑战是可抵制的。在国家政体中旧秩序似乎一直在运转，1930年3月总统候选人胡里奥·普列斯特斯当选，当时全球咖啡价格下跌，他计划将仅有的一点公共资金用于支撑几家挣扎中的咖啡巨头，而不顾其他地方经济上的困境。自前一年华尔街经济崩盘后，巴西经济下滑了差不多5个百分点，随后的一年相同的情况又发生了。尽管动员了南部和东北部结成广泛联盟，共同对抗圣保罗，但南大河州州长赫图里奥·瓦加斯发现，咖啡大亨对总统位置的控制力不可动摇。

选举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1930年7月由政府出资赞助的巴西国家队前往蒙得维的亚参加了首届世界杯。巴西代表队又一次以清一色的白人球员出战，首场比赛中他们就爆冷输给了南斯拉夫队。虽以3比0的比分完胜玻利维亚队，但巴西还是从本届大赛上空手而归。

瓦加斯及其同盟已意料到选举会失败，并不认同选举中臭名昭著的腐败行为具有任何的合法性。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瓦加斯一个。巴西的法学家、律师、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大都已放弃捍卫国家政体，越来越多地抵制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民族身份，并已开始致力于揭露暴政体的多处局限。军事叛变和暴乱的接踵而至表明，现如今应募入伍的士兵已不再为当初作为共和国建国之本的体制而战，军官们也不再相信其价值。旧共和国的根基越来越不稳固。

瓦加斯原本计划在选举结束后立即发动一场政变，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等待时机成熟。他的竞选伙伴佩索阿因为卷入一起桃色事件而遭暗杀，瓦加斯抓住了时机，和一群志趣相投的州长们一起动员武装力量，并说服一些联邦部队加入他们的行列。1930年10月他们在里约举行了游行。时任总统的华盛顿·路易斯被里约军事部队的最高长官说服了，辞去了总统一职。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占领了里约，其中的一两个人还幻想过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当瓦加斯抵达后，他们便将总统之位移交给了他。接下来的两年，瓦加斯开始建立中央集权的巴西联邦政府，这也成了他未来15年中的统治特征。他解散了国会，遣散了军队高层中冷淡的支持者和地方主义者，在他统治的大多数时间内他都启用了紧急状态法，仅保留了一个州长，其余的全都被解雇了，取而代之的是起初忠心于他的行政官员。

旧共和国的灭亡有三大重要原因：首先是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施加的外部经济压力；其次是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和合法性统统遭到了破坏；最后是新兴的上流社会群体坚定不移的改革行动。足球业余化与巴西上流社会对足球垄断的终结也可以归结为与上述类似条件的综合作用。来自日益富有和开放的外国商业足球文化背景下的俱乐部争相签约球员，这种竞争是全球性压力的表现形式。这个过程开始于1925年，当时意大利实业家、扎诺饮品公司和都灵足球俱乐部的老板恩里科·马罗诺·扎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差，途中他看到了前锋胡里奥·利博纳蒂为纽维尔斯老男孩踢比赛，当场签下了他。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足球比赛的决赛在两支南美球队之间进行，这使欧洲各国对南美洲人的足球天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们提供的汽车、公寓和惊人的薪水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具有意大利血统的球员尤其受到俱乐部以及意大利法西斯当局的青睐，意大利法西斯预谋让运动员化身为祖国的代表。1930年曾效力于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的伟大前锋阿米尔卡和梵尼兄弟离开了圣保罗，加盟罗马城的拉齐奥队。1931年意大利经纪人再次来到巴西寻找运动员，尤其是圣保罗，那儿聚集了大量的意大利移民。有一次他们从科林蒂安和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总共挖走了9位顶级球员。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也不完全是为了钱，还关乎骄傲与尊重。其中一名叫里

泽蒂的球员说：“难道剧院里的艺术家们不该受到尊重，享受掌声吗？嗯，我也会成为一名用双脚来创作的艺术家。”阿米尔卡对于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以及原因丝毫没有怀疑：

“我即将前往意大利。我已经厌倦当一名业余球员，非职业化的情况很早以前就不复存在了，在虚假体制的遮掩下，俱乐部只是支付小费给球员，而他们自己则留下了大部分的收益。20年来我为巴西足球已经倾尽全力。但是发生了什么呢？俱乐部越来越富有，而我则一无所有。我即将去一个知道如何按球员技术水平来支付薪酬的国家。”⁽¹¹⁾

圣保罗新闻界普遍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一位作家声称，公众无须去关心那些足球巨头的想法，“半打足球巨头是完全依靠这些卖力的球员才能存活下去”。⁽¹²⁾

虽然并没有一家意大利俱乐部愿为新一代巴西黑人球星抛出橄榄枝，但他们还是找到了赚钱的方式。1930年瓦斯科达伽马在伊比利亚巡游时，福斯托和加瓜雷在巴塞罗那下了车，在那儿受到雇佣并拿到工资。来自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的威胁迫使乌拉圭和阿根廷加快了商业化的步伐。随着终将到来的合法职业化足球的日益迫近，顶级球员的工资标准也不断攀升。1932年当时巴西的两位一流黑人球员里奥尼达斯·达·席尔瓦和多多·戈斯·达·吉亚前往乌拉圭，分别加盟了两支死敌球队佩纳罗尔和乌拉圭民族队。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诉求并没有起到作用，不仅上流社会业余化的足球模式无法继续维持，而且众所周知所有旧的上流社会俱乐部现如今也都开始采取措施。1932年里约市美洲俱乐部的主席安东尼奥·戈麦斯·德·阿弗拉打破了沉默，他主动承认球员支付薪水。他号召更多的人坦白承认，并加入职业化联赛。1933年卡里奥卡和保利斯塔锦标赛均公开职业化，不久米纳斯吉拉斯州、巴拉那州和南大河州等新兴地方足球中心也纷纷效仿。

与旧共和国在政治上决裂，需要的不仅仅是外部压力和主动坦白。反对瓦加斯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的斗争在圣保罗最为激烈。1932年7月，里约发起反对政府的武装起义。圣保罗号召发动战争，建立起了自己摇摇欲坠的军火工业，并将阿图尔·弗雷登里希以及其他一百多名球员派上前线。圣保罗广播电台的先锋足球解说员尼古劳·图马从记者席转战散兵坑，在战场上为城市带来战况汇报；这种局面撑了不到半场球赛的时间。圣保罗弹药不足，寡不敌众，最终向瓦加斯投降。瓦加斯既是大方的胜利者，也是无情的对手。他解除了城市武装，但是并没有摧毁这座城。这次占领行动的影响十分平和，因此被这次短暂的冲突粗暴打断的保利斯塔锦标赛很快恢复了比赛，并得以在圣诞节前收官。更妙的是在新赛季的揭幕战中，38岁高龄的弗雷登里希帮助圣保罗以5比1的比分击败了桑托斯，这也是巴西足球史上首场公开化的职业比赛。

⁽¹⁾ K·杰克逊，《一群天才，1922年：摩登时代元年》（Constellation of Genius, 1922: Modernism Year One），纽约：法劳·斯特劳斯·吉罗出版社，2012年

⁽²⁾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巴西-阿根廷”，《坎迪尼亚之子》，里约热内卢：Agir出版社，2008年，第65–68页；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保利塞伊亚·德斯瓦伊拉达咖啡（全诗）》，圣保罗：书圈出版社，1922年；马里奥·德·安德拉德，《马库纳伊马，无名英雄》，贝洛奥里藏特/里约热内卢：卡尼尔出版社，2001年。

⁽³⁾ 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若奥·米拉马尔激动人心的回忆录》（Memórias Sentimentais de João Miramar），圣保罗：环球公司，1991年。

⁽⁴⁾ 马查度，《科林蒂安（2）vs. 帕莱斯塔（1）》，1997年

⁽⁵⁾ 《纽约时报》，1917年1月28日，被C. 加夫尼引用，《里约热内卢大事记和社会空间动态，1919–2016》（Mega-Events and Socio-Spatial Dynamics in Rio de Janeiro, 1919–2016），《拉丁美洲地理报》9（1），2010年，第7–29页

⁽⁶⁾ 《魔法国度》（Terra Encantada）部分足球内容详见：<http://www.youtube.com/watch?v=5cYyVmLhiWs>

(7) J. 曼努埃尔、C·马拉亚·桑托斯、V·梅洛等，《1922年：运动的100周年庆祝》（1922: Celebrações Esportivas do Centenário），2012年，里约热内卢：七封信出版社

(8) 同上。

(9) T·马森，《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第56页。法乌斯托将自己比喻成一个橙子，遭到了足球俱乐部的老板压榨。

(10) W·卡尔达斯，《开球：巴西足球的记忆》，1990年，第88页

(11) 阿米尔卡引用同上，第62页

(12) 弗勒哈·达·曼哈，被G·博克蒂所引用，“意大利移民、巴西足球与民族意识的困境”，1931年7月10日，《拉丁美洲研究日报》40（2）

第三章 巴西特色：足球与新秩序（**1932-1950**）

对巴西人而言，弗拉门戈足球赛要比斯大林格勒战役重要得多。

——若泽·林斯·多·雷戈，**1943**

I

若泽·林斯·多·雷戈是20世纪40年代巴西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常在报纸上发表具有争议性的文章，但在1943年的前几个月，也就是里约州锦标赛接近尾声时，很少有巴西人反对他的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四年，由于巴西距离遥远并持中立态度，战火并没有蔓延至巴西。即便是在随后几年加入同盟国后，巴西也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西都在忙自己的事务。在这20年中，巴西完成了旧共和国的未竟事业：让新兴的大众阶层参与政治，让巴西人更加认同自己的民族，而非20世纪初狭隘的欧洲式上流社会统治模式。足球在二者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0年，热图利奥·瓦加斯发动政变，开始掌权。1932年，在与圣保罗大资产阶级集团的短暂内战中取胜后，瓦加斯通过无限期延长国家的紧急法案继续统治了巴西两年。在此期间，制宪大会为这个政体草拟了一项新计划。1933年这项计划得以完成。宪法同意妇女享有选举权。国会授权瓦加斯在未来四年继续担任总统，此后再进行选举。

在解决完地方分权主义对巴西这个独立国家的威胁后，瓦加斯当时注意到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挑战。三年来，共产党人和民族解放同盟一直在与普利尼奥·萨尔加多领导的巴西法西斯组织——整体主义（AIB）进行宣传战，并发生街头冲突。双方看起来都在直接挑战联邦政府。1935年，军队中的共产党支部在3个兵营中发动政变，但均被迅速镇压下去。瓦加斯抓住这次机会，查禁共产党。1938总统大选之期迫近，由于此前宪法规定瓦加斯不能再参加竞选，于是瓦加斯和他的军事联盟在1937年先发制人，发动政变。效忠部队包围了国会大楼，瓦加斯通过广播宣布建立新国家。不同寻常的是，此次行动几乎没有遭到有组织的抵抗。第二年春天，普利尼奥·萨尔加多和一小部分武装支持者对瓦加斯及位于卡台提的总统府发动突袭，但被轻易打败。就像共产党一样，萨尔加多的行动也遭到瓦解。民权被剥夺，政党被取缔。巴西各州还未来得及将州旗的骨灰装进骨灰瓮存放在历史博物馆，联邦政府官员就已经公开烧毁了州旗。经选举出任的州长和市长全部被里约热内卢任命和控制的监察员所取代。高度集中的行政权与半结合主义的社会模式相融合，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墨索里尼早期通过国家资助的工会控制工人阶级力量的尝试。

高压政治是瓦加斯统治下新政权的基础，但大多数时候都要依靠监控和强制。重大的政治对手要么被放逐，要么从公共生活中隐退，所有人都处在严密监视之下。在中央印刷和宣传部（DIP）的监控下，报刊受到严密管制，对瓦加斯自己的报道也不过是些奉承之词。政治上，瓦加斯允许东北部和农村在地方执政者绝对效忠于他的前提下自行其是。在城市地区，他试图在联邦政府和新兴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一个受欢迎的新联盟。这种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看似不可能的合作之所以被团结到了一起，是因为瓦加斯毫不起眼但杰出有效的谈判技巧及巴西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虽然表现得很分散，但却十分明显。在经济领域，为了鼓励国内经济增长，采取保护主义和关税壁垒；国家主导工业化，创立国有企业（如钢铁和石油化工企业）及政府资助建设基础设施；施行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包括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交换，由政府来控制工人和工会。在文化领域，考虑到瓦加斯并不是那种在任何方面都有个人崇拜并跟随效仿的人，新国家探索的是巴西特色的发展形势，即巴西道路，因此，试图组织形成适合民族主义的国家大众文化。正是在此次辩论中，巴西知识分子和艺术团体积极参与，使这项任务变得容易了很多。

报刊和电台必须使用葡萄牙语，采用外国语言教学的学校要么换成葡萄牙语，要么关闭。联邦政府建立新机构，积极审查并巧妙操纵文化生产的主要领域。国家图书研究所负责规范出版业，而国家影视教育机构不仅控制电影行业还试图参与制定议事日程。中央印刷与宣传部特别关注音乐行业，歌词内容未经仔

细审查，没有盖章，那么，一张乐谱也不能发表，一张唱片也不能发行。在所有这些领域，笨拙的控制手段与巧妙的联合政策相结合。各个相关部门为艺术家、出版社、电影公司和唱片公司提供各种赞助、补贴、奖金，对于音乐业务领域，允许使用电台广播。

在瓦加斯时代，会识字的人所占比例还不到这个国家人口的一半，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影院，广播是唯一的最重要的通信手段。20世纪20年代突然出现的近乎业余的小型无线电电台消失了。联邦政府允许广告和赞助，促使私营广播电台在全国范围内涌现，这些电台的存在都得益于政府的许可。《巴西时间》是一档必播节目，集中播报数小时的新闻、音乐和有教育进步意义的演讲，是巴西最接近全民对话的形式。为了保证每个人都能听到广播，政府在小城镇的公共空间建立扩音器，这些地方的广播电台还相当稀少。

对足球的控制和利用也采取了相同的模式。全国范围内普遍强制使用葡萄牙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与意大利挑起的新战祸）中加入同盟国后，巴西认为可以结束带有可供识别的民族特征的俱乐部，至少要改掉名称（在圣保罗，帕莱斯特拉意大利改名帕尔梅拉斯足球俱乐部，SC日耳曼尼亚改名皮涅罗斯，位于贝洛奥里藏特的帕莱斯特拉改名克鲁塞罗，科里蒂巴俱乐部改为了葡萄牙语写法的科里蒂巴），取缔在内部文件中仍使用本国语言的俱乐部。

1941年，联邦政府重新组建了CBD（巴西足协的前身），建立国家体育委员会。该机构由三位精心挑选出来的公民、一名上将和一名空军元帅组成，有权决定巴西各个体育领域的政策，这就包括解决各大州体育联合会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矛盾。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巴西足球一直为这些矛盾所困扰。另外，还包括禁止妇女踢足球，因为这从道德上、身体上和优生方面都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健康发展。CBD在很长时间内由瓦加斯的仆从路易斯·阿兰哈执掌。阿兰哈是博塔福古地区的地方官，在1930年的政变中积极支持瓦加斯，并在1936年成为CBD的主席。他的兄长奥斯瓦尔多在他的协助下成了瓦加斯的财政部长，另一位兄长奇特罗也担任了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主席。三兄弟都来自瓦加斯的家乡南里奥格兰德州。这个新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一样，由一小群任人唯亲的保守党统治着，他们控制着军队与上层行政部门。

伴随着这些行政改革，政府开始利用足球场作为举行盛大活动的场所，甚至作为巴西特色新文化的大熔炉。1935年，巴西第一届全国教育大会在圣热拿利奥球场举行，教育部长古斯塔沃·卡帕内马、总统瓦加斯以及数千名老师和学生也一起参加了此次大会。会议旨在讨论全国教育的发展方向，话题公开，会议规模宏大，与其说这是一次严肃的学术讨论会，不如说是一次盛大的社会政策商讨会。圣保罗现代艺术周的参加者之一，伟大作曲家海特尔·维拉·罗伯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致力于全国性的音乐教育项目，经常与学校学生和当地唱诗班举行大型的流行音乐会。1940年独立日那天，他在圣热拿利奥球场举行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音乐会，40000名学生和1000多位音乐家演奏了很多不同的作品，融合了欧洲古典音乐与巴西本土音乐。诗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安德拉德深受感动，写道：

“演奏是如此美妙，令人难以抗拒，很多人别无选择，只能留下纯粹喜悦的泪水。透过满是泪水的眼帘，看到了指挥家朦胧的身影。巴西人、印第安人、黑人、工人、混血儿、合唱团、乡民，所有这些人的音乐，他抓住了精髓；河水声、山谷里的回声、洞穴里的轰鸣声、风吹稻谷声、孩子的游戏声、口哨声、笑声，所有这些声音，他融合进了作品。”^{[\[1\]](#)}

如果足球场可以用作展现国家盛况的平台，可以充当全民集体活动的场所，那么也可以用来限制和控制深受大众欢迎的事物。里约的狂欢节和桑巴舞学校一直受到国家政治上的广泛管制。1943年和1945年，

桑巴舞游行重新转向圣热拿利奥球场。在这里，第一夫人戴斯·瓦加斯领导了一次比往常更加有组织的街头桑巴舞狂欢节，节日的主题是由国家拟定的，比如“辉煌的巴西”。

瓦加斯政权培养了一批民族主义教育家和音乐家，但它在城市里最主要的政治上拥护者还是工人。圣热拿利奥球场成了瓦加斯实行巴西特色大团结的主要戏台。为了削弱和驱逐左翼极端分子和自由工会的残余势力，5月1日劳动节成了联合国家政权、工会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时刻。1940年免费公共交通使40000多人能够挤进圣热拿利奥球场，观看瓦加斯乘坐华丽的敞篷车绕足球场一周，向人群宣布国家最新实施的劳动法。广播明星卡洛斯·盖拉多演唱了一首为该场合专门创作的歌曲《工人之歌》，接着，总统签署了将建立最低工资标准的法令。1941年的劳动节也差不多，不同的是，这次为新劳工法庭的成立举办了庆祝仪式。仪式从一场游行开始，队伍由工人们按职业组成，有的身穿运动服，有的身穿工作服。接着，军队表演了运动项目，市民剧院也表演了一场爱国舞蹈。当天的压轴戏是里约两大球队的一场表演赛，最终南区以6比5的比分战胜了北区。

那时，南区一直跟随国家队，时常在弗卢米嫩塞的拉兰热拉斯球场或弗拉门戈的加维亚球场踢比赛，但1939年后，国家队开始在圣热拿利奥球场举行比赛，包括1945年的罗卡杯（与阿根廷队不定期的交锋）和1949年的美洲杯，两场比赛都是巴西取胜。虽然这些比赛都不像过去十年里的南美锦标赛一样，对国家产生建设性的影响，但是它们确实起到了巩固国家和足球之间关系的作用，并预示着在新巴西，足球和国家二者的重心发生了转变，至少在里约是这样，从南区到北区，从海滨大厦到尘土飞扬的郊区。然而，圣热拿利奥仅是一座体育场，瓦斯科达伽马仅是一家俱乐部，而里约也仅仅是一座城市。如果想让足球真正为新国家的民族主义日程计划所用，就必须囊括进更多的人和地区。因此，它开始转向了弗拉门戈，并在圣保罗建造了帕卡恩布球场。

II

瓦加斯政权真正的野心是，一座城市只允许有一个体育场代表国家或者举行劳动节游行。因为有些活动必须在圣保罗进行，但俱乐部的体育场都太小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地市政府开始计划在这座迅速发展为巴西最大城市的地方建造一座新的球场。为了履行1932年内战后签订的宽大、和平条件，联邦政府承担了圣保罗一半的战争债务，政府允许圣保罗创立它的第一所公立大学，而体育场建设项目也得到了政府的鼎力支持。

1936年，帕卡恩布体育场开始动工。它坐落于狭长的山谷之中，而山谷位于两座平缓起伏的丘陵之间，这地方在那时是城市的郊区。体育场靠近开阔的、用来举行礼仪活动的查尔斯·米勒广场，广场与其说是正方形的，不如说是椭圆形的。马蹄铁状的体育场的圆形看台那头毗邻广场。帕卡恩布球场的大小几乎是瓦斯科圣热拿利奥球场的两倍。虽然圣热拿利奥球场采用的是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非常华丽，但帕卡恩布体育场干净整洁、简单大方，从几何学上来说，更符合比例。它在细节之中体现了那个时代豪华轮船、旅行汽车和飞机明快的线条。体育场里的引导标识采用的是无衬线字体，优雅、整齐，而不失现代化。这项综合性设施不只是一个球场，它还包含了一个体育馆以及一些其他运动设施，并对公众开放。

20世纪40年代末举行的揭幕典礼规模也很好地衡量了政府投资这个新体育场的政治意义。随着一阵号角声，警察特定任务队手里举着从里约弗卢米嫩塞俱乐部带来的奥林匹克旗帜步入球场。虽然这是一个比较笨拙的象征，但也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运动中心，也许也可以说，国家认同感从私人的、上层阶级聚集的拉兰热拉斯球场转变为市立的、人民大众的帕卡恩布球场。揭幕式后紧接着是一场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由12000多个来自圣保罗不同运动机构的运动员组成。所有人都统一要求穿白色鞋子、官方俱乐部颜色的衣服，不许戴任何一种头巾。1920年，在拉兰热拉斯球场为了欢迎比利时阿尔贝国王而举行的游行是由里约顶尖俱乐部带领，但是，帕卡恩布的庆祝游行是以两支球队组成的队伍开始的：科林蒂安和帕莱斯特拉意大利俱乐部。然而，获得最大欢呼声的却是圣保罗足球俱乐部，这令人惊讶，因为圣保罗足球俱乐部才成立五年，是由上流社会的俱乐部保利斯塔人竞技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合并发展而来的。这支球队一直对职业足球不屑一顾，现在是完全跟职业足球不沾边，但它继承了圣保罗顶尖足球队的身份。它的名称与徽章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巴西圣保罗人的身份为公众所知。很显然，对观众而言，为圣保罗俱乐部欢呼针对的是总统瓦加斯，公开地提醒他这个城市的骄傲以及对自治权的渴望。

体育场最佳位置上坐的大多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圣保罗市市长普列斯特斯·马亚，里约市长，圣保罗州、里约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监察员，还有瓦加斯，瓦加斯的妻女。市长的演讲具有那个时代典型的特点，阿谀奉承、拐弯抹角、巴结讨好。他不仅仅是颂扬瓦加斯，几乎是摇尾乞怜。他赞美瓦加斯、瓦加斯政权、海军，沉溺于民族优生的幻想之中，说道：“每个公民都能效仿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将巴西扛在肩膀上。”他还指出总统的精神是这个项目得以运行的关键，并询问他的总统阁下是否愿意赏个脸为所有在座的人宣布开幕。瓦加斯的演说就远没那么华丽，他间接地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政治观点：第一，帕卡恩布球场不仅仅是要为运动服务，因为运动必须为其他目的服务：

“这些明快的线条，这一优美的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设计，如果不用来维护和支持新政权建设事业，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建筑符号.....这个具有纪念价值的运动场应该为健康的爱国教育、体育教育和国民教育服务。”^[2]

第二点就不只是对圣保罗市民说的了，而是针对全巴西人民，他们最好不要忘记：

“帕卡恩布球场是你们的，是由你们的付出和努力建造的……但是，你们应该理解，这个意义非凡的体育场标志着圣保罗为巴西服务的伟大。”^[3]

第二天，体育场举行了游泳比赛、拳击比赛和击剑比赛。在这之后，几乎满座的观众接连观看了两场圣保罗的足球队与来自其他州的足球队的比赛——帕莱斯特拉意大利对阵科里蒂巴、科林蒂安对阵米内罗竞技。在巴西，以往都是州内各个足球俱乐部之间进行比赛，这种全国性的比赛还是相当少见。

1942年，帕卡恩布体育场举办了劳动节的庆祝活动，这说明它完全并入了新国家举行盛大活动的场所。大约7万人观看了侦察兵、警察和消防队的演习，对头顶上低空飞行的侦察机表演狂喜不已。坐在南美洲最现代化的体育场的看台上，观众们为沃尔塔雷东达市的工人们欢呼喝彩。这座新城市建立在里约州南帕拉伊巴河的河岸上，巴西将在这座城市建立这个国家，甚至是整个南美洲的第一家钢铁厂。1927年，在业余足球年代，弗拉门戈在里约州锦标赛上赢得了它的最后一个冠军。就像它的邻居和对手弗卢米嫩塞一样，它也属于上流社会的足球和社交俱乐部，成员绝大多数都来自里约的上层阶级。这个俱乐部的主席里瓦达维亚·迈耶是一个敢于发表言论反对职业足球的人，他反对在球场上将球队与人民大众混在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末，毫无疑问，这支队伍成了里约乃至整个巴西最受欢迎的球队。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在东北部的城市如累西腓和纳塔尔以及在他们的家乡里约热内卢，弗拉门戈都能让球场爆满。其他俱乐部也许将自己定位为受欢迎的俱乐部，而弗拉门戈则宣称自己是一支人民的俱乐部。

这一非同寻常的转变是由一位富翁约瑟·巴斯图斯·帕蒂尔哈领导实现的，他是一家印刷公司的老板，并在1936年至1939年间担任弗拉门戈足球俱乐部的主席一职。帕蒂尔哈树立了一个榜样，将公民社会中出现的思想意识与实际行动相结合，为新政权推崇的巴西特色的理念填充了实际内容。在调和了弗拉门戈俱乐部与职业足球之间的矛盾后，帕蒂尔哈意识到，在足球职业化和拥有众多付费观众的新经济环境下，只有扩大成员人数、增加到场观众人数才能获得成功。这就要求拥有一支更加优秀的球队，并在球迷消费越来越多的报刊上制作更加醒目的新闻标题。出于这些目的，帕蒂尔哈筹集资金，在里约南区的海滩新建了加维亚球场。放宽会员资格限制，实施招募活动，十多年间，俱乐部又吸收进了1万名会员。此后，俱乐部又买进了一家报刊——《体育周刊》（Jornal dos Sports），开始与编辑马里奥·费劳合作。他们一起为弗拉门戈制造新闻、大力推广，费劳适时地将弗拉门戈的历史转化成恢宏的神话。如果你不能让人们走向弗拉门戈，那么就让弗拉门戈走向人们。广播电台对弗拉门戈进行全国范围的报道，同时球队在全国巡回比赛，在各个城市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说回到里约，帕蒂尔哈投资了一支新球队后，观众也增加了。首先，他引进了几名阿根廷球员，这些球员几乎组成了半个首发阵容，随后他又引进了匈牙利教练多里·库什纳的战术创新。库什纳将多瑙河流域的足球理念介绍给了里约。然后，为了彰显平民主义，他想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办法，签下了当时最有名的三个黑人球员，福斯托·多明戈斯·达·古伊亚和莱昂尼达斯·达·席尔瓦。这是对全新的弗拉门戈最清晰的诠释。当弗卢米嫩塞的球迷们不断地嘲笑他们为“煤灰”时，弗拉门戈的粉丝却接纳了他们，以此庆祝俱乐部对待贫穷巴西黑人的开明。

伴随着这一场商业体育盛会，帕蒂尔哈脑中形成了一个新方案。对他来说，巴西的年轻人是“弗拉门戈的一代”，通过对运动和俱乐部的热爱，将被重塑成健康的社会化爱国者。弗拉门戈开始为工人阶级的孩子制定一系列教育和运动项目。正如帕蒂尔哈所说：

“我们的课程完全免费对这座城市中所有年满15岁的孩子开放，不论男孩还是女孩，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不论白人还是有色人种。这是一次广泛的民主化的体育活动.....目的是通过训练改进教养方式，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⁴⁾

《体育周刊》也激情迸发地附和：“用信念与热情创造奇迹是弗拉门戈的品质特点.....人类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上，正是这两种美好的情感让他们走得更远——父亲的爱和对体育活动的热爱。”⁽⁵⁾弗拉门戈俱乐部与《体育周刊》拟定了一次比赛，让孩子们将他们造得最好的句子提交上来，句子中必须包含弗拉门戈和巴西这两个词语。获奖者所造的句子包括“弗拉门戈教会你热爱巴西的一切”，还有“弗拉门戈：巴西的哨兵”。

尽管帕蒂尔哈让弗拉门戈发生了关键的结构性的改变，使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冠军，但他并没有为这个俱乐部带来一个实际意义上的锦标赛冠军，最后也没有为平民大众留下多少空间。弗拉门戈俱乐部收取了他们的会费，但它的运营仍旧是由上层机构完全控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两点不足都得到了弥补。此次事件中关键性的人物来自社会阶层的另一端。杰米·罗德里格斯·卡瓦略于1911年出生于萨尔瓦多市。1927年，在一次国内人口大迁移的浪潮中，他乘坐一艘小船从贫穷的东北部来到了正在迅速发展的南部城市。他在这个城市第一次体验到足球是观看弗卢米嫩塞比赛，但在返回俱乐部观看球队训练的途中，他发现前面有围栏拦住了去路。那条道路的尽头，弗拉门戈的球队正在户外训练，他被吸引了过去，并从此再未离开。五年来，卡瓦略一直从体育场的围墙上攀爬进去，一直讨要买门票的钱，并向球员讨要零钱花，直到他在司法部获得一份低级但稳定的文职工作。正是这种从业状况将移民吸引到了这座城市，对少部分人而言，能够得到一份工作就将改变他们的一生。卡瓦略，一个贫穷的外地来的混血移民，现如今已成为了弗拉门戈的会员，娶了一位葡萄牙女人，买得起票来观看俱乐部的比赛。不只是足球比赛，他还参与了弗拉门戈所有的划船比赛，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

卡瓦略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1942年。在那一年里约州锦标赛最后一场、也是决定性的一场比赛的前夕，他一个人在俱乐部会所升起了弗拉门戈的旗帜，并熬夜一整晚，把一大卷印花棉布染成红色和黑色，为第二天的比赛制作了一面巨大的旗帜。旗帜上写着“前进弗拉门戈！”几个大字。他不仅带着这面旗帜来到体育场，还带来了十几位球迷，球迷们一路吹着喇叭，打着鼓地走了进来。人们的第一反应各不相同。观众与俱乐部官员似乎很喜欢他们，但埃里·巴罗索在广播中评论这支乐队无法用语言形容，并为他们取绰号为“恰朗加”——跑调乐队。“恰朗加”毫不退却，还制作了弗拉门戈自己的队服，并在上面手工缝制了象征俱乐部徽章的竖琴。他们也开始参加客场比赛，利用球场上站台区的开放空间，靠近对手，用音乐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这种环境下，弗拉门戈对圣克里斯托旺打进了第4个球后，裁判禁止“恰朗加”进入球场。这件事闹到了法庭，但是当地足协却是支持的态度。里约足协的两位高层马里奥·费劳和瓦加斯·内图认为足球需要这种观众自发组织的盛大的支持场面。

这也许并不是因为“恰朗加”发挥作用了，但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最终，在1942年，弗拉门戈赢得了里约州锦标赛的冠军，并且连续赢得了下两届的冠军，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三连冠。第三次夺冠的情景在马里奥·费劳的短篇小说《春天里的狂欢节》中有记载。在小说中，他写道：“随着一声巨响，比赛开始了，响声如此之大，连值班的警察都被吓得摔倒在地。”真实情景当然没那么夸张，但在这次比赛中观众确实看到了各种烟火。瓦斯科球迷组织（TOV）——一群支持瓦斯科达迦马俱乐部的球迷组织起来的队伍（弗拉门戈“恰朗加”的翻版），在比赛开始前的一段时间，为观众燃放了好看的烟花。在那一季关键性的一场比赛中，弗拉门戈对阵瓦斯科。杰米·卡瓦略决定要给瓦斯科球迷组织一点颜色瞧瞧，他把在家中制作的一颗炸弹带到了球场。这颗炸弹并没有将任何人从球场上轰走，但却让整个体育场浓烟密布，并为炸弹的用法

开创了先例。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弗拉门戈再一次夺冠。乐队和成千上万的球迷涌上街头，游行庆祝。虽然这种行为可能使某些统治阶层感到恐慌，也许还会导致禁止球迷组织活动和燃放烟花，但新国家选择团结这些力量。在得到俱乐部的支持、商业赞助和足协的庇护后，卡瓦略在195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成了巴西队的官方啦啦队队长，完成了他从身无分文的萨尔瓦多市移民到全国球迷领袖的转变历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担任这样一项官职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

III

新国家也许正忙于发展巴西大众文化，甚至公开地开展庆祝活动，但上层阶级和保守党人内心对这种大众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并非完全满意。新政权中很多高级官员受这种想法束缚，因而对待桑巴舞持有这种态度：“我们认为，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所有粗鲁的、没文化的乡巴佬才常常需要通过音乐与文明拉上关系。”^⑥这种想法当然影响到新国家与前任政权对待狂欢节的态度。

1641年，里约举行了首届狂欢节，当时的殖民政府为了纪念葡萄牙君主立宪制的复辟下达了庆祝命令。但狂欢节很快变得失去控制，超出预想，伴随着非裔巴西人的舞蹈和音乐，一群群发了疯的葡萄牙青年在城镇里横冲直撞、胡行乱闹。1900年，里约当局为了消除这些狂暴行为，要求参加狂欢节的人登记身份，将这一深受欢迎的节日明显地变成了有钱人的私人聚会和化装舞会。20世纪初出现了桑巴舞学校——草根阶层建立的有组织的桑巴舞乐队和舞蹈俱乐部——保证了穷人能够自始至终参与狂欢节。在瓦加斯的统治下，作为对政府为花车和服装提供补贴和现金支付的回报，桑巴舞学校必须践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主题必须积极阳光，政府可以利用热情洋溢、积极健康的狂欢节来吸引外国游客。

因此，新国家对待狂欢节和桑巴舞持双重态度。一方面，支持他们带头积极地吸收非洲文化遗产，发展独具特色的巴西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是需要同化和控制的危险分子、邪恶势力、潜在的秩序扰乱者。新国家在对待足球的态度上也是相同的矛盾心理。它希望所有足球比赛的庆祝活动都能有助于国家施行人口复兴计划，球员都能扮演传教士的角色，传播卫生保健的思想和积极健康的爱国教育。很显然，对所有人而言，在一个足球职业化的年代，事情就算曾经是那样，现在也已经不再按政府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了。明星球员受欢迎的程度和财富的多少取决于他们的球技而非正直的道德品质，这一事实与政府对足球的期待大相径庭。莱昂尼达斯和福斯托两位最有名的球员都没能遵照当局推崇的谦卑和服从准则行事，但这并不仅仅只有他们俩。福斯托最终沉溺于奢侈的生活和低酒精饮料。莱昂尼达斯虽然偶尔被政府拉去支持劳动法的贯彻实施，但所过的生活，也与政府希望树立的一个积极阳光的爱国榜样完全背道而驰。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社会名流，也是一个不讲情面的商人，外表帅气、非常上相，喜欢炫耀最新的射门招式，喜欢在比赛结束后的那一天，到里约布兰科游行，接受球迷的欢呼。让当局头疼的不只是球星们放纵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还有巴西足球与“野孩子”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野孩子”是巴西人口中经常提起的人物——活跃的、精明的，依靠智慧和魅力生存的城市战士。莱昂尼达斯言谈举止之间都带着一股随意劲和精明劲，似乎连踢球也是即兴发挥，他射门的招牌动作是“倒挂金钩”。

新政权的保守主义和新思想、新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永远也无法完全缓和，这一点在大众文化的三个重要领域都有所体现：球赛广播、足球音乐和足球电影。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广播是大多数巴西人真正了解足球赛事的主要方式。那时的广播节目严重依赖于歌剧音乐和偶尔上演的戏剧，足球为相当有限的广播节目增加了受欢迎的话题。因此，解说员大多数时候都在介绍足球是怎样被人们接受和理解的。20世纪30年代，尼古拉斯·图马和阿曼多·潘普洛纳是两个主要的解说员。潘普洛纳的解说总是注重礼仪、稍显古板，而图马则语速飞快、断断续续，因此获得了“机关枪解说员”的绰号。加利亚诺·内图在瓦加斯时代后期表现稳健、深受信任，被宣称为“完美的体育解说员”。1938年法国世界杯时，是他负责实况解说巴西队的赛况。

尽管三个解说员都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解说了足球积极健康、有爱国心的一面，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后期确实出现了对足球片面性和浮夸的报道，其中以阿里·芭萝萨为代表。作为作曲家，芭萝萨在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科帕卡巴纳地区声名鹊起，但他同时还是作家、画家、当地议员和弗拉门戈的狂热球迷。他对足球的解说诙谐幽默、极其狂热，另外带有很深的偏见。为了在人群中能让别人听到他的声音，他从一家玩具店买了一把口琴。当看到所支持的球队得分时，他就吹出一阵欢快的旋律，如果是对手得分，他就发出刺耳的声音或是哀伤的降调。有些看不惯的人觉得他的行为和球队偏见非常令人生厌，因此禁止他来体育场，他被迫只能从附近房子的楼顶观看和解说球场上的比赛。据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跑到边线上解说一场巴西和阿根廷之间势均力敌的比赛，由于他言辞上过于偏向巴西，结果被阿根廷球迷和官员群起而攻之。

雷贝罗·朱尼尔是以现场播报极度疯狂、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赛马活动开始他的解说生涯的，他把这一激情澎湃的特点带到了对足球的解说上。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首创了加长版的、极度兴奋的庆祝射门得分的播报方式“球进啦！”，这在后来成为了拉丁美洲使用最普遍最广泛的足球解说词。当时有一个流派认为这种解说方式过于冗长，尼古拉斯·图马曾说：“我认为这种拖长版的进球播报方式是浪费时间，广播员在说‘球进啦！’时要持续20秒的时间，而听众只想知道是哪支球队进球得分。”然而，巴西的广播电台竞争激烈、创新不断，拥有广泛又受欢迎的市场，任何约束都永远不可能阻碍它的发展。广播电台不满足于只有一个解说员，他们开始在看台区安排两个人来解说，并且至少有一个要安排在边线的某处。豪尔赫·库里和安东尼奥·科代罗开创了搭档解说足球的先河，但在边线解说的人当中却是以风趣幽默的热拉尔多·布洛塔为代表。布洛塔开始时站在边线位置，但很快就在球网后影响到守门员，因为在比赛进行中，他跑到球场上去采访球员和教练。这在巴西足球俱乐部，当比赛正在进行时，走上球场去和某个人说话是越来越常见的事情。1949年在一场完美策划的恶作剧中，热拉尔多·阿尔梅达解说了一场圣保罗球队和一支欧洲球队之间的比赛，结果圣保罗遭到0比7的血洗。直到第二天，4月2日才揭晓真相，原来这场球赛完全是杜撰出来的。这种事当然无法成为《巴西时间》的专题节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西很多现存的音乐文化形式、新兴的广播产业以及留声机的普及共同促进了巴西唱片产业的迅速发展。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和类型，像欧洲的波尔卡和华尔兹、混血儿的“梭洛”（融合了欧洲舞蹈和非裔巴西人的音乐节奏）还有来自东北和巴伊亚当地的音乐，但在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流行音乐还是桑巴。在20世纪之交，桑巴舞曲发源于里约黑人聚集最多的贫民窟。它融合了“梭洛”的多元音乐风格，强调非洲音乐节拍，增加了问答式的歌谣模式和欧洲乐器的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一种更加高雅的桑巴舞曲风靡一时，受到白人和中产阶级的欢迎。在新政权的统治下，桑巴舞曲也被分成了两个派别，为政权服务的桑巴和不为政权服务的桑巴。政权桑巴可谓是笨拙的宣传手段，正如路易斯·梅内塞斯为瓦加斯领导的革命所唱的赞歌：“奴隶制已经结束了，1930年革命万岁，是它拯救了我们。”作曲家阿里·芭萝萨则在桑巴舞曲中将巴西描绘成了一幅画，宁静的热带天堂、新发现的伊甸园。

录制的第一首有关足球的歌曲就是追随这种主流创作的，例如，亚美利哥·哈科米诺创作的《弗卢米嫩塞之歌》，融合了古典吉他和探戈节奏。20世纪30年代初，幽默的小调和欢乐的歌谣深受喜爱，例如《足球之歌》，由来自边远地区的阿尔瓦伦加、拉恩钦霍和喜剧经理人卡皮亚欧·富尔塔多联手演奏。在30年代，足球逐渐在深受大众欢迎的桑巴和其他舞曲中占有了特殊位置。1936年，爱德华多·索托用“17比3，轻松取胜（E Sopa）”这样的唱词来描述1930年的总统选举和随后的瓦加斯政变，好像在叙述一场足球比赛一样。“E Sopa”的字面意思是“这是汤”，但它实际要表达的最贴切的意思是“这很容易”。卡台提足球俱乐部就相当于总统府，A队由多尼古带领，多尼古实际代指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安东尼奥·卡洛斯·里贝罗·安德拉达，B队由朱里霍·普列斯特斯带领，朱里霍代指圣保罗州州长，裁判则是马加耶博士，代指即将卸任的俱

乐部主席华盛顿·路易斯，而认为这一切都轻而易举的人正是指加乌乔牧人热图利奥·瓦加斯，他与米内罗人，还有帕拉伊巴人联合起来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首歌谣写道——

去参加这场足球大赛吧，去赢得卡台提杯冠军吧

A队的队长：您忠诚的托尼古

B队的队长：您忠诚的朱里霍

裁判：马加耶博士

卡台提足球俱乐部胜任有余的主席

想要一统巴西

热图利奥说道：“这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

只需一个帕拉伊巴人、一个加乌乔牧人再加一个米内罗人

将足球作为一种开玩笑的政治隐喻倒是无伤大雅，但以谈论足球的方式来描述“野孩子”式的生活习性着实让人无法忍受。诺埃尔·罗萨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大量流行的桑巴舞曲歌词都不符合国家制定的规范，因此从未在电台播出过。他常常在他的歌里把谈论足球作为叙述日常生活的一个特点，并且特别喜欢把具有城里人精明劲儿的“野孩子”似的人物作为描绘的对象。在《酒馆里的谈话》这首歌谣中，他描绘了一幅主人公在酒馆里支使服务生的画面——

如果你待在这擦桌子

那我也不会起身去买单

去问你的老板

要瓶墨水、要支笔

要个信封、要张纸

要支香烟赶蚊子

去问你的老板

要本杂志

要个打火机和烟灰缸

当然，这个“野孩子”似的人物主人公在餐桌前坐下来后，他真正想要知道的是比分怎么样了。罗萨唱道：“服务员快去帮我取来热气腾腾的面包……快去帮我问问客人们球赛的比分情况怎么样了。”^[2]

面对这类刻画足球迷的歌谣，政府以发行阿道夫·阿尔维斯演奏的歌曲《圣热拿利奥的电车》来回应。这是一首桑巴舞曲，一反常态地颂扬了头脑清醒的城市工人。比起跑去圣热拿利奥体育场观看球赛，他们

更喜欢准时去上班，也不像波希米亚人和懒虫似的沉溺于声名狼藉的醉酒和看球的生活。歌词写道：“圣热拿利奥电车/它载着一个工人/工人正要去上班。”不止于此，模范工人更是对足球不屑一顾：“我从未有过计划/但我决定为我的将来计划/你看啦，我很快乐，我生活得很好/懒惰不会为任何人披上衣裳。”

20世纪40年代，政府加强了对音乐家和作曲家的管制，但是流传下来的足球桑巴舞曲不是阿尔维斯带着官腔的曲调而是流行于街头巷尾的罗萨歌谣。威尔森·巴蒂斯塔创作的歌曲《裁判吹响了口哨》，勾画了一个对足球痴迷的人原打算在星期天休息，但被迫加入到球赛中，遭受“90分钟的折磨”。不仅如此，他还不满足于平局，只对比分满意的球赛感兴趣。洛里瓦尔·拉莫斯在他的歌曲《罗卡杯之歌》中赞美了巴西国家队。拉马丁内·巴博在得到当地电台的赞助后，于一天之内为里约11家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各写了一篇赞歌。^⑧11首赞歌全部录制了下来，这足以证明足球在里约拥有巨大的市场和极高的人气。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政治动乱和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任何题材的电影都很少制作。自从1931年发行过一部喜剧电影《足球冠军》之后，就再也没有关于足球的电影面世。但在30年代末期，在新国家认可的情况下有两部讲述足球的电影得以发行。电影《球赛的肉体 and 灵魂》在里约举行了首次公演，到场的人中有弗拉门戈俱乐部官员、教育部长古斯塔沃·卡帕内马和总统瓦加斯自己。这部影片的制作获得过弗拉门戈的支持，他们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场地和球员，另外，也得到了政府机构的资金赞助。这部情节剧电影将帕蒂尔哈推行的新社会项目和弗拉门戈满腔爱国热情的青年球员融合在一起，以半纪录片的方式拍摄。这部电影的主角名叫路易斯，是弗拉门戈一位相对比较贫穷的球员，也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他已过世的父亲曾经是弗拉门戈有名的前锋，他希望能以父亲为榜样。随着年少时期青梅竹马的女孩玛丽亚·海伦娜从欧洲回国，他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但也更加错综复杂了。玛丽亚年纪尚小，但她的父母希望她嫁给鲁宾斯，鲁宾斯也是弗拉门戈的球员，同样也是医学院的学生，但他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玛丽亚宣称她将嫁给在本季度为弗拉门戈得分最多的球员。这样，大家的颜面都得以保全，鲁宾斯也意识到他未能赢得她的芳心，于是将玛丽亚和弗拉门戈进球的机会拱手让给了路易斯。路易斯顺利地完成了医学论文，也因此为他迈向上层社会铺平了道路。

电影《足球家庭》讲述了一位思想保守的医生，讽刺的是，他名叫莱昂尼达斯·若教授（他的名字来源于那个时代最后一位波希米亚球员），他在演说中强烈批判足球，认为足球会损坏人的身体，扭曲人的思想，并且表达了他对明星前锋阿图尔·弗雷登雷希的厌恶。他的儿子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名球员，同时也是一名医科学生，并且崇拜弗雷登雷希。他最终被调到弗卢米嫩塞打球。教授父亲不允许他去，这为电影剩下的故事情节制造了线索。随着儿子成功地做到足球和学习两不误后，这一矛盾也顺利地化解了。这位反对儿子爱好的教授父亲最终也成了一位忠实的足球迷。

随着瓦加斯政权和新国家的倒台，巴西电影从理论上摆脱了这种官方认可的情节剧，这种滑稽的、夸大情感的、可悲的剧情，但在大多数时候，巴西电影依旧遵循了这一特点。1945年，约瑟·卡洛斯·比勒在那个时代制作的第一步关于足球的电影《制胜一球》依然延续了这种剧情。但是，他在1953年发行的第二部电影《球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些传统观念，表明将优生体制、道德框架与足球捆绑的意图正在逐渐减少。《制胜一球》的主人公是明星前锋劳林多，以莱昂尼达斯·达·席尔瓦为原型，由当时最有名的黑人喜剧演员戈兰德·奥特洛出演。《球星》则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圣保罗，讲述了科林蒂安俱乐部球员朱里霍与受伤的膝盖以及情侣的父亲斗争的故事。埃莉莎爱上了朱里霍，但像往来的电影情节一样，她的父亲希望她嫁给一位医生。这部电影以科林蒂安与虚构的乌拉圭卡拉斯科蒙得维亚俱乐部（由巴拉圭的奥林匹亚足球俱乐部出演）之间的一场比赛宣告结局。在这场虚构的比赛中，195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结果被改写，由巴西2比1战胜对手。朱里霍的膝盖支撑到了最后，他打进了制胜球并抱得美人归。第一次，电影的

主角不再是医生，他地位的上升方式也不再依赖学业考试或是社会等级的提升，打入制胜一球已经足够。

IV

1934年，巴西在世界杯中仅仅打了一场比赛。他们被西班牙击败后便打道回府了。很少有巴西人关注到这场比赛，但看到的最强烈的反应是位于圣保罗的帕莱斯特拉意大利俱乐部会所遭到损毁。这倒并不是因为俱乐部容纳了西班牙球员，而是因为俱乐部里许多最优秀的意裔巴西球员代表意大利出场而不是巴西。1938年，巴西人民实际上是通过收听广播来了解比赛情况，因为解说员在法国现场解说巴西队的赛况。这一次，巴西是南美洲唯一参加世界杯赛的球队，球队中毫无争议的两个明星球员都是黑人：有“黑钻石”之称的前锋莱昂尼达斯·达·席尔瓦和中卫多明戈斯·达·古伊亚。在首轮对阵波兰的比赛中，巴西在上半场以3比1领先，但在90分钟战罢以4比4打成平手。在加时赛中，凭借莱昂尼达斯的“帽子戏法”，巴西才能在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中以6比5战胜对手。在第二轮比赛中，巴西向世人展示了他们拥有与体格强健的欧洲人一较高下的能力。在90分钟内与对手捷克踢成1比1平局，在这场充满粗暴身体对抗的比赛中，两名捷克球员因为骨折不得不被抬出场外，一名巴西球员也被罚出场外。重赛一场后，巴西赢得比赛胜利。接下来，在法国马赛举行的半决赛中遭遇上届世界杯冠军意大利，意大利球队的确实力强大，以2比1战胜巴西。但是，巴西经过重新排兵布阵后，在季军争夺战中击败了瑞典。

球队的每一次前进都通过电台实况广播，再由报刊广泛报道，几天之后，几卷珍贵的胶卷被空运回国，人们就能在大城市的影院屏幕上观看到比赛了。这是整个国家的胜利，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巴西一位权威社会学家和评论员吉尔贝托·弗雷雷对此做出了最具影响力的解释，这一解释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巴西足球的认知：

“我们的踢球风格似乎与欧洲的相反，这是由一系列特质决定的，例如，出其不意、技巧娴熟、头脑机灵、动作敏捷，另外，我还得说个人才华和临场发挥的能力，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混血儿的特性”……我们的传球……我们的技巧……都与舞蹈、卡泼卫勒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了巴西特色的足球风格，使英国人发明的这一项足球运动变得更加完善和悦目，英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在踢球时却是横冲直撞、动作僵硬。这一切都似乎表现了……混血人种随机应变同时精明强干的特性，现今，这些特质在巴西各个备受肯定的领域依旧可以看到。”⁽⁹⁾

弗雷雷在1933年出版小说《主与奴》后名声大噪，他在小说中极其详细地描写了东北部一家甘蔗种植园方方面面的生活，而生活的每一面似乎都回归到性。⁽¹⁰⁾虽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性关系在新教徒遍布的北美大都被认为肮脏下流、残忍粗野、无法维系、伤风败俗，但在信奉天主教的巴西，殖民主义的人口审查对欧洲人极其不利，种族通婚既是必要的，在道德上也是允许的。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特别是在国家领导阶层正探索巴西特色发展模式的时刻，在试图将巴西这一令人感到羞愧的种族多样化的事实转变成一个有利条件的时刻。正如彼得·罗伯所写：“这个想法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弗雷雷描述了一个已经消失了的热带田园般的甘蔗种植园，让人回想起纵情生活的细节。最令人心驰神往的是巴西能够摆脱纵情享乐、荒淫无度的过去，建立起一个各民族蓬勃发展、没有种族歧视的新社会。”⁽¹¹⁾

近年来，弗雷雷的作品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有关奴隶制度下经济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详细研究都证明那是一个更加严酷和暴力的社会，理所当然，认为巴西毫不费劲地就能实现一个没有歧视的多种族的民主国家的想法看起来就更可笑了。然而，不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的论点有没有真实性，弗雷雷对巴西文化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重新修订著作的论点并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发表。20世纪40年代，他提出了“足球艺术”这一新说法，并以比较阿波罗神和酒神性格特点的不同来对比巴西足球

和欧洲足球之间的差异，巴西代表的当然是后者。

弗雷雷的观点并非无中生有，因为二十多年来，出现了小部分关于非裔巴西人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资料，另外，圣保罗现代主义者自1922年以来一直在探寻多元化的巴西文化。1939年，马里奥·安德拉德观看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一场比赛后，写下了一篇有名的《纪事》。他在与乌拉圭好友的一次谈话中，详细讨论了巴西足球自相残杀的特点，但这并不是对民族主义的强烈批判。巴西输掉了比赛，因为他们只想着胜利，然而，阿根廷也想赢，但他们朝着这个目标行进。至少，马里奥看起来还是很享受这场盛大的赛事：“太精彩了！足球比赛是一场多么奇妙的舞蹈啊！就像蜂鸟在跳芭蕾舞一样！”⁽¹²⁾

在视觉艺术领域，画家在描绘巴西的日常风景时，也越来越多地将足球作为画面的一部分。坎迪多·波尔蒂纳里也许是以描绘那个时代圣保罗咖啡种植园的生活画面而闻名，但他在1935年也创作了一幅非凡的画作《足球》。他在这幅画中描绘了东北部塞拉诺炎热、荒凉、几乎超现实的环境，整个画面呈褐色。在山羊、岩石和干枯的树桩中间，一群身着各种颜色衣服的女孩，奇妙地漂浮在一个正在运转中的足球的周围，离他们很远的地方有一片墓地和花园。到20世纪40年代时，足球一直出现在带有嬉戏场面的风景画中，不论是农村的风景画还是城市的。在卡瑞贝和贾尼拉·达·莫塔·席尔瓦的作品中，足球被描绘成了一项更加无忧无虑、充满欢乐的运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雷雷的观点也被用来解释巴西音乐文化和卡波耶拉舞蹈文化。“劲戈”作为卡波耶拉基本的臀部摆动动作，与足球运动员和桑巴舞者的闪躲、假动作相似。这可以说是非裔巴西人的文化传承，但也是在残酷的奴隶制度下想要生存下来必须具备的文化和物质资本——随机应变、巧舌如簧、思维敏捷、抓得住机会，这些技能也是“野孩子”式的人物所具备的特质。1938年世界杯足球明星多明戈斯·达·古伊亚在四十年后回忆起年少岁月时曾用弗雷雷的话说：

“我哥哥曾告诉我：“野孩子”就是总能大难不死的猫.....我过去真的很擅长跳舞，这对我在足球场上的发挥帮助很多。我有很多闪避动作，你知道，我自创了快速运球的动作，那是出自“谬地诺舞曲”——诸多桑巴舞中的一个小分类。”⁽¹³⁾

多明戈斯的话在解释弗雷雷的影响方面表明了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弗雷雷的作品被马里奥·费劳吸收和采用，费劳出身于一个世代从事出版业的家族，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后期巴西最具影响力的足球记者。正是费劳使这些观念真正普及起来，创造出一种语言，让知识分子、公众和足球运动员都能共同了解巴西足球。在1947年发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黑人与巴西足球》中，他认为巴西足球的独特性在于混血人种的特质，并在一系列论文中对此进一步证实、挖掘甚至神化。费劳身材高大，总是顶着一头红发，穿着亚麻西装，叼着雪茄。他不只是记者，也是编辑、交际家、经理人和企业家，还为足球迷和狂欢节组织各种比赛。他设定了一个知识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巴西足球被谈论了三十年。此外，他聘用巴西最好的作家，出版他们关于足球的著作，这些作家包括他的哥哥、剧作家尼尔森·罗德里格斯和小说家若泽·林斯·多·雷戈。

众所周知，若泽·林斯与小说家瑞秋·德·凯罗斯、诗人豪尔赫·厉马是同一类型的作家，都出生在巴西东北地区，以描写该地区极度贫困和艰苦的生活为主题。在他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小说和报刊文章里，看不出他对足球有一点兴趣，但当他在30年代移居里约后，一切都改变了。他迷上了足球，加入了弗拉门戈，成了该俱乐部的一位管理者。1941年他发表的小说《水就是母亲》以里约热内卢市外的盐场为背景，描写

了一个多种族的家族故事，带有鬼怪色彩，主人公是一位出身工人阶级的足球明星，讲述了他不可避免的没落。若泽·林斯受马里奥·费劳之邀，为《体育周刊》撰写纪事专栏，在那里他首次用到形容词“弗拉门戈特色的”（Flamengista）。他也吸收了弗雷雷的思想，将之融入对足球和其他事物的描写中。正是因为这些人将弗雷雷对巴西多元化种族田园诗般的描写与足球、音乐和舞蹈联系在一起，才形成了对巴西民族特性和巴西足球临场发挥、出奇制胜、极具艺术观赏性的普遍看法。回顾1932年，由多种族组成的球队在乌拉圭取得了里约-布兰科杯赛事的胜利，像巴西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若泽·林斯开始以弗雷雷的眼光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在1942年时写道：

“在蒙得维的亚取得胜利的年轻人就是社会民主的真实写照，身世显赫的保利尼奥、黑人莱昂尼达斯、黑白混血儿奥斯卡里诺、白人马丁斯，不同种族的他们团结在了一起，以自然流露的惺惺相惜之情发挥了巴西人特质中有利的一面。阅读这本有关足球的书，我相信，混血儿的优良基因、多种族血液凝结成的力量和智慧，将赋予巴西土地上的年轻人独特的创造力。终有一天，这种独创力将震惊世界。”⁽¹⁴⁾

V

巴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到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阵营中，这让瓦加斯自己所实行的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看起来特别荒谬可笑，他再也无法继续当权。1945年10月，瓦加斯下台，但他又让自己选入了参议院，并通过在位时建立起来的巴西劳工党重组权力网。他对巴西领导阶层仍旧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并让上将欧里科·杜特拉在1945年的总统选举中成功上位。在杜特拉担任总统初期，巴西被选定为1950年世界杯的主办国。为举行这次赛事所做的规划和筹备工作广泛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杜特拉继续推行前任政权的足球政治，将一大片土地划给了弗拉门戈。瓦加斯随后为他们提供免息贷款，让他们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住宅区。然而，随着巴西政治越来越民主化，这种上层领导的徇私和慷慨很快遭到其他人的反对。

正如加入二战意味着瓦加斯必须下台，民主选举必须举行，与苏联结盟同样意味着不可能再限制巴西共产党的发展。巴西共产党在1945年实现合法化，迎来了短暂的繁荣，这得益于苏联在二战中所持的态度，并希望实现更加激进的社会政策。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格拉西里亚诺·拉莫斯和奥斯卡·尼迈耶，还有工人全都涌入共产党。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路易斯·普列斯特斯的带领下，该政党不仅注重工业组织，对大众文化也非常有兴趣。巴西共产党（PCB）不仅支持桑巴舞学校，也从桑巴舞学校吸收成员，举行各种各样的狂欢节比赛项目，得到了很多音乐家和艺术家的支持。同样地，他们也关注足球，并借鉴瓦加斯的做法，在巴西大型体育场举行集会。普列斯特斯从监狱释放出来后的第一个重大动作就是在瓦斯科的圣热拿利奥体育场对众多观众举行演讲。那年年末，在帕卡恩布体育场为圣保罗共产主义工会举行了一场资金筹集活动。那晚开始时，工会组成的两支球队举行了一场比赛，由此拉开活动序幕，接着，科林蒂安和帕尔梅拉斯又进行了一场表演赛。将球赛和左翼政党的活动结合起来，这种合作在巴西还是很少见的，但是，它没有时间发展。由于二战之后接踵而至的冷战，以及对共产党人极度地不信任，杜特拉在1947年，不顾在一次授权选举中有14名共产党人被选入参议院的事实再次将共产党取缔。

在巴西足球圈内出现了一片不大不小但至关重要的政治呼声，因为杜特拉领导下的世界杯筹备工作既是一个实际问题也引发了对巴西经济发展的一场辩论。尽管在瓦加斯时代，巴西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巴西长期以来都缺乏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致力于推动足球发展者的代表，马里奥·费劳呼吁建造一个规模宏大的足球体育场，呼吁在里约新建一个体育场，为世界杯参赛者提供尽情施展的舞台，其规模与风格要能体现这个国家高超的足球水平和城市现代化。他说道：“这个体育场将会是我们这一代人送给下一代人的礼物，展现了巴西的人力财富。这个体育场也将会是我们所有巴西人献出的一份大礼。”批评家认为有限的资本应该用于修建医院和学校，但是里约足协主席瓦加斯·内图在《体育周刊》上回应道：“我并不反对你们的请求！我支持你们的想法，但也希望你们能够支持体育场的建设，医院的修建工作也许并没有那么迫切。”⁽¹⁵⁾

市政府针对是否应该修建体育场举行了投票。显然，这片曾经拥有顶尖水平的英国德比俱乐部的土地很愿意修建一座深受欢迎的运动殿堂。在市政府的指示下，建筑师加尔瓦、阿泽维多、巴斯托斯、卡内罗、费尔德曼、拉莫斯和巴尔德塔罗被委以重任，开始了修建工作。世界杯开赛在即，体育场才勉强完工，但确实极其宏伟壮观。巴西建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优雅的现代化体育场马拉卡纳，其外观状似一个用白色混凝土修筑的巨大双层椭圆，能容纳16万名以上的观众。从上往下看时，360度钢筋混凝土的屋顶设计像极了一艘来自外太空的宇宙飞船，降落在了里约北区边缘的空地上。实际上，这个世界级现代

化的体育场是用巴西生产的第一批混凝土材料建造的，它的主要入口是一个斜坡道，由两排简单的、细小的圆柱支撑着，直通顶层看台，站在那感觉伸手就能触碰到天空。在这里，看不到一点点古典式柱廊的痕迹，隐藏在圆顶里的悬挑梁钢筋构造显示了建筑师对高级工程和极简设计的勇敢挑战。马拉卡纳内部高耸的圆顶与巨大的圆形广场上下呼应，由扶垛支撑着的看台位于广场四周，坐在台上往下看，广场几乎占据了整个体育场。报刊《一夜之间》写道：“今天的巴西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美的体育场，极大地肯定了巴西人民的能力以及巴西在人文活动各个方面的革新。”⁽¹⁶⁾马里奥·费劳认为巴西获得了一个新的灵魂，这个体育场预示着巴西人民沉睡中的巨大潜力即将苏醒。

巴西队展开了一丝不苟的、封闭式的训练，他们待在市外某个地方与世隔绝好几个月。同时，里约也在进行着自己的准备工作。在“忏悔星期二”举行的狂欢节游行就以“世界杯”为主题，雷米特杯也陈列在了里约布兰科大道的一家珠宝店里，成千上万的人怀着敬意前来瞻仰。在比赛第一天，朝鲜战争爆发，但是在巴西没人知道这场战事。黑压压的人群聚集在马拉卡纳体育场，看见5000只鸽子被放飞，听见21响礼炮。刚刚完工的圆顶被礼炮声震得飘落下许多白色石灰，落在发言中的英国裁判亚瑟·埃利斯身上。巴西在圣保罗以4比0战胜墨西哥，2比2战平瑞士，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击败了南斯拉夫。在入场时，南斯拉夫球队还被来不及完工的体育场露出的横梁撞到了头。

两天后，四支球队的最后一轮比赛开始了。那时，里约当地的选举正开展得热火朝天，巴西队下榻的旅馆、训练营和更衣室全是各个党派的候选人，他们瞅准机会就来合张影，进行一次热情洋溢的讲话。尽管被寄予厚望，巴西队却似乎完全释放开了，以7比1狂扫瑞典，6比1大虐西班牙。现场观众热血沸腾，挥舞着10万条手帕祝福西班牙球队回国一路平安。杰米·卡瓦略带领的官方支持乐队开始洋洋得意地演奏起狂欢节的最爱曲目《马德里的斗牛》，卡门·米兰达在当时演唱的半官方式的世界杯版本使这首歌流行了起来，全场观众也跟着唱了起来，形成了“史上最大的合唱表演”。⁽¹⁷⁾

最后一场比赛终于来临了。对手是乌拉圭，巴西只需战平就能夺冠。20多万人，或许有25万（相当于里约20%的成年人）涌入了马拉卡纳体育场，这是足球比赛史上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次。作为体育比赛中一次最狂妄自大的行为，里约市长通过体育场的公共广播对巴西球队说道：“巴西的青年们，你们是我眼中本届比赛的胜利者.....你们是即将获得百万同胞欢呼的世界杯冠军.....你们是比其他所有对手都要优秀的球队.....你们是我致以崇高敬意的征服者”。⁽¹⁸⁾市长先生本来是发表不成这种演说的。虽然巴西上半场以1比0领先，但最终却以1比2输掉了比赛。一阵可怕的寂静突然笼罩着整个体育场。当最后一声哨响后，运动员、官员、观众都彻底崩溃了。国际足协主席朱尔斯·雷米特手足无措，将奖杯塞到乌拉圭队队长奥布杜里奥·巴雷拉的手里，自己就立刻消失了。

巴西在世界大战的战火中逃过一劫，比起斯大林格勒战役，巴西人更喜欢聊聊弗拉门戈足球俱乐部。如今足球却成了挫败和灾难的代名词。那时的贝利才10岁，家乡是米纳斯吉拉斯的一个小地方，回忆起当时家乡所笼罩的气氛，他说道：“当时的气氛非常凝重，非常伤痛，就像是一场战争的结局，巴西战败了，死了很多人。”尼尔森·罗德里格斯则将这场比赛描述为世界末日：“每个地方都会发生无法挽回的全国性的大灾难，就像广岛的核爆事件。我们的大灾难，我们的‘广岛之难’，就是1950年世界杯负于乌拉圭。”⁽¹⁹⁾对巴西特色发展道路的探索使这个国家把目光投向了足球，并将足球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本意是要发挥足球的优势，它确实也发挥过。现在，我们该来评价一下它的缺点了。

- (1) 引自M·马伊亚,《维拉-洛博斯,巴西之魂》,圣保罗:对位法编辑出版社,2002年,第48-49页
- (2) “帕坎布的市政体育场开放”,《圣保罗的体育场》,1940年4月28日,第8页
- (3) 同上
- (4) 《体育报》,1937年3月13日,被雷内托·索阿雷斯·库蒂尼奥所引用,“为了巴西与弗拉门戈,若泽·巴斯托斯·帕迪尔哈的国家建设项目”,2009年9月,文件在马林加、巴拉那历史大会上公布,详见:<http://www.pph.uem.br/cih/anais/trabalhos/273.pdf>
- (5) 《体育报》,1937年2月19日,引用同上
- (6) 详见R·莱文,“上流社会对现代巴西城市大众阶层的干预”,《葡萄牙巴西人评论》21(2),1984年
- (7) 详见L·肖,《瓦加斯时代的桑巴和身份,1930-1945》(São coisas nossas: samba and identity in the Vargas era (1930-1945)),《葡萄牙研究》14,1998年,第69-152页;L·肖,《桑巴与“巴西人身份”:尼尔·罗萨歌谣中的民族意识(1932年-1950年)(1910-1937)》(Samba and “Brasildade”: no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lyrics of Noel Rosa (1910-1937)),2002年,第81-96页
- (8) 拉马丁·鲍勃在现实中为里约11家球会创作了加油歌(据说不到一周时间就完<http://globoesporte.globo.com/futebol/noticia/2012/02/lamartine-babo-o-compositor-dos-hinos-dos-clubesdo-rio-de-janeiro.html>成了),均以唱片的形式发布,证明了足球在这座城市的支持率。详见:
- (9) 科瑞奥·达·曼哈,1938年6月15日
- (10) G·弗雷耶尔,《主与仆:巴西文明发展研究》(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azilian Civilization),纽约:兰登书屋,1964年
- (11) P·罗伯,《巴西之死》(A Death in Brazil),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04年,第5-24页
- (12)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巴西-阿根廷”,《坎迪尼亚之子》,里约热内卢:Agir出版社,2008年。被B·布阿尔克·德·霍兰达所引用,“巴西足球即兴创作颂:现代主义、流行音乐与巴西式运动”,《即兴创作的批评性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Improvisation/Études critiques en improvisation)7(1),2011年。
- (13) 多明戈斯·达·归亚,视频Núcleo/UERJ,1995年,被M·穆拉德所引用,《暴力与足球:从经典到今天》,里约热内卢:Editora FGV出版社,2007年
- (14) 引自R·莱文,“运动和社会:巴西足球案例”(Sport and society: the case of Brazilian futebol),《葡萄牙巴西人评论》17(2),1980年
- (15) 《体育报》,1947年6月10日
- (16) 引自A·贝罗斯,《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 (17) 同上
- (18) 引自T·马森,《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 (19) N·罗德里格斯,“七冠的戏剧”,1966年6月,《滑落的国家:新足球编年史》,圣保罗:信函公司出版社,1994年,第112-119页

第四章 巴西利亚和足球：漂亮游戏的发明（**1950-1964**）

巴西风格的足球是把比赛变得赏心悦目.....而欧洲人却把足球踢得异常规矩和紧张。

——吉尔贝托·弗雷雷（巴西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吸引我的不是人们创造和设计出来的直角、直线，还有僵硬且不可弯曲的线条，吸引我的是自由且感性的弧线和曲线，那曲线就像我家乡的山，像蜿蜒曲折的河流，像挚爱的姑娘的躯体。

——奥斯卡·尼迈尔

I

在“马拉卡纳打击”之后，巴西国内的足球气氛是阴郁的，而在同年的总统大选之中，在怀旧和保守的情绪之下巴西的民众都纷纷把票投给了热图利奥·瓦加斯，让他再一次成了巴西总统。

巴西国家队在1952年之前再也没有踢过一场比赛，巴西国家队也永久性地抛弃了那件他们曾在决赛里穿过的白色球衣，只因现在看来那是厄运的象征。巴西国家队在1954年之前也没有在马拉卡纳踢过比赛。人们都在对导致那场决赛失利的几名被当作替罪羊的球员进行调查和指责：后卫毕戈达和儒尼内尔，以及门将巴尔博萨。这3名球员都因缺乏道德和纪律性，被媒体谴责为“乌鸦”，并且媒体呼吁这3人都应该被弃用。

巴尔博萨直到死之前5年一贫如洗的时候才被选出来做特殊治疗，他回忆道，在1950年世界杯之后他曾走进一家酒吧，然后有一位女士指着他对她的儿子说：“看，这就是那个让巴西哭泣的人。”在1994年世界杯前夕他曾在特雷索波利斯的训练营中被赶出国家队，因为他被认为会对当时的国家队带来诅咒。巴西国家队在1995年的迪达之前一直没有过黑人守门员。那个弗雷雷和菲尔霍想象出来的多元的、自信的巴西消失在了种族主义、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之中。一般的足球运动员，尤其是黑人足球运动员，被认为有心理缺陷，容易情绪化和缺乏自觉性，所以在场上没法发挥他们最好的表现。

在之后的1954年瑞士世界杯上，巴西在四分之一决赛中2比4被匈牙利队击败，这场比赛因暴力而闻名，这便是足球史上臭名昭著的“伯尔尼之战”。匈牙利的约瑟夫·博日克和巴西的尼尔顿·桑托斯因斗殴被直接红牌罚下场，之后被罚下场的是巴西的另一名球员赫姆博托，整个足球场中就像是在进行着一场混战。迪迪被限制在了边线。比赛结束之后，争斗离开了球场，转移到了球员通道和更衣室，球员们打得不可开交，直到瑞士警方到来之后才停止。但当时的公众媒体都纷纷鼓吹这群国家队的硬汉以这种方式捍卫了国家荣耀和尊严，官方报道则把问题归咎在混血种族头上：“巴西的球员缺少了巴西人所有的那种气质……这种病变已病入膏肓，并且比比赛的战术体系还要深……这最终还是基因的原因。”

当巴西国家队从那场充满怨恨和瘀伤的球员通道拳击赛中走出来以后，从1950年开始，巴西总统瓦加斯开始追求增加民粹主义经济和导致巴西国内气氛紧张的策略，这使得巴西的雇主阶层和跨国公司相当不满。在1954年的夏天，阴谋家和反对党开始罢工。反对党中有着瓦加斯最怕的一位对手——右翼报社编辑卡洛斯·拉塞达。瓦加斯有着一支空军警卫队作保镖。在那年8月，里约热内卢发生了一起政治谋杀案，反对党的一位领袖脚部受伤，一位随员被打死，而警方的调查结果是瓦加斯总统府的警卫队队长涉嫌谋杀。在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基本终止的时候，瓦加斯在总统府里拿出手枪朝着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在这起自杀事件和政治行为的背后，整个巴西围绕着悲痛的气氛，伴随着临时政府的统治，一瘸一拐地走到了1955年年底。瓦加斯留下了发展完好且健全的热带农业和工业动力基础。当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在重要的1955年总统选举中成为了新一任的巴西总统之后，巴西的足球文化也开始走上正轨。

库比契克是一位精明而实际的政治家，虽然他来自于有着政治分肥背景和务实主义的米纳斯吉拉斯，但是他却把旺盛的精力和积极的心态以及个人号召力放在了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上面。他给予了巴西“50年的任务，5年完成”的承诺，并且差一点就真的完成了。他带领着巴西趁着1956年之后景气的世界经济一同发展，巴西经济在那几年的年增长达到了10%，并且几个优势行业发展得更为迅速。军队的收入和预算则都得到了增加，外资和跨国公司被邀请来巴西投资。库比契克也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在巴西内陆的高原

之上建设一个新的首都——巴西利亚。

其实早在1891年巴西旧共和国时代的第一部宪法里就有着要再建一个新首都的提案，在1893年，这个新首都的位置甚至已经被确定了，当时这样的尝试是为了将政府搬到离海岸线更远的地方，以加速内陆的发展和宜居，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完成。库比契克最终却做到了。建筑家和城市规划师卢西奥·科斯塔在巴西利亚完成了奥斯卡·尼迈尔设计的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建筑，这也让巴西利亚看起来富有想象力。巴西利亚还有着那些最闻名的标志性建筑——有着蜿蜒曲折的曲线，有别于现代欧洲的线性和几何式简单线条，宣布着巴西独特的现代化进程。

但是，这座城市不仅仅只有建筑。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巴西足球有着和巴西利亚一样影响世界的美感。带有尼迈尔的曲线现代主义的巴西足球和弗雷雷所描述的精确且棱角分明的欧洲足球有着鲜明的对比。马拉卡纳球场的建造已经被证明是连接了城市现代化、经济的增长和足球的发展，但是1950年世界杯上糟糕的表现却让人们对巴西的一系列成就打上问号。他们已经建造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足球场，却在世界杯最重要的难关——决赛上失利。而没多久，那些年的承诺将要实现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巴西靠着一大帮让人着迷的足球天才两次赢得了世界杯，这其中就包括了20世纪两大最令世人珍爱的球员：贝利和加林查。在这之后，巴西所面临的马拉卡纳打击所带来的各种纠结在一起的种族矛盾也因为足球而消失。

巴西足球在20世纪50年代末强势崛起并取得成功，使它在之后成了国家的心脏和象征。巴西足球崛起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在20世纪50年代末时，巴西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主要的经济发达区域位于沿海地区，而落后和穷苦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内陆，不过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导致了来自内陆地区的穷苦和落后的人涌入沿海等经济发达的中心区域，为足球人才的选拔提供了更大更广的群众基础；第二，因为种族、人口流动和户籍迁移的关系，瓦加斯时期在整个巴西国内寻找足球天才并且最看重人种优劣的观点被淘汰，巴西足球在国际上的成功也最终使人种优劣论被淘汰；第三，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兴起的足球俱乐部和运动协会，导致了多种族和贫富背景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交流和沟通，将不同的舞蹈、音乐、诗歌等艺术形式和足球混合在一起，最终走在了一条相同的轨道上；第四，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城市娱乐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带来了思想上的改变，使巴西民众开始对城市的休闲娱乐的观点和态度变得更为开明和包容——随着球迷们把足球比赛带到生活里来，里约热内卢的沙滩上到处可以看到玩足、排球和踢沙滩足球的人群。这些变化最终也为巴西的足球文化打下了基础，在现在的巴西随处可见人们在谈论足球。这也是巴西20世纪60年代的新电影运动所带来的最常见的变化。

但是，足球还得是一项认真的运动，也需要一个认真的组织去投入大量的金钱来推动足球的发展。在1958年，时任巴西足协主席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若昂·阿维兰热认真地准备起巴西国家队参加1958年瑞典世界杯的事宜。

II

时任巴西联邦政府总统的库比契克为巴西国家队出征1958年瑞典世界杯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拨款，这其中包括了球队在意大利进行的世界杯赛前集训的费用。赛事的准备和组织主要是由阿维兰热来负责的，他当时是里约热内卢的一名商人和弗卢米嫩塞俱乐部的内部人士，同时还是一位大师级的政治家和非常著名的公关大师，阿维兰热在那一年刚刚以185对19的选票当选巴西足协主席。和若昂·阿维兰热一起的是背景和他很相似的保罗·马查多·德·卡瓦略，他是圣保罗俱乐部的赞助人，同时也是这个城市最主要的电视台和广播公司的所有人。阿维兰热和卡瓦略任命了胖子维森特·费欧拉为这届巴西国家队的主教练，并且给予费欧拉在执教球队时充分的权力和信任，巴西足协则负责为国家队找来了心理学家、厨师、牙医、维修工和球探。几名参加过1954年世界杯的老兵也被征召进这届巴西国家队，比如尼尔顿·桑托斯和迪迪，但这届巴西国家队也召入了更多的年轻球员，比如乔尔、济托、佩佩和瓦瓦；还有2位起初是边缘人物的球员——来自博塔福戈的“小鸟”加林查和来自桑托斯的天才足球少年贝利。整个巴西国家队的球员在里约热内卢最好的医院进行了大量的医疗检查，以确保他们的身体状况，这家医院曾以发现了治疗长期营养不良等各种疾病的方法而闻名。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几乎所有的巴西国家队球员都有肠道寄生虫，有的甚至有梅毒，有几个则贫血。从病理学上来说，巴西出征1958年世界杯的队伍简直就和巴西人民一样多病。所以整个团队对奔赴瑞典之后的准备工作也做得相当细致，他们在考察了25个地点之后最终选定了在瑞典要下榻和驻扎的酒店，也许是为了防止球员们乱来，巴西人甚至还要求球队所在酒店内的服务员必须得是男性。

巴西在这届世界杯上的开局显得相当慢热，他们在小组赛首战里先是以3比0击败了奥地利队，之后则是0比0和英格兰队互交白卷。之后加林查和贝利入选了比赛的主力阵容，尽管这引起了球队心理咨询师的反对，心理咨询师认为这2名球员的心智还不成熟，不适合代表巴西出战，但这在事后被认为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巴西队在之后的比赛里显现出了新的势头，球队带着热情在小组赛的最后一战里2比0轻松击败苏联队顺利出线，随后巴西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依靠着贝利的进球1比0淘汰了威尔士队，之后巴西队在半决赛里5比2击败法国队，贝利则上演了“帽子戏法”。在决赛中他们面对的是东道主瑞典队，巴西队开场不久之后先失一球，不过球队表现得异常平静，突显了球员们对比赛的控制力，最终在进攻方面的创造力帮助巴西对5比2获胜。就像美国《时代周刊》上所写的：“他们（这届巴西国家队）给现代足球展现了另一种概念，他们操纵那难以控制的足球时就像控制着捆在他们脚上的棉球一样简单。”在决赛最后时刻进球的贝利在终场哨响之后曾一度昏厥过去，之后他在泪水之中醒来。赛后的庆祝人群里甚至有当时的瑞典国王。瑞典的球迷也都为巴西队员们的表现而欢呼雀跃，无论是在比赛的时候还是在赛后。当巴西队员绕场一周的时候，球迷们也都在为巴西队员欢呼。而巴西队队员们也以举起一面巨大的瑞典国旗作为对瑞典球迷们的回报。几天后，巴西队队员们经过伦敦和里斯本的转机之后回到了巴西，他们最先到达的是累西腓，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政府官员们和巴西群众的喝彩。之后，当球队到了里约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则是更多的群众的喝彩和欢呼，以至于队员们只能挤在一辆消防车上，从机场慢慢地开往里约市内的大道，最终抵达总统府。

这届巴西国家队内的大部分球员也参加了4年后的智利世界杯。和4年前差不多的是，他们依然有严格的准备工作，考虑到智利的海拔不低，所以在准备工作里也把在高海拔地区的训练作为了保留项目，同时，巴西足球技术委员会也批准了在国家队所下榻的酒店附近只能有智利政府认证的妓院。贝利在第2场小组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中受伤，这样本届大赛的关注点便转移到了加林查身上。“小鸟”加林查之后也开始了翱翔，在关键的四分之一决赛里，他遭遇了英格兰球员们的梅开二度，而第3球则是他的射门打在门

框上弹回之后由瓦瓦补射进的，最终巴西队3比1淘汰英格兰队晋级。在半决赛里他成了比赛的主导者，尽管东道主智利队的后卫罗哈斯对他严加看守，但加林查依旧帮助巴西队进入到了决赛，他自己则因不堪忍受罗哈斯对他的折磨而踢了他，结果被罚下场。不过在决赛里加林查依然得到了出场机会，因为巴西的外交手段做得相当过度——在巴西政府的提议下，秘鲁总统让秘鲁驻智利大使对执法了半决赛的秘鲁主裁判进行了沟通，主裁判决定撤销罚下加林查的决定。在之后的决赛中，面对捷克队，巴西依然在先落后的情况下表现得异常镇定和轻松，随后轻松的3个进球让他们卫冕成功。加林查在决赛里的表现也相当勇敢，他沉着冷静地控球，让捷克的球员无法轻易地从他的脚下抢走皮球。

我们很难去估计这两届世界杯的成功对巴西足球发展的重要性。当然，当时的街道上有很多现象级的庆祝活动，在巴西的每个城市都有如潮水般的欢庆群众去围观国家队的奖杯巡游。在这两届世界杯成功之后，每个队员都接到了总统的接待和演讲。如潮水般的相关赛事收藏品，数不清的杂志图片和影集，以及相关的庆祝交响乐和桑巴舞，都可以看得出来两届大赛的成功给巴西群众带来了什么。但是这些瞬间给巴西留下了更深层次的影响。当时仅有10岁的塞尔吉奥·洛佩斯回忆起当他收听其中一次决赛广播直播时说：“那对我是巨大的影响，我绝不会希望足球离开我哪怕仅仅几分钟。这是足球的转折点。”这是当足球变成国家仪式的时刻，是足球变成了国家健康程度的标志，是足球在巴西这样一个多种族和多肤色国家里取得的最高成就。正如同尼尔逊·罗德里格斯在1958年时所表达的那样，1958年世界杯上的成功可以让巴西对种族优劣的问题说再见了。巴西不仅赢得了世界杯，并且连续赢得了2次；巴西不仅赢得了奖杯，而且是世界杯；他们不只是赢得了世界杯，而是以自己独特的巴西风格赢得了世界杯！巴西是一个足球王国！

要说巴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得从两位风格不同并伟大的球员说起——贝利和加林查。贝利，全名埃德森·阿兰蒂斯·多·纳西门托，于1940年出生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座贫穷而偏远小镇——特雷斯科拉松伊斯。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半职业足球运动员。当贝利的父亲把家搬到圣保罗州的包鲁市时，贝利被当地的一家俱乐部——AC包鲁的教练所发掘。他把贝利带到了桑托斯俱乐部，之后16岁的贝利代表桑托斯比赛时取得了进球，在此后他开启了自己于桑托斯俱乐部不可思议的17年的岁月以及1200场比赛。

桑托斯在那时是一家正在稳步上升的俱乐部，位于巴西圣保罗州的一座港口城市。这座城市曾一度因为可可贸易业而繁荣，之后又因为这个行业而衰落。在那时，桑托斯俱乐部是圣保罗的龙头产业和大门，在20世纪50年代，桑托斯俱乐部开始强大起来，在1955年，他们时隔20年再一次夺得了圣保罗锦标赛的冠军。之后他们又夺得了更多国内赛事的冠军，在1962年，桑托斯在3场史诗般的马拉松式的比赛之后击败了来自乌拉圭的佩纳罗尔，赢得了他们的第一个洲际比赛的冠军——南美解放者杯。球队夺得南美解放者杯冠军之后的奖励则是获得了参加那一年洲际杯的机会，他们将在洲际杯中对阵欧洲冠军本菲卡！桑托斯在主场3比2击败本菲卡，之后又在客场5比2击败本菲卡，贝利则在这场比赛里上演了帽子戏法。在桑托斯夺得了洲际杯冠军之后的当天，巴西政府宣布第二天将成为国庆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桑托斯再度在南美解放者杯决赛里击败了博卡青年队而卫冕成功，并且同时赢得了巴西国内联赛的冠军，这一年是桑托斯俱乐部历史上的黄金年代。

贝利在桑托斯时的主教练卢拉在谈到贝利的伟大之处时表示，贝利不能拿来和任何一位球员相比，因为他有着一名足球运动员所具备的所有优点，无论是在场上还是跃起时，他的速度都很快，他射门的力度合适，有强壮的身体，控球和支配比赛的能力，能玩各种花活，同时他还无私、谦虚、好相处。卢拉说：“我认为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名可以在射门时把所有注意力放在将球射进对手大门里面的前锋。”

加林查的全名是马努埃尔·弗兰西斯科·多斯·桑托斯，他生于里约热内卢周边的名叫保格朗德的工业小

镇上的一个印第安-欧洲移民家庭。这个小镇上，有一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就被纺织厂赞助的足球俱乐部。加林查天生就有身体发育方面的问题，他的左腿向外弯，右腿则向内弯，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行走，反而使得他在球场上的盘带变得更加变幻莫测。在青少年时期，这位被姐姐昵称为“鹧鸪”的少年就已经为那家工厂球队踢球了；他同时还在工厂里做些杂事，也很爱喝酒、跳舞和戏弄别人。加林查并不关心自己的足球天赋，以至于他需要朋友去把他抓到里约进行试训。在博塔福戈队的试训中，他戏弄了当时在博塔福戈效力的左后卫尼尔顿·桑托斯，在这之后他立刻被博塔福戈签下并且在这家俱乐部度过了他的大部分也是最好的职业生涯。当加林查在踢球时，他一直活在不牵无挂、无野心、无知且受保护的理想世界里。他踢足球的方式是自由且奔放的。起初他是一个有天赋的边锋，他能场上的任何一个位置消失然后再出现并且取得进球。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盯防谁，甚至不会参加球队的队内会议。然而尽管如此，加林查依然还是深受球迷的喜爱，现在所熟知的《加油歌》（Ole）在最开始也是为他所唱的。假如要给加林查贴上标签的话，那一定是庄严、巧妙、狡猾和无耻地去用球戏耍对手。有时他甚至会很享受这个过程，并且在戏弄完对手之后会回去再戏耍一遍。

贝利活出了一个模范式的人生，而加林查则更像一名工厂工人一样放纵。同时贝利在经过了青少年时代的羞怯之后，现在更爱说话，但是他和加林查依然没有过任何实质性的谈话。贝利是一位很有野心的人，他知道自己天赋的价值，尽管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因为和一些不择手段的商业伙伴合作而损失过金钱，但贝利依然试图去挽回一些宝贵的东西。加林查则缺乏野心，他从不关心自己有多少钱或将如何花钱。在不言自明却有着显而易见的种族等级划分的巴西，身为黑人的贝利娶了一名白人女子，而加林查则娶了一位黑人妇女。贝利会为未来做计划，加林查则活在当下。贝利参加训练，加林查却经常睡觉。从他们所得到的昵称后缀上来看这2名球员就有着明显的不同，贝利是“国王”，代表至尊荣誉，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加林查则演绎着这个世界里的不完美和残缺，他酗酒、脆弱，所以被称为“人民的欢乐”。国王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直是受人崇敬的，但加林查则是被喜爱的角色。在之后的20年里，这两个人的人生和财富出现了极大的差别，但是在那短短的几年里，在那个足球王国，那个球场和队伍，却可以同时拥有这两名天才球员。

III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西国家队的成功和贝利、加林查这两名天才球员是当时巴西足球的核心话题，他们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巴西国内足球俱乐部也开始变得强盛起来。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巴西足球俱乐部是巴西城市社会中最活跃的元素，它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集合到了一起，无论是来自上流社会还是市民阶层。足球能为贫穷的人带来激励。在一个极度不平衡和稳定的社会中，足球为当时的足球运动员和球迷提供了一条通往名誉、物质享受和财富的道路。

和很多其他的组织类似的是，每个足球俱乐部最顶层的人物依然是主席。通常这些俱乐部的主席都是白手起家的商人，他们大多都是经商赚钱之后，开始以这种方式步入政坛，或者得到一官半职能够进入到上层社会。一般而言这些主席都是很有责任心且没有报酬的，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这些商人将钱投资到足球俱乐部到底属不属于公益事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成为俱乐部主席之后他们肯定得到了一些利益。最重要的是，如果能成为俱乐部主席，那么他们就能涉入到这个城市复杂的关系网里面去，俱乐部主席可以和商人、媒体、公务员、政客、开发人员打交道，尤其在巴西这样一个有着独特侍从体系的国家，成为俱乐部主席对于这些商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让他们的政治生涯和商业生涯得到很好发展的手段。雅内·莱沃报道了弗拉门戈俱乐部的一名董事，描述了他是如何从一个两手空空的人被选为俱乐部的副主席，在任期间，他结识了一大帮朋友和联系人，这最终帮助他创造了财富，使他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好。俱乐部主席的职位也给这些慷慨的商人和俱乐部拥有者们提供了能够在政府和国家足协等相关机构里任职的机会。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两名政府官员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和安东尼奥·马加良斯都因为在建设位于贝洛奥里藏特的米内罗体育场的时候起到过关键作用，作为回报，俱乐部董事希望能够偿还俱乐部的债务，然后努力花钱使那些最有钱并且最有雄心的人得到最多的选票而成为俱乐部主席，而俱乐部主席的候选人也往往会承诺自己会为俱乐部带来利益，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有人曾承诺要给俱乐部带来一名球星——咖啡业巨头阿马杜·罗德里格斯·西凯拉之所以能够成为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主席，就是因为他承诺将把巴西球星托斯塔奥带到俱乐部里来。

足球俱乐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巴西社会里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如果说足球构成了当时巴西民众的休闲娱乐的中心部分，没人会有争议。在那时，足球俱乐部就只是足球俱乐部，它提供给巴西群众的不仅仅是设备和派别，还是一个社团和一种身份。30年代的时候，弗拉门戈成了一个有着大量会员的俱乐部，以至于它的公费收入能够达到当时巴西国内中下产阶级的水平，这远超过了当时巴西国内还占主流的穷人和工薪阶层的收入。到了50年代的时候，位于里约和圣保罗的所有大俱乐部拥有的会员人数已经成千上万了。所以在这时很多的足球俱乐部就已经拓展了他们的经营范围和服务设备，类似于舞厅、餐厅、游泳池、网球场和健身房，这也意味着足球俱乐部开始能够给他们的会员们提供早午晚餐、舞蹈活动，以及进入剧院、电影院、时装秀甚至野餐的活动。女人们则对俱乐部提供的瑜伽课程、桥牌锦标赛和其他的一些娱乐和社交活动相当感兴趣。不过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小规模的俱乐部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比如来自里约北区的球队圣克里斯托旺和邦苏塞索，相比起那些大型俱乐部，他们的会员和资产就少之又少，而且到了60年代的时候，小型俱乐部和大型俱乐部之间的差距也被越拉越大。大城市里的新移民总是会跟随着他们邻居的选择而成为大型俱乐部的会员。在1966年赢得了里约州锦标赛的班古足球俱乐部是最后一支能够打破4强（弗拉门戈、弗卢米嫩塞、瓦斯科达伽马和博塔福戈）的垄断并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球队。

自从20世纪30年代足球在巴西开始了职业化和正式化之后，球员在俱乐部中的位置就基本没有改变了。在50年代初，足球运动员们的薪水也就比城市里的工人稍微好点，甚至还比不上其他领域里的专家的工资。球员从一开始被俱乐部签下之后就与俱乐部捆绑在了一起。如果俱乐部不希望球员在别的地方踢球，那球员就绝不能在别的地方踢球。在没有转会这样的退出选项的情况下，球员们的权利是被俱乐部所严格限制的。同时，在尊重上级的传统相当盛行的巴西，那时的球员也不太敢反抗俱乐部主席和教练，那时也没有球员工会和类似维护球员权益的组织。那个年代的咨询师、中介和经纪人也更看重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球员们的利益。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足球俱乐部也开始得到了更多的投资、赞助和广告收入，这时有一部分球员的薪金才开始增长。在远离经济核心区的里约和圣保罗的小型俱乐部，则依然没多大变化，但是在那些大城市里的大型俱乐部的顶尖球员则开始变得越来越富裕。不过，当时的球员合同里依然没有包含保险、医保和养老金。踢足球在那时是吃青春饭，很多退役了之后的球员都得面临着回归贫穷的日子。

最后终于可以谈谈球迷了。球迷们不仅给足球俱乐部提供了门票收入，同时壮大了俱乐部的社会基础。当时像“缠绕”这样的球迷组织每场比赛能够组织三四千人到现场加油助威，而其他的球迷群体则较不稳定。持有季票的球迷在球迷群体里向来只能算是少数派。在里约和圣保罗，球队对阵来自其他地区的小球队的比赛中上座率甚至还不到球队对阵大城市对手时的一半。与之相反的则是，当比赛是德比或者决赛的时候，门票便供不应求。1963年，弗拉门戈对阵弗卢米嫩塞，在当时这是一场决定冠军归属的关键之战，当时这场比赛吸引了几乎20万名的球迷涌进马拉卡纳球场。弗拉门戈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踢过5场情形类似的比赛，而那5场比赛每场的上座率也都达到了15万人以上。数字的准确度并不重要，但可以确定的是巴西球迷的确创造了世界足球上独一无二的景观。雅克·德里斯维克在1954年观看了当时巴西国家队参加瑞士世界杯预选赛时的场面时说：

“当巴西国家队拿到了奔赴瑞士参加世界杯的门票时，人群里出现了巨大的叫喊声：‘前进瑞士，前进瑞士。’成千上万的球迷们把他们的上衣撕破，点燃并且挥舞着，就像在挥舞着胜利的火炬一样。我觉得相对于这样壮丽的景观而言，足球比赛只能甘拜下风了……这些非凡且努力的球迷们是把足球比赛当成了一种释放。足球场里的一排安全阀门就是为了让超载的球迷们释放情绪而准备的，他们的热情需要释放出来。”

20世纪40年代末，诸如“缠绕”这类的球迷组织大批涌现，而一些乐队和“恰朗加斯”（古巴民间音乐，这里泛指会演奏这类音乐的小团体）也加入了进来，他们会燃起焰火甚至是烟雾弹。到了五六十年代，这些球迷组织继续壮大，而且已经能主导球场内的氛围。而一本名为《体育周刊》的杂志，从三四十年代起就非常支持这些球迷的狂热举动，不仅鼓励他们，甚至还组织球迷间进行比拼。这本杂志会着重奖励在比赛中装扮别致、完全展现自身魅力及能量的球迷。可以想象，当时的氛围有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缠绕”组织一般很早就来到球场，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占据场内最好的位置，此外，他们还会带来很多巨大的自制旗帜、横幅以及球员画像。伴随着“恰朗加斯”以及一些音乐家（球迷之中）的帮助，这些球迷组织总会在比赛时齐吹口哨、大声唱歌以及不停呐喊。而当球员进场时，球迷就会开始燃放焰火、烟花和烟雾弹。与此同时，从球场高处洒落的是像暴风雨一般的飘带和五彩纸屑，而人们还会把报纸当成是胜利的宣言抑或失败的诅咒——将这些被卷成圆锥形的报纸一起点燃。

海梅·德卡瓦略是当时球迷组织中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所在的球迷组织在1954年美洲杯时得到了赞助商和政府的支持。那时，他的妻子还为他缝制了一面长10米宽8米的巴西国旗。随后的1954、1962年和1970年的世界杯，海梅·德卡瓦略也没有缺席。值得一提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诸如“缠绕”和“恰朗加斯”这样的组织已经开始出现在里约其他俱乐部中，并且还在不断扩大。1967年，为了庆祝弗拉门戈的“恰

朗加斯”球迷组织成立25周年的纪念日，德卡瓦略和“恰朗加斯”还有里约的“缠绕”组织聚在一起，还获得了奖励品——一个扩音器。弗拉门戈俱乐部最终让他成了俱乐部股东，他得到了一般人所没有的机会，并且进入到一般人所不能进入的领域。Vasco TOV组织的领导者是曾经得到过《体育周刊》文刊评选出来的城内最佳球迷奖的杜尔切·罗萨利纳；而弗卢米嫩塞的球迷组织领导人是保利斯塔，博塔福戈的球迷组织的关键人则是塔尔赞。

塔尔赞于1927年出生在米拉斯吉纳斯，曾在20多岁的时候徒步来到里约，这样的行为使他得到了“麻烦制造者”的称呼和名声。在移民潮时期，足球是他进入到里约社会的途径。他第一次去看博塔福戈的比赛是在1953年，而在1957年的时候他带着自制的旗帜和烟花去了球场。在60年代初，他在里约市中心开了一家假发店，并且成了博塔福戈球迷组织“缠绕”的领导人物。塔尔赞也被当成了媒体的礼物，他时刻准备着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比如他会像球迷领袖一样去嘲笑和反对那些人们认为没有好好为俱乐部服务的球员和董事会成员。这也许不像是欧洲政治活动，但在巴西这样一个很少有自发组织，并且也很少有人敢于说真话的国家中，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民主的进程。

IV

在那个年代的巴西大城市里，足球也开始受到了多媒体时代的冲击。

“在里约州联赛的一场平凡的比赛.....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上、咖啡馆和广场里收听.....报纸上主要的版面也是足球专栏.....拥有巴西最大发行量的报纸是《圣保罗体育日报》。”

上面这段话写于1963年，这位作者应当把电视也加进来。早在50年代中期的时候，圣保罗的几家有着开创精神的电视台就尝试把足球比赛录成影片来播放。但在60年代末之前，电视在巴西还只是少数人拥有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些人在积极地反对电视。内尔森·罗德里格斯就是其中之一，他震惊于电视直播将足球比赛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给带走了，反抗道：“假如录像带显示出那是一个点球的话，那录像带就太糟糕了。录像带是愚蠢的。”

电视的时代最终会到来，但是收音机直到70年代依然是了解比赛最热门的方法。实际上，几乎整个巴西收听足球的听众人数因为晶体管收音机的到来而急剧增长。那时的巴西人在便携式收音机上收听比赛是很普遍的，以至于阿马西奥·马扎罗皮在1966年的喜剧《科林蒂安》中表演了这样一个场景：当时，主角正穿着礼服坐在高档剧院里，而马扎罗皮扮演的角色则把一个小收音机放在大腿上，他正在收听科林蒂安的比赛。当他看到有个警察追着他到走廊的时候，他感到很羞愧，于是把收音机藏在了他的夹克中。那个警察则靠过来小声地问他：“比分多少呢？”其实在那个时期，很多喜爱电影的球迷都会在看电影时塞着小耳机收听比赛。当然，电视的到来也为足球世界带来新的职业，并为比赛带来了智慧和温暖。菲奥里·吉廖蒂是1962年世界杯决赛的重要解说员。他曾在决赛开球时说：“舞台的幕布拉开了，表演开始了。”他会在球队落后的时候讽刺道：“留给.....的时间不多了。”他形容比赛的最后几分钟是“黎明前的黑暗”；当失球的时候他也会批评同情的人“现在哭是没有用的”；同时当有进球出现的时候他会说“一粒漂亮的进球！”和“一个甜蜜的吻！”。而另一名解说员佩德罗·路易斯则有着一项在一分钟内表达愤怒和疯狂的情感宣泄的记录。瓦尔迪尔·阿马拉尔是70年代里闲聊派的解说员，他有着说火星文和给人取昵称的天赋：“当一支球队看起来要进球的时候，球就像在冒烟；当他们进球的时候，鱼就已经在网里了。”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虽然巴西的文盲开始逐渐增多，但这也为纸媒尤其是体育媒体预留了广大的市场潜力。在40年代，马里奥·菲略和他的合伙人撰写并且发布了一系列足球文章，这也被认为是足球写作的开始。这些足球文章跨越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连通了世俗和高雅文化、新闻和文学，在之后的30年里开始变得兴盛起来。马里奥·菲略有着无限的想象力，所以能够各种胡诌，他给多民族的巴西带来了大量的无争议的弗雷里安读物（“弗雷里安”一词为巴西独有，是由吉尔贝托·弗雷雷提出的一种关于巴西种族融合的观点和理论）。内尔森·罗德里格斯则从另一个方面找到了写作方法，他是一名剧作家、评论家和辩论家，他的散文风趣、尖锐，并且常常挖掘别人的丑闻。在描写足球的同时他也经常会去探索和发掘里约的一些有反常、不忠行为和歇斯底里的人；被咖啡因、尼古丁和酒精深深刺激的他，揭开了隐藏在城市美好风景背后的另一面。他给里约的城市景观刻下了一个发狂一般的弧线。他比阿里·巴罗索还要狂热且偏激：“我是弗卢米嫩塞球迷，我会一直支持弗卢米嫩塞，我说了我会支持弗卢米嫩塞直到死。”他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偏激以及充满阴谋论的想法，最终在其作品《阿尔梅达的邪恶力量》中的人物身上有所体现：一个住在里约北郊的中世纪疯子，灵魂里带有偶然和不安的因素。

菲略和内尔森·罗德里格斯都在60年代和70年代有过文学创作，他们也给予了像阿尔曼多·诺盖拉和若昂

·萨尔达尼亚这样的新一代解说员不少启示。等20年代的圣保罗现代主义派作家和40年代的西北部作家逐渐老去且逝世之后，他们在足球文学中的位置则被新一代的诗人和艺术家所占据。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在《圣保罗纪事报》为1958年到1986年的每一届世界杯写过一系列的文章。他的文章有深度且有趣，他在文章中指出，巴西队在1962年世界杯的夺冠阵容，可比时任巴西总统古拉特领导的浮躁的管理层要更加出色和团结。在他稀疏的几行诗歌里，他把巴西足球文化比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比赛神殿，他将足球场比作了一个好玩的、充满幻想和快乐的地方——

足球是在球场里踢的？

足球是在沙滩里踢的，

足球是在街上踢的，

足球是在灵魂里踢的。

踢的球都一样，像一个宗教指令，

不论是对明星还是特殊人物而言，

踢球带来的快乐是一样的，

一届想象中的世界杯，

一场在沙丘中的比赛。

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是一位来自累西腓的外交官诗人，他曾在青少年时期为累西腓的一家圣克鲁斯俱乐部踢球，但他也是累西腓另一家俱乐部美洲队的死忠球迷。他在一封给表兄的信中这样描述球队的一场胜利：“难道你还想向生活要求更多么？”他的工作包括为美洲队的球迷以及美洲队后腰阿德米尔·达吉亚写诗，他曾写过一番关于巴西球员和西班牙教练讨论巴西和欧洲足球风格差别的看法的旧弗雷里安风格的文章。他在描述阿德米尔的能力时往往会用激烈的措辞：“他想把他的对手送到哪去就送到哪去，使对手变弱。他奔跑起来的节奏就像是跑在温暖的沙滩上……他对对手是无情的，他会让每个对手都脱不了身。”甚至连神秘且聪明的作家克拉里斯·利斯佩克托也被足球写作给诱惑到了。她的一篇小故事讲述了某人在马拉卡纳球场看球时的紧张经历，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她不同于那些在舒适的单人沙发上看球的早期作家。

在瓦加斯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足球绘画精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足球绘画开始变得多种多样且大量，有阿尔德米尔·马丁斯的足球雕像和他的动漫作品，有克劳迪奥·托济的潮牌足球文化衫，还有鲁文斯·热尔尚绘制的关于足球看台上的球迷的作品。这些大部分都是描述的庆祝活动的作品，但是从若泽·阿吉拉尔的足球画上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东西。他的关于巴西国家队的作品，创作于1964年的军事政变之后的几个月，所以他的这幅作品上球员的脸都被模糊化了，这对于足球王国而言是相当让人难忘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足球和音乐就已经建立了字面上和比喻上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在之后的20年里变得更加强烈。1958年和1962年世界杯就有超过35首与足球有关的歌曲在市场上发行。表演者、演奏者都不同，这其中充满了巴西当代音乐风格，表达了对巴西文化一种少有的自信。比如那轻快、流行且充满爱国精神的《世界杯是我们的》就是一首典型的歌，歌词写到：“那些海外的巴西人/展示了真正的足球是什

么/他们赢得了世界杯/桑巴舞把球粘在他的脚上/球进了！”罗纳德·戈利亚斯则从来自圣保罗的托尼科与蒂诺科这对组合的歌曲《伟大的巴西队》中得到灵感，并将其改编而成了一首乡村歌曲——《卡塔雷特》。

收音机、音乐和文学都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西独特的足球文化贡献了一分力量，它们都在向世界展示、庆祝和解释着巴西足球的成功。但是在那个年代，最有意思、最中肯且最能对足球的问题进行透彻分析的艺术形式还是电影。在30年代就有过一大批各种各样的足球电影。在1953年的通俗电影《爆裂》中，既设定了科林蒂安背后有维多利亚王子的支持，也描绘了奥斯瓦尔多·桑帕约的冒险，这部半小说、半伪纪录片的影片其实讲述了一个关于1958年世界杯的轶事。

到了60年代中期后，在流行的笑闹剧里也能看到2部与足球有关的剧集——1963年的《偷了世界杯的人》和之前提到过的1966年的《科林蒂安》。前一部是描述蹒跚前行的侦探的惊险喜剧片，后一部则是杂乱无章但却很有启发意味的家庭喜剧，它是由巴西首屈一指的喜剧电影大师阿玛西奥·马扎罗皮自编自演的。马扎罗皮在这部戏里演了一位狂热的科林蒂安铁杆球迷，他是一名理发师，而他的邻居则是一名帕尔梅拉斯球迷，他会在科林蒂安输球的时候买掉当天所有的报纸，也会把那天讨论和抱怨足球比赛的顾客赶出理发店。瓦加斯时期的足球电影描述了一个与当时道德伦理思想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哀叹他的儿子想成为一名医生，而他的女儿想成为一名芭蕾舞者，这和他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原本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名科林蒂安球员，而他的女儿应该要嫁给当时的科林蒂安球星——里维利诺。这并不是一部有意搞笑的影片，但也没有感伤和不自然的地方。另外一部很搞笑的影片则是1963年的带有一点偶像传记风格的《球王贝利》，这部影片通过一系列的小说式闪回和对贝利职业生涯的剪辑讲述了贝利的人生。这部影片改编自一部巴西的先锋作家鲁伊·巴博萨的著作。

巴西新电影运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兴起，这也证明了电影业在那个年代所起到的作用，巴西新电影运动依靠着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使用了街景和龙套演员，并向美国的真实电影借鉴了纪录片的技术，并且将2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将镜头移到了巴西最穷最乱的地方。在早期的巴西新电影中，有内尔森·佩雷拉·多斯桑托斯在1955年导演的《里约40度》。这部影片讲述了里约的贫民窟里一系列有着内在联系的故事。这些故事主要由5段在里约城的街道和主要标志性建筑（包括甜面包山和星期天有比赛举办的马拉卡纳球场）里卖花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几个场景都是实地拍摄，并且大部分的演员都是群众演员。这部电影对于当时的巴西电影圈来说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这是第一部描述足球是巴西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巴西电影，并且这部电影一度给保守的里约和巴西当局带去困扰，犹豫到底要不要去禁止这部影片，有爱钻牛角尖的人指出里约从来没有像电影里那样炎热得超过39.6摄氏度。在这部电影的一系列故事里也有一个关于足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老球星担心自己在球队中的地位不保以及即将被转会到圣保罗的事，这是足球运动员第一次在巴西电影里被描写成可以像商品一样可以进行买卖。十年之后，另一部根据内尔森·罗德里格斯的戏剧所改编的电影《逝者》描述了位于里约北区的一对穷邻居关于足球和婚姻的争吵。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对不开心的夫妇祖尔米拉和托尼，祖尔米拉总在预想着她的死亡，所以开始为她那奢华的葬礼做准备。托尼则天天玩弹球、喝酒并且担忧着瓦斯科达伽马对阵弗卢米嫩塞的比赛。当祖尔米拉因为肺炎而正如她所预想的那样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她让托尼去见自己的前男友皮门特尔，皮门特尔会为祖尔米拉支付她葬礼的开销。托尼威胁敲诈皮门特尔让他离开并把钱留下。他花了很少的钱为祖尔米拉办了一个简朴的葬礼，最后的场景是托尼在马拉卡纳观看瓦斯科达伽马的比赛，并且在人群中哭着叫喊自己还是选择放弃金钱。足球，据说是伤心人的发泄物，也能为人带来安慰，它也许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但能让人忘却悲伤。

巴西新电影运动在60年代初有两部重要的足球纪录片。《地下足球》是名为《巴西真相》的纪录片四

部曲里的一部，这部影片的摄影是经常游走在巴西各地的伟大摄影师托马斯·法尔卡斯，导演是莫里斯·卡波维拉。这部影片汇编了3名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球员们的生活和想法。虽从贝利这样一位已成名的巨星开始，但是影片的中心部分还是描述刚刚开启职业球员生涯的路易斯·卡洛斯·弗雷塔斯和将退役的球员佐齐莫。这部影片通过在训练场、医疗室等接受采访的场景描述了球员的生活。3名黑人球员被白人俱乐部主席、教练和医生所严格监督。佐齐莫是两届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但他最终还是失宠。他的人生是苦涩的，球员只是球队的奴隶，并且他的妻子还经常抱怨他常常不归家。这部影片的结尾是发生圣保罗州联赛赛场里的球场暴力——看台上的醉酒球迷混乱不堪，武警和带着头盔的士兵冲向人群，球员受伤的头还在滴血。

《加林查：人民的快乐源泉》的核心情节是由若阿金·佩德罗·德安德拉德执导的，描绘了加林查的场上和场下生活，以及他在巴西著名足球历史里的地位。这是一部支离破碎的、非线性蒙太奇叙事的作品，这部影片包括了马拉卡纳打击的片段，加林查在1958年和1962年世界杯里天才般的表现，以及展现了这些视觉性故事的根基——巴西国内穷人的足球文化。加林查在他的家乡保格朗德的泥土场里踢了一场没有上衣和球鞋的5人制比赛，这是在他在喝酒抽烟闹绯闻之前的故事。当科巴卡巴纳海滩还允许穷人在上面玩耍时，小孩们都在沙滩和街道上踢球。《地下足球》这部影片给予了人们一种很清晰直观的感受，球员的生活和工作都处在一个被监督的环境下，摄像机经常会停留在加林查养在笼子里的宠物鸟身上。但是这部影片中最好的瞬间就是它描述加林查作为球员时在球场上的表演。和缓慢节奏的桑巴不同，德安德拉德快速剪切了加林查的动作，他那低重心式的弯曲和扭转用慢镜头展现了出来，向人们揭示了加林查那精巧的触球技术——他带球晃过对手，简洁有力地戏谑对手，将对手弄得天旋地转。这部影片的取景可以说是天才般的，这部自传体式作品揭示了一个多彩的巴西足球，表现了太多的期待和焦虑。这部影片达到了和费尼希耶斯·迪摩赖斯的诗歌一样非凡的欢乐顶峰：

“一次盘带，两次盘带；这球就像个饰带；

你的双腿之间就是欢乐，你就是一阵风！

一个瞬间，人群躁动

在致死的瞬间，站起来并尖叫

团结是他们的希望之歌

加林查是天使，人们喊道：进啦！进啦！进啦！”

在瓦加斯和库比契克政体下的巴西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期，在那个时期的巴西在足球运动方面获得了很多胜利，这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想。在1960年那年的总统大选里，来自圣保罗的州的官员雅尼诺·夸德罗斯在很意外的情况下当选巴西总统，他是反腐和反通货膨胀的右派人士。但在仅仅7个月之后他因害怕失败而辞职。他的接任者则是副总统古拉特，古拉特在瓦加斯时期一位非常有人气的。但古拉特手里的巴西在3年内骚乱越来越多，在库比契克时期巨大的财政开销并且通过印刷货币来填补烂账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从当时的10%变成了1964年的100%，这是一次金融崩溃和外贸危机。当经济在螺旋式上升中失控，巴西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开始变得两极分化。支离破碎并且怨言颇多的左派开始给政府施压，他们妄图以极端方式达成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巴西的足球俱乐部，像所有的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对当时巴西的经济状况也是很绝望的。在外汇不跌的情况下，不同于巴西其他的出口商品，足球比赛的需求量则因2次世界杯的成功而变得很大。巴西足球开始了一段世界之旅，桑托斯和贝利是最大的吸引点。球队在每个大洲都进行了比赛，弗卢米嫩塞去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苏联，瓦斯科达伽玛则在非洲进行过比赛，博塔福戈游历过法国和摩洛哥。来自里约低级别联赛的一支俱乐部——马杜雷拉都能支付得起他们在中北美和加勒比海的3个月旅程的费用。他们甚至还在导弹危机过去仅1年的古巴完成了比赛，并且还和微笑的切格瓦拉有过合影，这张合影在巴西国内的媒体中也有过报道，这名摄影师使有着偏执反共主义的巴西军政府相当恼火。

在1963年末1964年初，以中间温和派掌控着局势的古拉特最终选择了左派，并且在全国各大城市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下宣布开始一系列的国有化改革和土地改革。右派人士则认为这是一种反市场的经济制度而聚集起来。之后的1964年春天，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巴西军队开始干涉政治。在里约和巴西利亚的主要政府部门都被军队所控制，而左派的主要人物也均被逮捕入狱。副总统要民众上街示威，但是他们都被流放，同时古拉特也逃亡至乌拉圭。那年的2月和3月，桑托斯队和贝利都离开了那个充满活力和善于创新的巴西，他们开始了一段在阿根廷、乌拉圭、秘鲁和智利的旅程。当他们在几乎20年之后回到巴西时，局势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然后，没有任何改变的是，圣保罗依然赢得了圣保罗州联赛的冠军。军政府的出现显而易见的将会深刻地改变巴西足球。

题记：O·尼迈耶，《时代的曲线：奥斯卡·尼迈耶回忆录》（*The Curves of Time: The Memoirs of Oscar Niemeyer*），伦敦：Phaidon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1. 引自杰弗里·格林，《时代》（*The Times*），1958年6月30日
2. J·雷特·洛佩斯，“人们欢乐的消失：关于足球运动员之死引发的思虑”，《拉丁美洲人类学杂志》4（2），2000年
3. 引自《贝利1990专辑》，第一卷和第二卷，悉尼：韦尔登出版公司
4. J·利弗，《足球狂热：巴西对世界最流行的运动满怀激情》（*Soccer Madness: Brazil's Passion for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Sport*），第二版，伊利诺斯州普罗斯佩克特海茨：韦夫兰出版社，1995年
5. 同上，第74页
6. 同上，第72页
7. J·德·里斯维克，《100000小时的足球》（*100,000 Heures de Football*），巴黎：圆桌出版社，1962年，第224-225页
8. 引自T·马森，《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9. 罗德里格斯引自A·贝罗斯，《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10. 若奥·德·卡布拉尔·梅洛·内托的书信全文详见：

<http://www.literaturanaarquibancada.com/2011/11/joaocabral-de-melo-neto-e-o-futebol.html>

11. 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Quando é Dia de Futebol》，里约热内卢：Editora Record出版社，2002年

第五章 强硬流派：独裁统治下的足球（**1964-1986**）

作为足球运动员的“我”不断抗争，是为了自由和对个体的尊重，为了平等的人权，为了充盈的毫无条条框框的讨论，为了这项运动冲破不可预见的限制实现民主化，而这一切坚持都深深地源于这项运动开拓、欢乐和令人愉悦的本质。

——苏格拉底

在巴西，采用何种方法赢球并不重要。一种非常暴力的足球方式正在渐渐成形。

——泰莱·桑塔纳，**1985**

I

《巴西日报》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严肃的文章，将当年世界杯上巴西4比1战胜意大利的成就与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相提并论。在这篇文章看来，两者都是一个国家在某方面发展到了顶峰的体现。美国拥有大量的资金、庞大的科研和工业力量、钻石般坚硬的理论与精巧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得他们可以将人类送上月球，这是19世纪太空时代的重现。另一方面，巴西虽然没有美国那样的经济实力，但是它却从它的流行文化和短命的民主公民社会中汲取出了复杂的生态，从而造就了一代特殊的足球运动员。足够贫穷的经济环境给了他们持续的激励与天赋，他们在街头足球中学习，但是并没有被贫穷完全埋没，他们的天赋有在最高舞台上发挥的机会，这样的经济条件对于他们来说又是足够富裕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国内外已经普遍认为巴西之所以第三次赢得世界杯冠军不仅仅是球员的原因，巴西的胜利远不只是简单地赢得一场比赛。巴西足球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的表现，一种对巴西音乐与舞蹈的体现，一种对巴西韵律、美丽和自信的美学标准的展现。但是到了1985年，老式进攻足球的热烈支持者、巴西国家队教练泰莱·桑塔纳却对巴西足球尚未成熟的球员和野蛮的打法表示了失望。究竟发生了什么？巴西在将军的掌控下赢得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真是神话般的好运气。他们的统治时间如此之长，并且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这项运动，这是足球的不幸，他们的独裁留给足球运动最主要的遗产只是对足球运动的粗糙化。

1964年上台的军政府被划分为鸽派和鹰派，前者认为巴西的困境可以归结于民主的不稳定性、民粹主义政党较差的纪律性和左派人士的邪恶的煽动性等。短期的军事干预会清除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在经济决策等问题上注入一些必要的纪律和方向，而之后军方就可以从权力中退出。强硬派的倡导者则更加悲观和偏执，他们认为巴西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经过一个更加彻底的改造，这就需要军政府长时间的执政，以便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对手和媒体的审查。

1964年和缓派止步，卡斯特罗·布兰科将军被他的军事同仁任命为总统。国会中的左派和其他对手被清洗一空，参议院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政党被允许在1965年参加州级选举，但政府支持者较差的表现使得当局决定解散所有现有的政党，替换成本方的政党ARENA和一个傀儡反对方PMDB。军方接管政治，经济被一群可靠的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掌控，他们制定了价格稳定计划来抑制通货膨胀。足球对于政府来说只是一个税款的来源。1965年成立的新国税局就向迪迪、马里奥·扎加洛和尼尔顿·桑托斯等明星征收了未缴的税款。加林查的经济状况比较混乱，而他的税收账单又如此之长，以至于巴西足协主席若昂·阿维兰热害怕加林查会因为交不起税款而被囚禁以致无法参加1966年世界杯，只得帮助加林查缴齐了税款。

卡斯特罗从来没有显露过自己对足球的兴趣，在军政府早期，巴西足协就因为害怕被认为与敌人亲善而取消了一场将在马拉卡纳球场举行的与前苏联的友谊赛。然而当新的政党执政之后，他们认识到足球并不能被忽略，毕竟这项运动也有它的用途。所以第二年，巴西就重新邀请前苏联在马拉卡纳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尽管双方2比2战平，但是桑巴军团迎击了前苏联的来访者并占了上风，当然这也没有对军政府的反共主张有任何伤害。而当时正在访问巴西的鲍比·肯尼迪也观看了这一场比赛。1966年，巴西国家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即遭淘汰，国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探寻桑巴军团崩溃的原因。1969年，卡斯特的继任者，总统科斯塔·席尔瓦将军中风去世的时候，最高层就仔细考量过是否应该在巴西队参加1970年世界杯资格赛最后一场比赛之前公布总统去世这一消息，他们害怕这一不幸的消息会影响到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球队的发挥。

从1968年直到70年代中期，鸽派和鹰派之间的平衡渐渐转向后者。各种抗议活动开始爆发，其中包括工人的“野猫罢工”，学生在里约热内卢的示威，来自影视创作者与音乐家们作品的批评，以及左派游击队的武装抵抗，这些反对的声音结合起来，挑起了军方中大规模的反弹。

对媒体、广播和电视的审查愈演愈烈，官方和民间以及各种政府的镇压机器和爪牙都憋足了力气，逮捕、骚扰和折磨数以千计的反对者。国会被关闭，政府的合法性只剩下两大支柱：强力推动下的经济增长和宏伟的民族主义，而后者越来越依赖于足球的成功和其传达的政府形象。

1969年后期，埃米利奥·梅迪西将军成了军政府第三任总统。由于个人兴趣和政府宣传部门的积极响应，梅迪西很快表露出对巴西足球的支持。在任职期间，他经常公开出现在弗拉门戈的比赛现场并通过赛场广播进行演讲。对于1970年参加世界杯的巴西国家队成员组成和球队管理方面，梅迪西也表露出了积极的兴趣。在巴西队胜利之后，他在总统府会见了巴西队，并向全国做出演讲：

“看到广大人民在这样一种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运动中得到了快乐，我感到了深深的欣喜，我认为这样一场胜利不仅仅是优秀的体育竞技者之间兄弟般深厚情谊的胜利，也是我们对于国家发展不断增强的信念的胜利。这场胜利代表了我们的国家队无论在技巧、身体还是智谋上，都体现出了智慧和勇敢、持久坚韧和冷静。总之，我们的队员赢了，因为他们明白如何才能为集体而奋斗。”⁽¹⁾

梅迪西任期内，军政府以足球为其统一的道德上的正面模范，这也是军政府试图让民众认可的形象。但是现实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他们对足球的利用往往成为一种单纯拉拢人心的手段。1973年最低工资标准即将被公布之际，因为最低工资的升幅并没有跑赢通胀，所以里约热内卢的劳动局就提前准备了15000张弗拉门戈对弗卢米嫩塞的免费球票发给民众。

梅迪西的继任者，欧内斯托·盖泽尔将军，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书生气质的内敛的人，在自己的6年任期内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国内新闻发布会。但是因为足球对于军政府有着如此重要的宣传意义，盖泽尔将军就职总统的告示上是如此宣称的：“来自本图贡萨尔维斯的加乌乔人，64岁，是阿雷格里港国际队和里约博塔福戈队的忠实球迷，两位将军的兄弟，已婚，育有一女，欧内斯托·盖泽尔将军将成为共和国第23任总统。”⁽²⁾盖泽尔在就任总统之前是否去看过足球比赛并不确定，但是他在就任之后就成为了球场的常客。无论是新球场开幕，还是国外球队来访，他都会到场观战。1978年世界杯前夕，在观看一场比赛时，盖泽尔就向曾经批评过军政府过多参与足球运动和球队管理的前锋雷纳尔多训诫道：“你是踢足球的，不要讨论政治，处理政治的事情让我们来。”

若奥·菲格雷多是巴西军政府最后一位最高统帅，在1979年至1985年之间担任巴西总统。据称相比足球他更喜欢慢跑，相比起人他更喜欢马。但他被广泛吹捧为弗卢米嫩塞和格雷米奥的支持者。确实，不同于任何一位前任总统，他在任期内被拍到穿着蓝色、黑色和白色条纹的格雷米奥队足球衫。而他年轻时就是在里约奥格兰德太阳州的格雷米奥经历了军事训练。担任总统期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应对快速下降的巴西经济，尽快平复恶性通货膨胀；另一个是巴西军政府开放的序章，即稳步推进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向文官统治的过渡，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巴西才能得到整体繁荣发展。这样，巴西军政府以足球作为一个宏伟的典范，来表达自己经济发展的宏伟模型和试图达到受管制的民族团结终于走向了终结。当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若昂·阿维兰热试图说服菲格雷多总统让巴西举办1986年世界杯时，菲格雷多总统回答说：“阿维兰热，你知道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么？你知道干旱的巴西东北部么……你真以为我会把钱花在修建足球场馆上么？”⁽³⁾这不仅是一个资金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足球现在已经不再是政府的被动工

具。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足球比赛经历了广泛政治化的过程，并成为积极抵抗独裁的一个据点。足球运动员挑战教练和董事的权力，体育场举办了工会集会，妇女长期被排除在非常男性化的巴西足球和社会生活之外，所以都在努力夺回自己的权利。

巴西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灾难性状态确保了军队会忠于自己的承诺，在一段时间的统治之后最终交出大权。被长期阉割的国会，终于找到足够的勇气选出了20多年来巴西第一位平民总统——坦克雷多·内维斯。内维斯以前是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州长，是最终幸存下来的中间派和善于寻找同盟的务实主义者。他是米内罗竞技的支持者，但同时又明确表示，他也喜欢贝洛奥里藏特的其他球队。但是就在内维斯就职典礼的前几天，突然而至的重病让他痛苦地死去了，向民主过渡的国家重担只得交给了副总统若泽·萨尔内——一个来自巴西东北部的老派政治家。萨尔内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和分发资金的人。管理一个复杂的经济重启是另一个领域的事情。在他的第一年任期中，萨尔内和他的技术专家就遭遇了不可驯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1986年春天，萨尔内坚持认为，桑巴军团必须改善才能赢得世界杯。但巴西足球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参加1986年世界杯的巴西队永远不会赢得冠军，这一点是任何政治家也无法决定的。

II

其实在巴西军政府长期掌握大权之前，对于独裁统治者来说，巴西足球已经有了改变和分散的迹象，独裁统治的存在只不过放大了这些迹象。那个时期，球员个人以及豪门俱乐部的新老更替和架构都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电视的普及改造了这项运动；青年群体开始挑战初代球迷群体“加油”的权威，并且比赛中的暴力和好斗趋势也在上升。

参加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巴西军团征召了很多赢得此前两届世界杯的球员。这次贝利和加林查不再处于边缘，而是正值巅峰状态、经验丰富的“冠军们”。巴西在第一场对阵保加利亚的比赛中取得胜利，但在接下来对阵匈牙利和葡萄牙的高强度对抗比赛中，他们被对手侵犯，完全输掉了比赛。这是加林查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从英格兰回来时已经从博塔福戈转会至科林蒂安。无论是科林蒂安还是加林查都已经过了自己的黄金期。加林查的膝盖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扭曲，当时使用夹板和止痛药来帮助愈合，但当他接受手术时却为时已晚。更糟的是，发生了一场车祸，他虽幸存了下来，但是他岳母却就此离世，此后他陷入了深度抑郁，酗酒使得他的情况更加恶化。他对于训练和计时的小小爱好土崩瓦解，他就这样消失了十多年，不留一丝痕迹。

巴西足球见惯了火爆脾气、斗殴以及对峙，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现象变得更加常见，狂躁的行为愈演愈烈。1964年里约-圣保罗锦标赛的一场关键战役，博塔福戈对阵桑托斯，一场争斗很快席卷了球场上的所有球员，甚至是通常比较冷静的贝利也参与其中，后来他和其他两名球员一起被罚下场。1965年桑托斯的泽吉尼奥拳击达伽马的利马，而后者还以颜色，由此引发大战，7名球员被罚下。1966年里约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班古3比0战胜弗拉门戈，在比赛中弗拉门戈有5人被罚下，班古有4人被罚下。1967年的一场阿梅里卡对阵奥拉里亚的比赛，比赛开场仅8分钟就终止了，因为场上所有22名球员全被罚下，与之匹敌的是同赛季另一场比赛，达伽马对阵弗卢米嫩塞，也有22人离场。与此同时，巴西的安全系统正广泛撒网，用暴力制服了数千名激进的学生以及城市游击队员，绿茵场也愈发动荡。1969年，巴西队在马拉卡纳球场2比1击败秘鲁，托斯陶野蛮地踢倒了秘鲁球员德·拉·托雷，随后到来的斗殴持续了40分钟，引来大批警力到场，阿维兰热被迫请求秘鲁人重新开始比赛。

桑托斯也每况愈下，巴西足协让巴西俱乐部退出南美解放者杯的决定意味着球队没有洲际比赛可打，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拿过国内奖杯，但俱乐部在国内，甚至是圣保罗州的统治力都下降了。球队的注意力转到国外，仅1967年一年桑托斯踢过比赛的地方就包括了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秘鲁、巴西、加蓬、扎伊尔、科特迪瓦、德国和意大利。第二年球队又去了欧洲、南美洲和中北美洲。考虑到贝利的合同将于1972年到期，俱乐部管理层又一次打开了远征的大门，带着球队去了香港、玻利维亚、萨尔瓦多、马提尼克、牙买加、哥伦比亚和海地。俱乐部到底挣了多少钱？史料记载非常少。高层的确曾计划给会员建造一栋高级会所——巴尔内阿里奥坎公园酒店，但后来他们把钱花在失败的赌场计划上，留下历史悠久的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慢慢破败。

也许的确是桑托斯让贝利获得了踢球的许可，但贝利逃离了他们的掌控，用自己的能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1969年中期，媒体被贝利职业生涯的第1000粒进球的即将到来牢牢抓住，这个进球充其量不过是不断累积练习而成的里程碑，这一数字的精确性也并不是重点。随着巴西媒体发展的新趋势，这个进球是进给电视观众看的。在到第990球的时候，巴西媒体就以一种运筹帷幄的狂躁感情工作着，当计数器数到998球时，萨尔瓦多球场球门后的摄影师已经人满为患，甚至挪到了球场上。第999球时，达

伽马的阿根廷门将安德拉达因为扑救了贝利的一次射门而被嘘声淹没。第1000球是粒点球，贝利进得很轻松。进球之后他跑进球门将球捡起，随即被淹没在摄像师和记者的人海之中，当他最终从混乱中脱身之后，剩下的是一场伤感的盛宴。贝利把进球献给了巴西的孩子们，他穿着特别为1000个进球设计的上衣绕场了一周又一周。一位参议员为贝利写了一首诗，并在议会当众朗诵。世界其他地方的媒体都在报道阿波罗12号的登月计划，而在巴西，这两件事把头条版面一分为二。之后贝利飞往巴西利亚，乘坐了一辆敞篷车游行穿越城市，新任总统梅迪西在总统府接见了，并授予他国家勋章。一个月内，纪念性的贝利半身像被委托塑造，布满奖章的墙被修建起来，巴西邮局还发行了纪念邮票，与此同时，游击队绑架了美国大使，新任总统梅迪西站稳了脚跟。而贝利的故事一直占据了所有电视台的新闻。

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收音机是巴西人消费足球的主要渠道。的确，除了报纸读者的小圈子之外，收音机是国内大部分人接收新闻、故事和娱乐内容的主要来源。相比之下，独裁统治的年代也是电视兴起之时的同义词。1960年全国只有60万台电视，直到1986年独裁者退回军营，期间政府补贴的电视机分期购买计划使全国电视数量达到了2650万台，是当初的44倍。

得到全国的关注后，军事政权把精力集中在允许谁去播送内容上，他们通过自己的权力颁发和撤回频道许可证，政府制造了一个傀儡产业，其中最重要的公司就是环球电视网——罗伯托·马里尼奥的报纸广播帝国，这个公司最初是美国媒体巨头“时代生活”的合资企业，它的发展很快超过了它的合作伙伴，政府积极扶持“环球电视网”的贷款、设备、建筑、技术引进和播送许可。作为回报，这个全国最有活力、最专业、最有创造力的媒体集团成了政府的可靠盟友与伙伴，在政变发生、实行军事统治仅仅1年之后，环球电视台于1965年成立，之后的20年它都是巴西最强大的文化寡头，它的新闻、名人花边、娱乐节目和肥皂剧统治了收视率。不过足球产业对媒体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因为害怕影响球票的销售，他们拒绝出售直播权。然而环球电视台勇往直前，播放了足球比赛的重播和巴西军团在世界杯的比赛。

独裁统治开始的前几年，足球比赛，尤其是重要比赛的上座率保持得不错，但球迷群体本身正在改变，弗拉门戈的著名球迷德卡瓦略由于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不是在家就是在医院休养，于是四十年来第一次缺席了弗拉门戈的比赛，在看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一群更年轻的球迷横空出世，就是日后的“弗拉门戈年轻球迷（Torcida Jovem do Flamengo）”组织。他们带来了一种全新、好斗、对抗的支持方式，这种方式是他们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时从电视上学来的。与老的球迷组织“恰朗加（charanga）”和它的支持者们不同的是，“弗拉门戈年轻球迷”会嘘自己的球队，会在球网后面集结、更积极地嘲讽对手。德卡瓦略在身患癌症、时日无多之时，于医院病床上写信给报纸，谴责这种球迷中的转变，并提醒公众“弗拉门戈教会我们：对巴西的爱高于一切”。随着他的过世，“恰朗加”消失在看台之间，只作为个人在社交时谈论的话题。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里约的各个俱乐部里，同样的世代斗争也在上演。达伽马球迷达尔西·罗萨莉娜被迫放弃对“加油”组织的领导权，“达伽马年轻力量（Força Jovem do Vasco）”也取而代之成为最主要的达伽马球迷组织。在圣保罗，相同的故事也在发生，同样也是年轻群体冲击旧势力，比如科林蒂安的“鹰（Hawks）”和“卡米萨12（Camisa 12）”、圣保罗的“三颜色（Tricolore）”，那时他们已不是逃离的群体，而是统治看台的力量。

任何流派的足球主题电影如同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新潮电影一样，在军事统治下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抛开迷你史诗电影《运河100》不谈，传记电影《托斯陶——金色野兽》是1970年世界杯之前拍摄的唯一一部足球电影，然而在墨西哥世界杯之后，名人足球电影得到了许多资金支持。关于当时“三星巴西”的纪录片层出不穷且鱼龙混杂，有些就是同一部电影的重新剪辑，还有一些是把1958年和1962年的世界杯电影打上了1970年世界杯的标签，卡洛斯·尼迈尔的《巴西好球》、奥斯瓦尔多·卡尔德拉的《天下足球》、雨

果·施辛格的《祝贺，大力神杯》和罗杰里奥·马丁斯的《70年世界杯——三星巴西》都属于这个范畴。

路易斯·卡洛斯·巴雷托的《这就是贝利》在1974年，这个伟大男人动身去美国的前夜上映了，这部电影只是贝利众多精神传记中的一部，但是它是彩色的。与此同时，歌手兼喜剧演员戈兰德·奥特洛仍靠着在《贫穷的有钱男爵》中表演呆头呆脑的乡下人赚大钱。成为百万富翁之后，他发现名誉和财富不是为了给像他这样的人准备的。正是在这种阴暗的种族歧视的环境下，人们几乎原谅了贝利自己在1979年出演的电影《特罗姆巴蒂尼亚斯》——一部带有寓意的惊悚片，浮夸而不真实。在电影中，贝利被圣保罗企业大亨聘请，通过足球和打架来解决儿童扒手问题。贝利真可以说是全世界演技最差的人之一，但是他和巴西的白人精英一样对于名声和财富安之若素。

音乐和足球的关系要比电影和足球的关系更好一些。虽然1958年和1962年世界杯并没有引发大量音乐作品的诞生，但贝利获得了最多的歌曲创作，新生代的巴西音乐家与足球建立了良好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和诗歌逐渐远离了足球，而流行音乐仍然是歌颂足球这一欢快的大众运动的主流文化方式。20世纪60年代中期，热带主义运动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卡埃塔诺·维罗索和吉尔伯托·吉尔都录制了一些足球歌曲。他们把美洲非洲音乐和西方的流行乐、摇滚乐结合起来，这对于当局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于是他们被迫流浪他乡，这也激发了对他们所写歌曲的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了支持球员阿方西尼奥对抗俱乐部的封建控制，吉尔伯托·吉尔写了歌曲《中场》。豪尔赫·本的专辑《乌芭芭拉乌玛》尖锐地指出巴西黑人在塑造这项国民运动中的重要性。直到1989年，奇科·布瓦克对贝利和音乐家作曲、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做了比较——

为了挂在画廊

画家精雕细琢

没有一笔一画

相比射门更美

干脆像一支箭

或是一片枯叶

这一观念在巴西军事统治的20年来一直存在，而巴西足球的其他方面则不会这样。

III

备战1970年世界杯时，钱对于梅迪西政府来说不是问题。军队上尉克劳迪奥·库蒂尼奥成了球队的体能教练，他之后被派往美国宇航局学习美国空间站计划。主教练若昂·萨尔达尼亚的亲共产主义使得他被政府视作眼中钉，他公开批评贝利，还在里约的一家酒店大堂会见一位媒体批评家时带了上膛的手枪，之后被炒了鱿鱼，巴西足协以情绪不稳定为由解除了他的教练职务，随后安排了自己人马里奥·扎加洛上位。

1970年世界杯是第一届彩色直播的世界杯，给予了它的观众一种彩色的魔法。巴西军团的黄衫在墨西哥正午炎炎的白色日光下闪闪发光，这个开球时间是为了配合欧洲电视时间表而定制的。习惯于见到黑白颜色的巴西队的绝大部分观众仍然感到目眩。巴西在本届比赛中踢了6场比赛，打入19球，清晰地记录了冒险而积极的比赛，他们为了保持礼仪只有一场未失球，好让对手有反抗的希望——也使比赛更加精彩。为此他们增加了许多有创造性的巅峰时刻：贝利在中线的射门尝试；他在面对英格兰滴水不漏的防守时，找到了对方唯一的空当并送出完美的短传。决赛中，比赛进行到三分之二时，意大利人以1比1紧咬住巴西，终场前20分钟的精妙配合给巴西队带来了3个进球赢得了胜利。即使是曾发过誓不会支持巴西军团的政府最强硬的左翼反对者的心，也因此融化了。

“批判精神没能挡住我们的第一波攻势，桑巴军团的每一次胜利，都使大城市街道上出现了自发的狂欢节，当巴西第三次成为世界冠军时，整个国家都涌向广场、街道、小巷，为了冠军而狂欢。”⁽⁴⁾

球队直接从墨西哥城飞回了巴西利亚，从机场被市政消防车接至总统府，就像1958年他们在里约的街道上一样。联邦首都平日里空荡的广场、冷清的高架路都挤满了来迎接球队的群众，总统府外，数以万计的人聚集起来，为每一位出现在阳台上或与梅迪西总统站在一起的球员欢呼，之后球员们与内阁共进午餐。这是军政府统治巴西的20多年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开放总统府。

清晰乐观的行进曲《前进，巴西（Pra Frente, Brasil）》是这次比赛的主题曲，歌词想象了9000万巴西人共同前进，国家队和其他所有人和谐无间。现在这首歌被政府采用作为主题曲，在印刷品和电视广告中，这首歌的歌词连同足球比喻和厚脸皮的标语一起被播送，球员和教练们被要求记住自己的台词。1972年，当数以千计的政权反对者被送进监狱和流放时，贝利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接受了体育媒体的采访，据报道，贝利称“巴西没有独裁统治，巴西是自由国度和充满欢乐的土地。我们是自由的人民，我们的领导者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并且用宽容和爱国主义统治我们。”⁽⁵⁾贝利的形象被张贴在大城市的巨大广告牌上，配有文字：“现在没人能阻止巴西这个国家，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

这是第三次拿到世界杯带来的自信，但是军政府的兴高采烈不仅仅来源于此，1968年至1974年的6年间，巴西经济每年不可思议地增长10%。赤贫之人从北方移民至南方使得工资水平下降，工会也被压垮，巴西的将军们越来越多地把巴西称作“伟大的巴西”——一股开疆扩土、走向国际的力量。通过良好的国际信誉评价，巴西政府开始贷款大兴土木，按自己的蓝图创新了民族及其足球文化。

20世纪60年代军政府让足球自我管理，到了70年代对体育的掌控加强了许多。阿维兰热是巴西足协不可动摇的领导者，但当他在1974年成为国际足联主席后，政府很快安插了他们自己的人员。政府政党ARENA（全国革新联盟）在里约州分支的首领、海军上将埃莱诺·努内斯成为了足协新主席。他一边安排弗拉门戈的罗伯托重回国家队，一边组织巴西军团获得1978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每场预选赛都有ARENA的

政客到场，徒有其表的助威集会充斥着挥舞起来的旗子和政治传单。另一方面，圣保罗俱乐部主席隆德·纳特尔联合巴西银行，把他的足球纽带转换成政治资产，成了圣保罗州的ARENA长官。

在控制了政治机构并镇压了颠覆分子之后，军方将最大的力量投入到了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搭建伟大巴西那钢筋混凝土的城市肌肉。在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全国开展了3项大型工程：全长超过2000英里横跨整个大陆的跨亚马逊高速公路；巴拉圭边境的伊泰普大坝，这一工程将成为南美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创造一个原子能源产业。这些庞大项目的背后支持部分来自产业的政策，部分来自政治，其宏伟的规模足以与政府花钱大批量修建的足球场相比。关于这些项目的宏伟美学在1970年的系列电影《托斯陶——金色野兽》中完美展示出来。该片基本是一部传统的甚至粗糙劣质的大前锋的圣徒传，在克鲁塞罗比赛的最后几分钟，却似乎改变了格调。相机缓缓移动过贝洛奥里藏特空荡荡的街道，没有一辆车在行驶，路面上没有一个行人，米尔顿纳西门托的《这是足球的国度》开始播放：“巴西在星期天的下午是空的，对不对？你看，桑巴王国，这里是足球的国度。”然后影片切到了一系列围绕着刚刚建成的米内罗球场的航拍景象，体育场就像一个有着深深斜角的混凝土大碗，通过它巨大的角悬臂和扶壁，体育馆的平顶和墙壁搭建起整个球场。球场的规模真是毫不含糊地大，工业化的野蛮机器造就了这样一个足球舞台，供球员在广袤的绿色草坪上奔驰。体育场旁是一片宽广的停车场，足够停放那些不断从巴西爆炸式增长的汽车行业的新生产线上送出一辆辆大众和奔驰汽车。

全国性大力修建巴西足球场馆的浪潮——“建设伟大巴西足球之翼”，从发展较缓慢的巴西东北部开始，这种政治上的优势给了巴西东北部发展的机会。特拉皮绍球场于1970年在阿拉戈斯的首府马塞约开幕，巨大的马查多球场随后于1972年在纳塔尔开幕；而位于福塔雷萨的卡斯特朗球场比之前的这些球场都要更大一些。甚至是皮奥伊那小小的首府特雷西纳，也拥有了能容纳6万人的阿尔贝陶球场。位于圣路易斯那气势宏伟的若昂·卡斯特罗州长球场，也被称为卡斯特罗球场，是当时巴西最大的球场，其广阔的下沉式混凝土看台可以最多容纳10万人。所有这些体育场馆均采取了米内罗的建筑结构，巨大的圆形钢筋混凝土碗状构造，通过带状的预先制件搭建，这样的形式让整个建筑保持了一种庞大的优雅，虽然在热带条件下，它们会因为潮湿的气候和疏于修理而过快老化。中部高地和亚马逊丛林中也开始修建球场，玛瑙斯的维瓦尔第球场可以容纳5万人，在热带雨林的中心开始施工，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才终于在1970年完成了这样一个球场。1975年，金色塞拉球场和曼圭朗球场分别在戈亚尼亚和贝伦开幕。曼圭朗球场接近亚马逊的河岸，可以容纳7万人，当初帕拉州政府原本打算修建的容量为12万。为了俱乐部的独立与自主性，在累西腓，巴西最小最穷的圣克鲁斯俱乐部也建造了自己的球场——阿鲁达球场。阿鲁达球场从1958年开始修建，一砖一瓦以及场馆的建设几乎都是来自俱乐部的成员和支持者的捐助和支持，积少成多，阿鲁达最终于1970年建成。

在20世纪60年代，长久以来建立的赌球游戏在巴西的各大城市中开始流行，因为这一游戏的非法性且不用向国家交税，巴西军政府决定接管这样的游戏，从而创建了国家体育彩票。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游戏彩票，还被他们赋予了不同的足球主题，结合了地理城市知识的彩票需要竞猜即将到来的赛季和比赛的比分。彩票的另一个目的还在于提高巴西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为贫富差距较大的巴西民众普及巴西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地理知识。1970年国家体育彩票推出的时候，瞬间得到了民众的青睐。在埃迪尔维托·库蒂尼奥的短篇小说《开场表演》中，埃迪尔维托描绘了彩票在人民工作生活中的核心作用：

“上周已经结束的比赛，人们到了这个礼拜周二、周三还在讨论，周四是人们填写彩票的日子，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时候，办公室里每一根神经都在思考着如何填写足球彩票的竞猜比分。而周五和周六是焦虑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到周日早上一觉睡醒就成了百万富翁。”^[6]

国家彩票为民族构建进行了努力，并希望一个赛季能有更多的比赛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收入，激励着政府向足球当局施压，建立一个全面发展的全国性锦标赛。当时绝大多数的足球比赛还是州级级别。从1950年起豪门俱乐部们就开始参加里约-圣保罗锦标赛，从1967年起巴西南部以及西南部的大城市俱乐部——阿雷格里港、贝洛哈里桑塔和库里蒂巴被邀请参加。4年之后，随着国家的空运能力已能满足赛程需求，巴西足球联赛启动，共有20支球队参加，首次包含了来自累西腓和福塔雷萨的俱乐部。这是考验耐力的比赛。联赛之后，排名前八的球队被一分为二参加两个联赛，每个联赛4支队伍，最后，3支队伍将参加最终的决胜比赛。这是对即将到来的新联赛的一种尝试。这一趋势在逐渐扩大后脱离了军政府的控制，被不加抑制的浮夸野心所控制，在足球联赛中被体现出来。到了1973年联赛中共有50支球队，而规则已经变了2次。1975年政府通过了一项全新的体育法案，坚持在任何国家级别的体育运动中，所有州拥有相同的投票权。因此巴西足协内部，拥有一百万人口的马托格罗索州和人数比它多大概20倍的圣保罗州，在选举中是平等的。这为贿选、拉票和政治交易打开了大门，而在国家联赛中的一席之地肯定是很很有市场的。政治对话中的“局势对ARENA不利时，另一支球队就会进入联赛”已经司空见惯。1976年的联赛中有54支球队，每年还有更多球队加入，1979年达到顶峰，有94支队伍。规则和形式都是可以变动的，经常让人捉摸不清。有些年有升降级制度，有些年则没有。一个赛季中，净胜至少2球就能得到额外积分，其他赛季中球票销量算入球队的总积分。在州级联赛和杯赛的赛程已经很繁忙的情况下，巴西联赛无情的扩张充满了日程。20世纪70年代中期，桑托斯从国外之旅归来，上一赛季结束和下一赛季开始中间只隔了不到一个星期。球员的身体和状态压力巨大，可以预见的是足球当局对此毫不理会。

1922年南美足球冠军杯时，巴西独立整整一百年并一直以足球国度而自称。50年后的1972年，若昂·阿维兰热和巴西足联举办独立杯来庆祝巴西建国150周年。独立杯赛名为迷你杯，有20支球队在横跨全国的9个球场中进行竞争，所有的费用支出由巴西政府承担。这是对阿维兰热组织能力和政治资本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力展现，当然这场赛事给了阿维兰热足够的机会去结识全世界各地的足球官员，而这些官员在他之后竞选FIFA主席的时候给予了他必要的选票支持。杯赛的冠军在巴西和葡萄牙之间角逐，曾经的殖民地和母国，150年后再次在球场上相遇，两者均遵循着保守的统治，偶尔被暴力独裁统治。像1922年一样，巴西最终赢得了比赛，但是没有举行像50年前那样的百年庆祝活动。

贝利曾明确表示，他将在1974年退役，所以他将不再参加1974年世界杯。环球电视台组织了全国性的请愿活动希望球王贝利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若昂·阿维兰热恳求贝利，梅迪西总统也写信给贝利，在大家的劝说之下，贝利仍然没有回心转意。贝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次年他在美国球场上出现，成了美国宇宙队的巨星。阿维兰热自己也终于完成了跳槽，1974年世界杯前夕，他对国际足联主席的长期竞选终于在最后时刻战胜了现任FIFA主席，英国人斯坦利劳爵士。他赢得了亚洲和非洲足球协会的选票，因为他的游说激发了亚洲和非洲足球协会对FIFA组织中以欧洲为绝对统治核心的不满情绪，并且对南非种族隔离地区的平息与安抚。阿维兰热就任FIFA主席之后，他便着手彻底革新国际足联，把它从一个微小的业余联合会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组织之一。

军政府接管了巴西军团，对其放任自流。1970年巴西队的体能教练克劳迪奥·库蒂尼奥被任命掌管大权。他把球员们比作轻装甲的步兵，技巧则是他们的武器。他的训练营充满爱国口号并强调军事纪律。他借鉴了军队的体能训练学校的理念，信奉科学足球，认为足球是一种基于绝佳体能和有力团队合作的游戏。他避免召入盘带爱好者和个人主义者，辩称“盘带作为我们的特长，是浪费时间的行为，而且显示出了我们的弱点”。于是桀骜不驯者如保罗·塞萨尔·卡尤退出了国家队。接下来的1978年世界杯巴西队注重防守，丝毫不鼓舞人心，巴西军团在第一轮比赛中发挥糟糕，令人失望，出征阿根廷的巴西球迷在马德普拉

塔焚烧了库蒂尼奥的肖像，当球队被淘汰时（虽然没输一场球），库蒂尼奥返家并被炒了鱿鱼。

IV

曾经被盖泽尔总统警告过不要谈论政治的前锋雷纳尔多在庆祝进球时紧握了拳头。这只是一系列对通过足球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建立的统治秩序的挑战之一。最令人惊讶的，可能也是长期效果最显著的挑战，来自科帕卡巴纳海滩、莱布隆海滩和依帕内玛海滩。早在1975年，就有报道称许多女性（大多是女佣）在她们的休息时间在社区楼房间踢足球。当时这是一种非法行为，因为在1941年巴尔加斯的国家体育局已经禁止女性参加足球、武术和拳击，撑竿跳和三级跳等也被认为是不适合女性参加的运动项目。二十年后同样的争论再次在巴西的教练及体育行政学院等地重现。当地军队体育学校的讲师沃尔特·阿雷诺，在其1962年的文章中写道：“存在身体接触的运动是不适合女性的，比如臭名昭著的女子足球或五人制足球。看着20名妇女（还有2个是守门员）围绕一个球非常不雅和粗鲁地运动是很不正常的。”⁽⁷⁾尽管如此，女子足球队早在1949年就开始存在，两支来自佩勒塔斯的女子足球队，维拉希尔达足球俱乐部和科林蒂安边队，占用了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小场馆，并且开始收取比赛门票钱。但20世纪50年代早期，随着这些俱乐部的关闭，这些曾经是巴西足球人群中的核心要素的人们，几乎完全被边缘化。虽然女球迷可以继续观战比赛，但是贝蒂米兰的回忆似乎更接近常态：“这是一个在男人谈论足球时，女人只能端茶递水的世界。”⁽⁸⁾

这项禁令终于在1979年被撤销，彼时女子足球的发展经历了相当于与20世纪初的男子足球同样程度的狂热，并以极快的速度腾飞。据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超过3000支女子足球队。从1981年里约热内卢第一次夺取了女子足球的州冠军之后，其他11个州之后的几年也依次加入竞赛。然而，巴西足协几乎没有资金可用于支持女足俱乐部。大多数俱乐部让球队的运营变为社会的责任而不是体育机构的分内事。1984年圣保罗的克利斯塔沃和托马齐尼奥不得不取消了比赛，因为这两支球队都只有简单的白衬衫，任何一方都买不起有一点变化的彩带。同样存在着问题的是电视和报刊的舆论倾向，它们大多对女子足球有进行弱化和性感化的趋势。环球电视台热衷于塑造这种现象，从他们的电视明星中创造名人。女子足球的巴西杯，本来是为了从国内选拔女子国家队，却被打造得像一个时尚秀。《体育报》是这样形容的：

“闪亮的红指甲、光泽的唇膏、新潮的发型、黑色短裤和黄色球衣：这是内乌莎·卡瓦雷罗的样子，辫子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珠子，留着史提夫·汪达标准式的发型，更加凸显这位来自桑巴学校“独立年轻人”的姑娘的迷人身姿，希尔达也穿着蓝色和黄色搭配的短裤运动衫。她们不是在桑巴学校中排练节目，她们在足球场上。”

在球场上，许多这一代的女性足球运动员都受到了性别歧视和不公对待。雷达俱乐部的前锋塞妮拉，为很多人道出了心声：“今天我来到球场的时候，听到一个家伙说我应该在水槽边洗衣服。虽然我很生气，但我不会费力气回答他，我的回应会在待会的球场上用脚下的足球来表达。”⁽⁹⁾

在男子比赛中运动员开始带领了反抗的先锋，他们向封建剥削的从业条件和向之前对教练、媒体和俱乐部经理们的屈服行为发起了挑战。最初的挑战来自于小众，但是具有坚韧抵抗性的中产阶级，由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巴西足球运动员开始，20世纪初这样一股浪潮延伸到了博塔福戈的医学生中。1970年世界杯中巴西军团中的英雄托斯陶，是一位雄辩并且偶尔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巴西足球的人。他于1973年提前退役，并成为一名医生。最著名的反政府武装阿方西尼奥和苏格拉底也走了同样的道路。阿方西尼奥之前在博塔福戈踢球，当1970年夏天保守的教练扎加洛不再重用他的时候，他环游欧洲的酒吧并在那观看世界杯比赛。当他留着一头长发、蓄着小胡须回到巴西的时候，他被禁止参加球队训练和比赛。最重要的是俱乐

部扣押了他的比赛许可证，拒绝把他转到别的球队。当这一纠纷闹上法庭的时候，阿方西尼奥的事件轰动了社会，并获得了来自左派的学生、知识分子和音乐家的巨大支持。他的斗争事迹被拍成电影，成了十年中唯一一部具有严肃足球主题的电影，即奥斯瓦尔多·卡尔代拉的《免费的通行证》。这部电影受到了足球管理部门和当局的严厉批评，所以电影只在地下短暂地尝试建立一个播放小组。阿方西尼奥赢得了他的诉讼案件，继续蓄起了他的胡子，宣称它们是“自由的象征”。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时间都在小职业俱乐部效力，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参加波希米亚人的反政府武装——“载满喜悦的火车”。

除了发表对足球劳动关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阿方西尼奥还批评毫无乐趣的军事化风格的足球训练，单纯注重身体素质和纪律性成为流行的足球训练理念。在这一方面他并不孤单，还有米内罗竞技的明星前锋，曾经与盖泽尔总统针锋相对的雷纳尔多，即使盖泽尔总统劝诫他不要谈论政治，他还是继续就政治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其中包括大赦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政治斗争中对抗军政府的政治犯们，并且提倡直接选举。这一鲜明立场为雷纳尔多争取了庞大的社会支持。而当巴西足联以他在巴西国家队的位置来威胁他时，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大学生一片巨大的城墙上写道：“为什么雷纳尔多不能有他的政治意见呢？”⁽¹⁰⁾

叛逆的更衣室和直言不讳的球员比较好处理，但是一个具有规模的大众反对意见就是另一回事了。专政政权对政治组织和公共场所的控制已经比较全面。因此，1976年的“科林蒂安入侵”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巨大的足球派对，却给军政府带来不祥甚至颇具威胁的意味。鉴于巴西大部分城市之间距离较大，且城市间交通状况较差，客场球迷在巴西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当然同城德比除外。1976年科林蒂安在巴西足球甲级联赛的半决赛中与弗卢米嫩塞相遇，科林蒂安队在里约热内卢客场作战，虽然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之间不到200英里路程，但是两地之间的道路条件仍然存在不足。依靠仅有的道路通行能力和私家车的拥有量，科林蒂安球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旅行团向东边的里约热内卢进发。两天之内，大约70000名圣保罗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到达了里约热内卢。当地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地毯式的报道，报道称里约热内卢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挂着圣保罗车号牌的车辆，空气中狂欢的气息已经吞没了整个城市。如此大批量的人群占领了里约热内卢的公共空间，这也许是最壮观的一次。马拉卡纳球场上飘扬的成千上万的旗帜成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最终在瓢泼大雨中，近乎发狂的球迷见证了科林蒂安队以一粒被水包裹的点球而赢得比赛。同年晚些时候，新的学生运动开始慢慢出现，第一次试探性的抗议活动也拉开序幕。

虽然学生运动持续不断地刺激着军政府，但是对权威最有力的挑战来自圣保罗郊区ABC工业中的新独立工会运动。足球场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也让反抗力量有了一个可以聚集的地方，让有组织的反抗队伍得到大众的了解和认可。此时的足球场已经不是用来追求冠军的地方，而是被用来挑战政府和行业专制结构的。1979年的罢工浪潮从萨博工厂开始，工会试图让它蔓延到该地区的其他汽车工厂，想用萨博工厂来储存工会成员家庭的钱和食物。虽然没有政府的任命，但独立工会在左派的后起之秀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席尔瓦（或被称为卢拉）的代领之下，在圣贝尔纳多的维拉欧几里得体育场，召集了超过50000人参加集会。虽然没有功率放大系统，但是卢拉通过扬声器的传播，向全体参加者表达了团结一致对抗军政府的讯息。之后，这次罢工蔓延到了每一个汽车制造厂，当工会被军政府用胡椒喷雾和警棍驱逐的时候，他们将维拉欧几里得体育场作为堡垒。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球场成为了辩论室以及广大民众意见的展示地点。

这波足球抗议的最后一个事件就是80年代初被称为“科林斯民主运动”的兴起。这一运动结合了两股力量。一方面是科林斯队更衣室中的民主运动思潮，一群职业足球运动员——苏格拉底、卡萨格兰德、弗拉基米尔和儒尼尼奥，他们试图挑战足球比赛和训练制度的威权统治。另一方面是俱乐部董事会选举权的争取。这通常只是一个俱乐部内部的内讦性事件，但这一事件在当时却具有了更深远的政治意义。面对那块

捍卫独裁统治的被称作“秩序和真理”的“石板”，“科林斯民主”开始发起了攻击。体育杂志《进球》总结了一场在电视和报纸上的竞选活动，虽然成本超过50万美元，但是这一个选择旨在“要么选择自由化，要么选择高压手段；要么选择效率，要么选择层层监管；要么选择新时代，要么选择旧方法”。球员团结一致支持民主，苏格拉底表示，如果旧时代的卫道士胜利，那么他将选择离开俱乐部。

“科林斯民主”最终赢得了这场斗争，之后几年这个国家最具创新性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实验即将在该俱乐部中发生。教练的权威萎缩，相应球员对于组织比赛和训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们还放宽了对球员饮酒与吸烟的限制。当时的苏格拉底说道：“作为足球运动员的‘我’不断抗争，是为了自由和对个体的尊重，为了平等的人权，为了充盈的毫无条条框框的讨论，为了这项运动冲破不可预见的限制实现民主化，而这一切的坚持都深深地源于这项运动开拓、欢乐和令人愉悦的本质。”短期内，这一做法带给了球队活力，球迷们也非常兴奋。体育场中打出的横幅这样写着：“无论输赢，总有民主。”

V

面对1964年巴西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及极其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军政府称其在当时接管国家政权存在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巴西经济状况的恶化有一部分是巴西政治本身的严重两极化及缺乏国家统一规划和纪律限制导致的。但到了1980年，通胀率回到110%，而在1985年，军政府即将卸任之前，通胀率已经达到了235%，并仍然在不断上涨。国际借贷的大潮和20世纪70年代国内的大量消费，当时可以忽略不计的贷款利率，到1980年初时随着利率和通货膨胀的飙升已成为巴西政府不可承受之重。巴西被迫拖欠债务到1982年，并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巴西难以忍受的调整方案。

在菲格雷多总统的任期内，军政府开始有序地从政治权力中心渐渐退出，除了大赦政治犯和流亡者之外，他们在1982年开放了选举。最终在1985年，军政府允许国会间接选举出一位平民总统，从而彻底将手中的烂摊子交给了继任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奇迹从此真正完结，这一繁荣果实很明显没有均匀分配到人民手中。1960年至1980年之间，巴西国内最富有的10%的家庭得到的全民收入从40%上升到了二分之一以上，而最贫穷的50%的国民只拿到了全民收入不到五分之一的份额。⁽¹¹⁾随着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的不断萎缩，穷人手的那一点点现金又慢慢被通货膨胀蚕食，这样的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在巴西东北部，超过40%的人口仍然在为温饱担忧。即使在大城市中，也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无法填饱肚子。从1980年起，犯罪率上升，抢劫和凶杀案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于是也就造成了席卷整个巴西的安保升级，每间公寓、办公大楼都开始安装防盗栏杆，保护大门安全，增加警卫。

巴西国内的足球俱乐部也在经济危机中艰难度日，俱乐部通常需要通过拖欠工资来支撑，当拖欠的工资被不断上升的通胀率稀释之后，再付给球员被贬值的工资。1977年，球场开始悬挂广告，1983年球衣赞助开始。虽然大型比赛仍然可以吸引接近20万人观战，但是平均上座率开始长时间持续下滑。债务持续堆积之下，俱乐部虽然苦苦支撑了30年，但是仍然不得不将巴西足球的直播权卖给了里德环球公司。

在球场上，比赛的性质也在发生着变化。由济科和伟大的弗拉门戈俱乐部代表的巴西艺术足球仍然深入人心。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不仅赢得了南美解放者杯，而且毫不费力地在洲际杯赛中征服了欧洲冠军利物浦队，但是另一方面，看重结果和足球实力的教义也开始盛行，来自巴西四位军政府总统的家乡，也就是南里奥格兰德州阿雷格里港的格雷米奥队和国际队，开始按照纪律严明、打法严谨的欧式足球风格来发展，并5次夺得国内冠军头衔。⁽¹²⁾

1982年世界杯中的巴西队是一个继承了巴西足球艺术和浪漫的传统球队，在济科、法尔考和苏格拉底这些球星的带领之下，巴西队具备必要的技能和夺冠实力。在小组赛中，巴西队上演了令人难忘的表现，他们对战前苏联、苏格兰和新西兰共攻入10球。第二轮比赛标志了阿根廷人的屈辱，巴西军团横扫了一个萎靡不振的阿根廷队。接下来的发展取决于他们与意大利的对决，就像1950年世界杯决赛一样，巴西人只需打平即可获胜，后来这场比赛成了世界杯最出色的比赛之一：开放、激动人心并且充满悬念。但巴西最终以2比3输给了意大利队。连卡洛斯德鲁蒙德也放下写诗词的笔，在他的最后一本世界杯讲评中，向他的读者呼吁，球迷们应该擦干自己的眼泪，挽起袖子，投入到严肃的政治变革运动中去。

1984年，“直接选举运动”聚集了所有反对力量，呼吁应在1985年进行大众直接选举而不是通过国会间接选举总统。100万人在里约热内卢示威游行，150万人在圣保罗市中心旁听。苏格拉底代表游行群众呼吁国会进行必要的宪法修改。苏格拉底虽然已经决定要去意大利，但是他表示如果游行失败，法案没有通

过，他将留下来。后来游行的申诉没有成功，苏格拉底陆续回到了佛罗伦萨和他的俱乐部科林蒂安，将他们的保利斯塔冠军让给了桑托斯队。他们已经掀起了巴西足球民主起义的最高潮。军政府从此迎来改革的序曲。

1985年，全国民主选举出一个新的国会，并投票选出了巴西军政府后第一个平民总统坦克雷多·内维斯。但因为内维斯在就职前猝死，副总统若泽·萨尔内只能肩负起总统一职。面对全国范围来势汹汹的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犯罪率和无法偿还的债款，民主政府面对的共和巴西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巴西终于以民主国家的身份参加了世界杯，但无论是球队，还是民主政府都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赢家。1982年巴西队的核心球员参加了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虽然表现得并不那么出众，但是巴西队还是稳步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巴西队与法国队相遇，第70分钟双方比分是1比1，济科踢出的点球被对方门将轻松扑救，最终比赛进入点球决胜阶段。苏格拉底和朱利奥·塞萨尔将点球罚失，最终以4比5被法国淘汰。巴西队可以说是大意且不幸的，当然他们的实力也还没有达到能够夺冠的水准。巴西足球官方以不听劝告的规则来应对，国内锦标赛的所有比赛面对平局均依靠点球决胜。一些俱乐部很快拒绝了这样的规则，但是最终又被强迫服从这一规定。

特里·塞萨尔是1986年世界杯时身处巴西的一个美国人，他对当时巴西国家和民族情绪的变化有着敏锐的观察。整个巴西几乎在世界杯期间关门停业，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因为与球赛时间冲突而不得不取消表演。大学和中学停课，企业给员工放假，公交车也停在街角。在三个星期的比赛期间里，“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划上了一个间隔符，所有细节都不断展示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对这项令人着迷的运动的热爱，这样的停滞状态只有战争中的国家才能与之相比。”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届世界杯的意义远不止为球赛本身振臂高呼那么简单，巴西人民不再担心在为球队欢呼的同时也在为独裁的军政府欢呼了。尽管电视转播是报道世界杯的核心，但是塞萨尔认为它仍然是一场自发的流行节日，而不是一个围绕电视的壮景。

“即使最穷的人民也用绿色和黄色的报纸条装饰，富裕的人则用绿色和黄色的飘带缠绕成类似热带森林中的藤蔓来装饰街道，司机在汽车天线上绑上绿色和黄色的塑料条，生意人在店外的窗户边挂上巴西国旗，小孩子用粉笔在路上写着球员的名字。”

在三个星期的过程中，塞萨尔报道了巴西国内的变化，几乎可以观察到每一种情感：巴西队赢球时眼花缭乱的狂欢和庆祝，巴西队输球时阴沉的失望。但更复杂的情绪是当时巴西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大家明白这样一个巴西队不配夺冠，于是经济和足球两方面合二为一，激发了民众普遍的怀旧情绪，大家怀念1970年，怀念那时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巴西队夺冠的风采。这样的怀旧情绪在三年以前就首次浮现。在1983年1月，加林查因为酗酒又一次被送进了博塔福戈的疗养院，他之前已经在这家疗养院进行了几次戒酒康复治疗，而这一次他没有再醒过来，在酒精昏迷中离世。在几个小时内数百人聚集在医院，已经十年没有报道过加林查的媒体开始发表一系列的纪念文章。载着加林查遗体的消防车再次经过1958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游行时的街道，缓缓驶向马拉卡纳。他的遗体安放在由博塔福戈支付的一具豪华棺材中并停留了三天。1月21日，同样的消防车载着他的遗体，缓缓来到他的家乡保格兰杰。里约热内卢的工薪阶层走上街头悼念他，遗体经过的街道两旁，人群挤满了人行道和过街天桥，数千人直奔保格兰杰，许多人被迫在城外放弃他们的汽车而选择步行。当加林查的灵柩抵达教堂做了仓促的祈祷和祝福之后，教堂周围已经被送葬者包围，一些人站在树上，一些人爬到屋顶上。埋葬的时候发现棺材过大，之前挖的坑不符合棺材的尺寸，以至于埋葬后棺材上只覆盖了很薄的一层土。埋葬加林查的棺木之后，博塔福戈球迷带领群众唱了国歌。人群最终离去，留下一个半毁的墓地。

塞尔吉奥·雷特·洛佩斯认为，“加林查的死标志着某一种生活的消逝”，那种生活充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政治的自由以及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繁荣，那是巴西足球的黄金时代，喜悦并充满着创新。在1983年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下，加林查的去世更加让人们体会到了时代的不同和如今光景的惨淡。20世纪70年代末，巴西足联保管的雷米特奖杯丢失。这座奖杯之后再也没有找回来。在那个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奖杯很可能是被拿去熔化了换钱。黄金也许可以保值，但一个黄金时代却已经结束了。

(1) 报道源自《巴西报》，1970年6月22日，利弗翻译并引用，《足球狂热：巴西对世界最流行的运动满怀激情》，伊利诺斯州普罗斯佩克特海茨：韦夫兰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2) 《巴西报》，1973年6月19日，利弗翻译并引用，1995年，第64页

(3) 二者之间的对话可能是虚构的，二十多年后当时在场的人将此事曝光，也被巴西媒体广泛报道，例子详见：<http://www.jornaldapaulista.com.br/site/page.php?key=3985>

(4) B·米兰，《巴西：足球之国》，里约热内卢：最佳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5) 引自R·莱文，“体育与社会：巴西足球案例”，《葡萄牙巴西人评论》17（2），1980年

(6) E·库蒂尼奥，《再见，足球》（Bye-Bye, Soccer），威尔逊卢里亚译，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霍斯特出版社，1994年，第6页

(7) 沃尔特·阿雷诺，“女性运动：医学领域”，《体育教育》62、63期，1942年，第57页，被G·凯尼基凯尼克所引用，“从摇篮到雅典：银色外衣下巴西足球战士的故事”《体育传统》28（1），2011年，第63–83页

(8) B·米兰，《巴西：足球之国》，里约热内卢：最佳出版社，1989年

(9) S·沃特和L·穆劳引用，“巴西女足：进步与问题”，《足球与社会》4（2–3），2003年，第254–267页

(10) E·库托引用，“左派反击：巴西足球中的反叛与抗争（1970-1978）”，《体育历史杂志》3（1），2010年

(11) 详见T·斯基德莫尔，《巴西：五个世纪的变化》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188页

(12) T·凯撒，“一网打尽：1986年巴西世界杯”，《马萨诸塞州时评》29（2），1988年夏，第77–86页

第六章 艺术和梦想的幻灭：实用主义、政治与足球的关系（**1986-2002**）

我总是说，上帝赠予了这里最好的球员，但同时却要用最差的管理者来抵消掉他的慷慨。

——茹卡·克福里

足球里的艺术和梦想已经结束了。

——卡洛斯·阿尔贝托·帕雷拉

巴西仍然保留着这样的观念“为达目的，偷也无妨（*rouba, mas faz*）”。在足球领域，这样的观念却可以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在胜利光环的庇护下，其他的都可以被遗忘。

——茹卡·克福里

I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在巴西各地，对于艺术足球和梦想的追逐似乎都要泯灭殆尽。巴西对于“胜利光环”的长期追逐培育不出乌托邦幻想者着眼灌溉未来的沃土，在这近15年的时间里巴西结束了军政府独裁的控管，开始修复独裁政权时期留下的创伤，但即便是一点进步也要付出很多努力。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控制，但巴西已经承受了近20年的经济缓慢增长，而全民普遍贫穷、贫富两极分化、高犯罪率均是要对付的棘手问题。在政治领域，巴西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军事统治似乎已被削除，但新政权在诸多领域都伴随着政府的功能失调。政党分权式的体系让集体决策变得阻力重重，新的运作方式为贿选和旧式的选举舞弊敞开了门户。

识时务者应运而生，只有他们才能走向发迹之路。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被人们昵称为“FHC”，是一名从圣保罗走出的社会学家，研习过拉美并不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位中间派的领导人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插手了巴西经济，通过了新的货币政策。而卢拉是从担当新兴的劳工党主席后有声誉的，卢拉希望巴西与IMF分道扬镳，让基础工业国有化和推进经济的结构变化。他前3次参加总统选举但均告失败，2002年当他第4次尝试时他取得大捷，成功当选。

1994年，卡洛斯·阿尔贝托·佩雷拉统帅的球队帮助巴西时隔24年后再次获世界杯的冠军，足球王国在美国土地上踢的既不是力量足球（Futebol Força）也不是艺术足球（Futebol Arte）。正如佩雷拉所言：“我们将迎合现代足球的需求。足球里的艺术气质和对理想的追求已经结束了。我们得将简洁和高效融进技术里。”^[1]过程虽不够赏心悦目但它确实有了成效：巴西夺冠了。务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可以被推崇出来，他们甚至能赢下一座大力神杯，但这些胜利是有代价的。无论是政治还是足球，政策和技战术的制定都只看重最终的结果——为达目的，偷也无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足球管理层的腐败与无能遭到揭发后并未受到相应的处罚。足球商业化带来的财政收入流入了少数人的钱囊中。更糟的是，球迷文化开始危险地游离于自发性的普通球迷和足球流氓之间。而球迷性质整体更倾斜于向后者转变，因为足球暴力已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这无疑便是——不追求梦想，却空有激情的足球。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个孕育了美丽足球和一片繁荣景象的地方已经迷上了功利足球？

1990年开始，足球世界的大赛周期与巴西政选的周期越来越接近。从1994年开始，每隔4年的7月意味着世界杯足球赛的举行，10月则是巴西的总统选举和州选举。上一次没有被淹没在大赛聚光灯下而早于世界杯进行的总统选举是在1989年。这是一场卢拉和迄今为止地域名气很小的（东北部的阿拉戈斯州）候选人——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之间的较量。秉着民粹主义的科洛尔在年轻时就曾浅尝过足球，他曾担任过阿拉戈斯州最重要的球队阿拉戈斯中央竞技队（Centro Sportivo Alagoano）的名誉主席，等他到了国家领导层面时却对足球关注得不多。在电视上，足球逐渐被电视剧全面超越，欲望、贪婪、亲子鉴定、铺张浪费……这片立于亚热带雨林的国度沉浸在这些悲剧里不能自拔。科洛尔没有让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足球上，他展现在荧幕上的是大男子主义式的、酋长式的、打扮得干净利落的花花公子形象。虽然当时卢拉在竞选的得票数上仍处于领先，但科洛尔恰好是在工人阶层和精英舆论开始担心卢拉的时候出现了。作为劳工党右翼最有力的总统竞选者，科洛尔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和无限量的电视演讲时间。他以英雄、救世主语调，承诺肃清腐败、解放市场，重组并减少政府开支，建设新巴西。同时科洛尔还拥有上镜、英俊、口才出色等优点，这些卢拉都没有。卢拉在陈述人们都很敬重的主流文化时，他那支离破碎的葡语语法、粗犷的口音和根深蒂固的工人阶层本色都让他与国家元首的形象格格不入。再借助巴西环球电视台后期制

作的疑点重重的电视辩论视频，科洛尔最终驶入了总统府。

1990年巴西队参加了世界杯，这支球队不再是以无敌舰队的身份出现，而是出现了很大的倒退。平庸的塞巴斯蒂奥·拉扎罗尼是球队主帅，他沉迷于近乎军事化的体能储备练习和锻炼肌肉的训练。他还严格地为球队植入了欧洲足球的清道夫体系，实际上他自己深信这套体系就是解决巴西足球弊病的出路，为证明此理论他还写过一篇博士论文。在意大利的赛场上，一切进展得并不愉快，军事化时代的严明纪律并不适用于那些新近的已经有过在欧洲球队效力经验的球员。当时的巴西媒体在意的是那些队内的矛盾和在场外球员酗酒无人买单的花边新闻，球场上的巴西则毫无生气、平庸无比。他们踢了4场比赛，打进4球，然后便打道回府，是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了却了他们这一次的痛苦之行。

科洛尔本可以做得更好。很快他的总统任期便到了风雨飘摇的时候，价格稳定计划成了一纸空文。由于国会的不合作和陷入瘫痪，科洛尔受到了国会法令的很大制约。1992年，关于科洛尔受贿的流言被证明为事实。科洛尔与大富商保罗·塞萨尔·法里亚斯的勾当成了每日新闻和国会调查的目标。尽管科洛尔否认了一切指控，但他的亲弟弟在电视上揭露了他的罪行。国会证实科洛尔接受了法里亚斯总计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基金。就在国会手握确凿的证据投票弹劾科洛尔之时，巴西国家队在巴黎以2比0击败了友谊赛对手法国队。《体育新闻报（Gazeta Esportiva）》报道称：“投票结果以16比5支持弹劾，人们庆祝这一结果的喜悦之情就像庆祝拉易和路易斯·恩里克的进球一样。在挽救自己的最后时刻，科洛尔呼吁民众将自己装点成黄色和绿色，来到街道上支持他。可数百万的国民穿上了黑色衣服上街示威，要求科洛尔离开。于是科洛尔及时引退以避免被国会弹劾。”⁽²⁾

随后出现在元首位置上的是副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佛朗哥是一位既没有激情也不擅长结盟的政客。佛朗哥守旧、害羞，似乎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自己的使命，本质上他是把实权移交给了费尔南多·卡多佐，最初卡多佐是担任佛朗哥的外交部部长，随后又成了他的财政部长。之后的18个月内，一边在进行世界杯赛，另一边，卡多佐和他的技术团队研究出并贯彻实施了雷亚尔计划（Plano Real）。这是一项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奋斗目标的经济计划，1994年，新的货币单位“雷亚尔”替代了短命的“克鲁塞罗雷亚尔”（仅在1993年通用）。新政策改变了巴西人的消费习惯和通货膨胀的状况。

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届世界杯被如此详尽地报道过。电视在巴西的覆盖率已到了饱和的程度，相比拥有一台冰箱，即使是再贫穷的家庭也更想拥有一台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广泛普及。除了参加比赛的24名球员外，巴西还派驻了近440名前线记者以及数百名没有通行证的报道者。每场巴西队的比赛，环球电视台会有配备10架摄像机的工作团队跟进报道。电视收视率的统计显示约三分之二的巴西民众收看了巴西队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到了决赛，巴西几乎全民都观看了这场比赛。开踢前，巴西队遭受了人们的质疑，即使在他们赢球的时候，球员仍被指责没有生气、太过乏味和缺乏冒险精神。事实上这支球队既不光彩照人也不激进冒险，他们组织有序，攻守平衡。四分之一决赛中，巴西小胜荷兰淘汰对手，布兰科的一个任意球分出了胜负。紧接着他们在恶劣的气候下战胜了10人应战的瑞典队。而决赛与意大利的比赛被宣传成了1970年那场经典战役的重赛，它被视为是再续“美丽的比赛”的良机。但结果两场比赛场面大相径庭，这次双方都无力打破僵局，120分钟互交白卷后巴西赢得了点球大战。互射点球见证了一个人的悲剧结局。罗伯特·巴乔将球踢向了天空，他绝望地垂下头的画面好像意大利队“沮丧”的完美写照。但这并不能让足球王国虚无缥缈地复兴起来。

据海关的统计，回到家乡累西腓的巴西队一共带回了12吨的商品。因为巴西货币的崩溃，这致使即便是国际球员购置大型家用电器也极其昂贵。海关警员坚称球员花钱支付了相关的赃物，但球队予以了否

认。随后电视台对里卡多·特谢拉（巴西足协主席）和财政部长以及税务当局的争辩进行了5小时的现场直播。最终巴西足球同意支付罚单，随即他们便扣除了部分球员的奖金。表面上看，夺冠游行可以被解读成一次现代版本的国庆盛典。一个很具代表性的评论专栏这样写道：“胜利开启了巴西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它意味着民族自尊心的回归。”总统弗朗哥盼望道：“球员赢得的尊严应当被转移到巴西国家本身。”⁽³⁾在首都巴西利亚，人们欢欣鼓舞：

“从总统府二楼的阳台看下去，球队成员看到的是一片黄绿色的城墙。球迷们挥舞着黄色和绿色的旗帜，到处都是黄色和绿色的帽子和T恤，以及染成黄色和绿色的狗狗与汽车——甚至彩绘成黄色和绿色的人。”⁽⁴⁾

不在巡游庆典路线里的城市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圣保罗，超过20万人来到圣保罗人大道的夜空下观看了焰火表演。在贝洛奥里藏特，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城市的主广场组成了一支巨大的桑巴舞团尽情舞蹈。在里约，从机场到里约北区，再到市中心，这一路上聚集了约50万人在欢迎游行队伍。驶向里约南区的一路上，游行队伍还先后穿过了相对富裕的弗拉门戈海滩地区、科帕卡瓦纳和伊帕内玛，最后抵达巴西里约最富裕的地方——列布隆。

随后一届总统竞选，罗马里奥支持卢拉，邓加则站在了卡多佐一边。卢拉认为巴西已经不同了：“人们知道如何把足球与政治区分开来。当庆典落幕，人们知道幻想和现实的区别。”⁽⁵⁾或许是这样的。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均担心卢拉的经济计划，卢拉早期在票选上的领先优势被削减不少。而雷亚尔计划却开始奏效，巴西的年通货膨胀率从1000%降低至了10%，如此剧变近乎是一个奇迹。而卡多佐正是雷亚尔计划的设计师，他也是卢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卡多佐因此轻松获得连任。在之后的4年间，他的政府仍继续严格执行着反通货膨胀政策，这要求紧缩社会计划开支和严厉整顿高利润企业的税收。与此同时他又开始将科洛尔承诺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付诸实践，包括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市场的干预并将市场对国际贸易敞开。巴西足球运动员的“出口”是“自由主义计划”最显著的地方。参加1986年世界杯的24名巴西国家队球员中只有2人在欧洲踢球，200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到了2010年巴西俱乐部本土球员只占3人。20世纪80年代，留洋的球员屈指可数，到2002年时，仅在葡萄牙联赛效力的巴西球员就超过了100人。

相比1994年，参加1998世界杯的巴西队大名单中有着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天赋型球员，这印证了这个国家仍能源源不断地产出高水平的球员。在保留邓加、贝贝托、莱昂纳多等老兵的同时，球队里添入了新一代的球员里瓦尔多、卡洛斯以及“传奇球星”罗纳尔多，他们均处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并都在欧洲领先的俱乐部里踢球。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巴西承诺要踢出较1994年“实用足球”更开放的足球。

如果说在过去，巴西的政客、作家和诗人是为巴西国家队表现宣传呐喊的主要声音，那么这一角色现在则由耐克公司包办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是耐克公司首次作为巴西队的赞助商和供应商的一届赛事，耐克最大化地利用了自己的投资。耐克与桑巴军团拍摄的广告在全球的电视传媒上播出：在飞机场候机是很无聊的，但足球让等候的巴西球员重焕生机，耐克用豪尔赫·本（Jorge Ben）的歌曲《最重要的事（Mas Que Nada）》变奏版做背景乐拍摄了一支广告片：甜美、热情洋溢的音乐诠释了巴西足球的强盛，而所有的巴西队球员身穿同款球衣在全球各地均可以买到。

卡多佐几乎无法与这样的“形象塑造”做抗衡，所以他明智地选择了避开这届赛事。揭幕战后，他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参赛国晚宴，但一直低调行事。与之相反，劳工党认为足球是总统竞选中可以利用的很好的政治工具。在宣传片中，当卢拉演讲时，背景是巴西队与一支身穿灰色队服的球队比赛的画面，旁白说

道：“巴西队集中注意力盯防‘通货膨胀’，但却忽略了对其他人的防守。啊，‘失业问题’和‘暴力问题’将球带向了危险区域……注意防守！球进了！巴西队失球啦！”⁽⁶⁾在真实的比赛中，尽管小组赛阶段巴西负于挪威，而半决赛通过点球大战才战胜荷兰队，但巴西众望所归地进入了当届赛事的决赛。决赛以0比3输给了东道主法国队算不上很大的意外，倒是巴西队输球的原因很关键。巴西队不擅长防守，但本场是防守很糟糕，进攻端也没有威胁。后来关于那一天的传闻普遍相信罗纳尔多在训练时已经受伤了，他先是被从球队名单中剔除，但在开赛前他又重新出现在了巴西队的首发阵容中。出场后罗纳尔多毫无亮点，他的动作衔接不上意识，在恍惚中罗纳尔多度过了这场比赛。

巴西队输了，但卡多佐赢了，正验证了劳工党的“预测”，卡多佐未来4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盯防“通货膨胀”，但却给“失业问题”、“暴力问题”留下了很多的可乘之机。媒体和政客在这场足球决赛失利后仍保持着反常的关注度。罗纳尔多当时的身体状况以及他被剔除又重新上场的整个过程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巴西国家队队医受到了医疗部门的反复盘问，耐克和巴西足协也受到了调查。共产党议员阿尔多·雷贝罗还被请去参加国会听证会。这些调查全都不了了之，直至2000年，税务当局决定调查国家队主教练万德雷·卢森博格以及雷娜塔·阿尔维斯的财政状况，而雷娜塔称自己曾是卢森博格的情妇。雷娜塔被查出她名下很多可疑的账目都是出自卢森博格帐下，在轮番盘问下她最终揭发了卢森博格的恶性，这些账目是卢森博格在球员交易中获取利润后需要藏匿他处的金钱。就在媒体对于追加的细节垂涎欲滴时，卢森博格手里的巴西队在悉尼奥运会中被9人应战的喀麦隆击败。回国后等待他的是腥风血雨。

丑闻的影响力到达巅峰之时给巴西的政客也带去了足够多的压力，雷贝罗对巴西足协和耐克的质询也正式被提出。巴西参议院甚至组成委员会调查所有涉及有疑点的巴西队的比赛。委员会的调查时间长达1年多，直到2001年末才递交了最终的报告。雷贝罗的委员会没能证明耐克和1998年世界杯决赛的糟糕表现之间有任何关系，但在调查过程中的确发现了很多官员腐败、裙带关系和无能的确凿证据。倒霉的米纳斯吉拉斯州足协主席埃尔梅·费雷拉被查出在足协雇用了27名自己的亲属。里卡多·特谢拉被指控曾为自己和巴西足协谋私利以中饱私囊，随后特谢拉请病假暂时离职。参议院的刑事检控调查一共传控了17位重要的人物。雷贝罗调查的刑事程序是从对33名足球和俱乐部的管理者进行起诉开始的。但自从这些诉讼案件被报道后，没有一起诈骗、腐败和侵吞公款的指控最终进入法庭审理。因为司法部门的羸弱，司法程序复杂得堪比拜占庭时期以及巴西队的出色战绩，巴西足球的编制再一次得以被拯救。

替代卢森博格担任巴西国家队主帅的路易斯·斯科拉里，绰号为“菲利普”、“大菲尔”，通过球员相互协作一起紧逼对手，斯科拉里首创了一种极具压迫性的技战术打法，在此之前他执教格雷米奥夺得过巴甲联赛和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并执教帕尔梅拉斯获得了南美解放者杯这样的国际锦标。斯科拉里最珍贵的财富是“脸皮厚”，对他来说这很必要，因为批判声疾风骤雨般地向他袭来。起初，他的巴西队在2001年的美洲杯中被洪都拉斯淘汰，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又接连平局、败仗，令巴西队自世界杯1930年举办以来首次面临可能无法进入世界杯正赛的窘境。没有评论习惯的卡多佐在公众面前发表言论道：“如果无法进入世界杯正赛，这将比遭遇阿根廷债权违约和经济危机更糟糕。”最后，巴西队在惊魂之后幸存了下来，在巴西东南部（圣保罗）举行的预选赛最后一轮中巴西3比0战胜委内瑞拉有惊无险地进入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正赛。一到达那里，巴西又变成了那支无坚不摧的超级强队。对阵鱼腩部队哥斯达黎加队和中国队时，巴西队占据了统治性的优势；在少一人的情况下依然战胜英格兰；巴西队还两次击败当届赛事发挥出色的土耳其队。罗纳尔多不想错失救赎的机会，当届赛事他状态非凡。决赛在东京举行，他在开赛12分钟内就两破德国队的城池。最后巴西队第5次问鼎世界杯冠军。

卡多佐欢迎巴西队回家时致辞道：“整个世界都看到了巴西人民的勇气。他们看到我们可以组织有序并

赢得最终的胜利……他们看到我们的经济也会发生相同的改观。我们会处理好内政并最终走向胜利。”⁽²⁾但他的改革热情很快便耗尽了，因为几个月后他就离开了他长期执政的办公室。巴西将第5座世界杯冠军带回家后，之前所有的调查都因此而止，巴西足协和编制内的足协人员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就像作家茹卡·克福里说的那样——为达目的，偷也无妨。特谢拉的厚颜分毫没有被削弱，他集结冠军之师在福塔雷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盛典，并借此来推荐他最青睐的总统候选人奇罗·戈麦斯。然而卢拉再次一语成谶：“现在人们已经明白美妙的竞技体育和残酷的现实有着天壤之别。”10月份的票选结果显示戈麦斯的票数只有卢拉的三分之一，卢拉终于被推选为巴西总统。

II

“我总是说，上帝赠予了这里最好的球员，但同时却要用最差的管理者来抵消掉他的慷慨。”这是茹卡·克福里对于巴西足球的评价，调查巴西足球的参议院议员阿尔瓦罗·迪亚斯也同意他的说法。迪亚斯在递交给委员会的1600页的长篇报告里写道：“巴西足协真是个犯罪的巢穴，里面充斥着混乱、无序和欺诈。”⁽⁸⁾这是对特谢拉担任巴西足协主席头10年间恰如其分的描述，也是对未来10年足协走势的准确预测。武装力量都无法再治理好巴西足球管理层，因为它已腐烂透顶、病入肌理。

里卡多·特谢拉出生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个银行世家，在里约长大，对于法律、财经和排球运动都有过一点涉猎。

后来他拥有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迎娶了巴西足协主席若奥·阿维兰热的女儿卢西娅·阿维兰热为妻。若奥·阿维兰热彼时还担任FIFA主席。在阿维兰热的监督之下，特谢拉将足球作为了一生的事业。

1989年，他受派到巴西足协担任主席。在漫长的任职期间，他开始将这个机构，事实上是将巴西国家队本身，视为他的私人财产，以及他在公开场合那不可磨灭的自我化身。正如他在讨论巴西足协的经济状况时所说的：“我在银行里存了7500万美元。”在回顾德国世界杯抽签时他还说过：“我确实很想参加2006年世界杯的揭幕战。”⁽⁹⁾

为了和卡多佐时期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保持一致的步调，特谢拉让巴西足协从公共领域中脱离出来。他决定不再接受政府拨款或从彩票中获得资金，这一决议让巴西足协免除了任何外部审查及社会义务，能够自由地接受更有吸引力的商业机会。1996年，他任期内的巴西足协与耐克签下了10年的球衣赞助合约。合约细节保密，据说10年的赞助费高达3亿，尽管据随后国会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耐克公司对巴西国家队的友谊赛的地点和时间握有很大的决定权。

有了这笔巨款后，巴西足协无须受国内足球的限制，其经费开始迅速增长。在1997年到2000年间的收益翻了两番，董事们的收入也增长了300%，花在酒店的开销增长了5倍多，但用于足球方面的财政预算比例却有所下降。而在足球宣传方面的开销众所周知仍保持不变。巴西足协带着5名里约高等法院法官公费前往美国观看1994年世界杯，在当时有40宗针对巴西足协的案件发生，而每位法官都至少处理着其中1宗。在巴西，足协一直维持着一处不起眼的会所，为人脉关系内的政客提供资金和帮助，必要之时足协会将他们召集。但仍然会有一些零散资金留给巴西足协，用以购买特谢拉自家农场里的奶产品及以高利息为代价去包下他开的连锁夜总会。

巴西足协至少能赚到钱。巴西足球俱乐部却跌跌撞撞地度过了20世纪90年代，因为一直在亏损。除了能从前往欧洲和亚洲的球员的转会中获得一大笔资金外，俱乐部成了臭名昭著的债务方：拖欠球员工资，未能按时缴纳税款，拖欠所有人的欠款。

亏损的部分原因来自俱乐部管理层的无能和内讧。2001年弗拉门戈达到了一个境界，在一年中解雇了6名教练，当时在他们的账面上需要负担7位主帅的合同。一个内讧的董事会还不够，几年前俱乐部还成立了两个水火不容的董事会。

俱乐部之间这种可悲的情况也是足球与电视转播机构之间难以调和的关系所导致的结果。1987年，巴

西环球电视台对足球电视转播采取了独家垄断，并一直维持这种状态。这虽能确保俱乐部得到稳定的资金来源，但缺少正经的竞争对手也意味着欧洲俱乐部所享有的诸多权利在巴西足坛将无法实现。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巴西足球俱乐部对环球电视台关于足球赛程的安排言听计从。

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电视剧是真正的收视冠军以及最有价值的广告收益来源。为了确保这些节目在黄金档播出，环球电视台经常会更改足球比赛时间，开球太晚或太早使得球迷不得不在不方便的时间前往球场观赛，并且比赛时间的变更通常要等到最后一刻才会公布。1999年的巴西足球甲级联赛，科林蒂安和米内罗竞技交手，这两支排名积分榜最前面的球队碰面，相当于该赛季联赛的决赛，此役被巴西环球电视台和巴西足协安排在圣诞节前的星期三午后进行——这是一个荒谬的时间。圣保罗市的市长还为此将他们告上了法庭，设法更改比赛时间，而球迷则对比赛何时开始一头雾水。在比赛日当天的午饭时间，法院才下达强制令，将比赛时间更改为晚上9点进行。那些到场观战的球迷在暴雨中见证了科林蒂安艰难地以0比0的比分战平对手，并最终问鼎冠军。

1987年，巴西全国性锦标赛的平均上座人数超过了2万人，而到了20世纪末场平均观众数下滑至1万人。对于大部分球迷而言令人恼火的是，巴西环球电视台迎合了少数豪门俱乐部的利益，不管是以何种形式，这让他们相比小球队获得更多的观众以及更称心的上座率。电视台就好比败落的家业中缺位的地主：它在巴西足坛的头顶上撑起了屋檐，但却将它的价值白白浪费。

俱乐部陷入这种财政困境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一大笔资金的凭空消失。2001年，参议院对巴西足坛发起了调查，这让此前的十年间已司空见惯的种种事情变得清晰明了。圣保罗足协主席爱德华多·何塞·法拉被要求对一大笔资金从机构账户转入他的私人账户这一事件做出解释。不管用来支付什么费用，这笔经费并未出现在他所得税的报表中。曾于1994年起担任5年桑托斯主席的萨米尔·豪尔赫·阿卜杜勒哈克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他无法解释3000万雷亚尔在自己任职期间从俱乐部的账户中消失之事。曾在1999年和2002年连任弗拉门戈主席的埃德蒙多·多斯桑托斯·席尔瓦在谈及俱乐部转会交易细节方面完全是一头雾水。他出于某种原因将弗拉门戈在开曼群岛上拥有境外银行账户一事抛诸脑后，他本应向巴西银行申报这个账户的存在，然而巴西银行却并不知晓。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性格好斗的主席、同时也是自创党派的代表人米兰达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委员会对其如何获得在佛罗里达州的资产及豪华游艇一事感兴趣，尽管他在瓦斯科达伽马并没有拿薪水，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收入。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生意吗？“法庭必须明白的是，”米兰达对他们说，“最出色的巴西人都有自己的法则。”

来自海外的投资者并不理会所有的已知原因，并被说服将资金投入豪门俱乐部，他们后来才发觉这是一桩不平衡的交易。意大利乳业公司帕玛拉特曾于1999年至2001年间投资了帕尔梅拉斯；全球体育经销公司ISL投资了弗拉门戈和格雷米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Hick, Muse, Tate & Furst买下了科林蒂安与克鲁塞罗的股份；而美国银行则错误地投资了瓦斯科达伽马。两年内，所有的这些交易都宣告中止。帕玛拉特因意大利总部原因而破产，而其余公司的资金则被用光，血本无归。ISL投了13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改进弗拉门戈陈旧的训练设施，然而这笔资金花完后，加维亚球场仍旧爬满了蟑螂，球场上四处都是猫屎。

或许巴西足球管制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对顶级俱乐部降级的态度上。1996年弗卢米嫩塞降级，但通过转台（virada de mesa）他们保住了自己在顶级联赛的位置——规则突然被改变，向着有利于豪门而损害弱小球队利益的方向改变。顶级联赛无缘无故地进行扩军，增加了4支球队。这种操控方式只是在拖延时间，该发生的情况终将出现，因为大俱乐部一直在输球。巴西足协引入了两年平均积分制来计算降级区，这让大俱乐部享受了奢侈的待遇，就算有一个赛季表现不好也无碍。然而1999年博塔福戈和国际俱乐部却仍然

从全国性的竞标赛中降级。巴西足协在赛季结束后做出决定来挽救他们，为他们对阵圣保罗的比赛额外进行加分，原因是圣保罗在对阵博塔福戈和国际的比赛中派上了不具备出场资格的球员。有趣的是，在这位“非法球员”参加的12场比赛中，仅仅只有这两队得到了加分，而圣保罗并没有被扣分，而通常情况下出现这种违规行为的一方会被扣除5分。这种复杂的运算方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博塔福戈和国际双双保级，而地方小球队伽马将遭遇降级。伽马及其议员将巴西足协告上了法庭，法庭做出裁决让伽马留在顶级联赛，而博塔福戈降级。巴西足协以能摧毁一切的政策回应。他们废除了锦标赛，将操作权交给了顶级球会联盟，而法庭的裁决仅仅适用于该锦标赛。他们转而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若奥·阿维尔热杯赛，116支球队参与角逐，几乎囊括了除伽马队外巴西足坛的每一支职业联赛球队。伽马又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庭裁定这种将伽马驱逐出新锦标赛的行为是违法的，杯赛随后成了117支球队参与的赛事。

即使从巴西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局面也十分混乱。一些球队一个月只踢一场比赛，而另一些球队一周之内有4场比赛要踢；三分之一的比赛需要重新安排时间。而此时已沦为第三级别联赛球队的弗卢米嫩塞奇迹般地重返顶级联赛。

对足球权力机构改革的需求在科洛尔和卡多佐任职期间得到了执行。1990年科洛尔总统指派济科担任体育部部长，济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为巴西足球俱乐部的法律地位带来些许秩序：消除国家对各种体育竞技机构的直接干预；废除有弊端的球员注册系统。1993年国会通过了《济科法》，并未遇到多少阻挠，但随后它也并未对体制做出多少修补。

1998年卡多佐总统针对足球权力机制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派贝利担任体育部特派部长。贝利在体育部供职4年，起草了一系列的法规，这些法规做出了两个重要的改变：首先，足球俱乐部将转变为私人所有的有限公司，将他们及其银行账户从完全不透明的合法慈善和社会俱乐部领域中分离出去；其次是对球员合同的含糊领域进行改革。但即使是如此细微的改革项目也引起了巴西足协的强烈的关注，足协重新修改了规定，迫使整个法案被废止。这种局面在媒体界引起骚动，足球权力机构已沦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笑料，尽管如此，这已是改革能走得最远的一步了。然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在巴西后独裁时代的民主制度下，人民群众的意见即使能够成形与公开地表达出来，也显得无足轻重。里约足协那个时期的主席爱德华多·维亚纳代表了巴西足球组织的普遍观点，他说道：“我痛恨群众的观点。人民群众被机枪扫射都与我无关。我是来自工厂厂长和上流社会的子弟，我是右翼分子。”^[10]而在当时，他们均在社会中各行其职。

III

在独裁制度下，足球发展成为了上流社会与大众阶层的组成部分，而在民主时代，足球却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对于一些艺术家而言，被军方接管的足球以及与他们勾结所建立起的机构玷污了足球运动。更重要的是，足球摒弃了华丽与表演成分，转而追求胜利，这让巴西人在世界杯上赢球次数变多，但构建神话和英雄的素材却变少了。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一位诗人或作家拥有与安德拉德或林斯·多·里果比肩的才华，可肩负记录足球史的任务，而足球运动也没有再出现在新一代作家的诗作与故事情节中。那个时期的杰出的足球记者胡卡·卡夫里之所以出名，是由于他对足球权力机关诚信度与能力的无情抨击，而非凭空想象出的足球带来的胜利。在视觉艺术领域，20世纪60年代足球与流行艺术的偶然结合是不可复制的，而且足球也没能成为一个有用的载体，来构建他们的装置，进行他们的表演。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巨幅街头艺术场景中包含了来自足球的奇特内容和图像，但这些也仅仅只是巴西地下通道、桥梁与墙壁上成千上万个符号、标志和影像中的一小部分。现如今，足球被巴西艺术圈赋予了更多认同感，留给了天真或外行的艺术家的想象空间，这些艺术家仍在将足球比赛描画成梦境般的色彩炫丽的卡通形象。

经济也从中起到了影响。当时严峻的经济条件挤压了图书、电影和音乐的市场。而巴西电影产业或许是受这些经济状况影响最严重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政府津贴的回撤和来自好莱坞的竞争减少了它的产量，仅剩下一小部分的当地喜剧和国内色情作品。当然，在当时并没有一部值得关注的足球电影。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也没有制作出足球电影。仅仅到了90年代的最后几年，足球电影产业才开始繁荣起来。两部在其他成功的电影中脱颖而出的足球电影，均是在1990年上映。它们作为流行和成功的影视作品脱颖而出，成了巴西对足球态度转变的风向标。

由乌果·吉奥盖蒂执导的《足球，从前有一天》（Boleiros—Era Uma Vez o Futebol）故事发生在圣保罗的一个酒吧。一群从前曾是球员、教练和球迷的朋友聚在一起追忆往昔的足球生涯，故事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一位因受贿而操控了比赛的裁判让球员罚了三遍点球，从而达到想要的结果；过去有一位近视的球员被迫卖掉了自己的眼镜来偿还债务；一位受伤的球员被粉丝穷追不舍，希望他早日康复；一名司职前锋的球星从球队训练营中逃出来，去参加一个浪漫的约会。整部电影语调轻柔、幽默且人性化。毫无疑问，电影具有怀旧和伤感的气质，它不是在描述现实中不存在的“黄金时代”，或是只是通过神话故事而被人们知道的年代。这些都不是足球世界里发生的独特故事情节和背景，而是日常生活中足球运动的一部分；故事的主角既非恶魔，也非天使，而是复杂而有缺点的人。他们的故事并非围绕一个民族形成的伟大瞬间，而是每一天的劳动生活中的琐事，在这个产业中的人们生活得并不会太丰富多彩。

日常琐事就是阿图尔·方特和若奥·莫雷拉·塞勒斯电影《足球》所关心的中心问题。这部电影由三部分组成。影片以一名职业球员的视角仔细审视了现实生活，并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新电影运动的影片，比如《地下足球》和《人民英雄加林查》。然而，在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后，巴西的足球产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球探、经纪人和中介形成了一张全国性的网络，这种大范围出现的现象需要一些比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立意更高远、范围更广的电影。20世纪60年代，《足球》接受了挑战，从头到尾讲述了球员的整个职业生涯：从勇闯足球圈、通过新职业找到自己人生路的希望之星，到早早退役、挣扎着生存的一代人。第一部分刚开始时，1500个男孩来到了弗拉门戈的年度试训会上，其中有许多人长途跋涉横跨大半个国家前来参加试训，还有一些孩子的家庭借钱来缴纳教练费。电影清楚地呈现了在那样一个生活条件愈发落后的年代，从事足球运动对于个人及他们的家庭而言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逃离贫困之路。在足坛取得成功的几

率虽然微乎其微，但看起来仍然要比在底层阶级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成功以及中彩票的几率大一些。一群少年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从内陆的戈亚斯州来到里约。在那里，他们最终与一位经纪人住在了一起，那位经纪人时常拿着望远镜从科帕卡巴纳海滩拥挤公寓的窗户向海滩四处张望。他打电话给格雷米奥，企图将他们出售给俱乐部。等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南部时，发现这桩交易最终化为了幻影。第二部分重点讲述两位球员——卢西奥和埃拉尔多，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成功进入了弗拉门戈队。两人都因生活中巨大的感情与心理压力而饱受折磨，这些压力让他们猝不及防。第三部分介绍了保罗·塞萨尔·卡居的辉煌事迹，他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位球星，以精湛的球技、华丽的气质和这个国家最疯狂的穿着打扮而为世人铭记。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他的头发已经秃了，但是行为依然放荡不羁，他通过高端的私人足球比赛和社会党派的交际网络中谋生。这就是丧失了乐趣和珍贵魔力的巴西足球。人们有很多梦想，但都是关于生存的梦想，而不是对爱好的遐想。

《博雷罗斯》宣告了从魔力和神话向更清醒看待巴西足球美妙过去的这一转变。《足球》则好好地审视了那些梦想，并发现其梦想越来越多地取决于金钱规则。目前为止你看到了怀旧情结与金钱关系，但对于一些人而言，这是情感和精神层面的食粮，帮助他们诠释了人们与足球的关系。

宗教这个巴西足球一直以来的组成部分，是这种长期空虚状态下对文化方面最重要的响应。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天主教在巴西足球中是主要的大众宗教信仰：球员上场前会画一个十字，门将在触碰到横梁时会念祈祷词，前锋进球后会双膝跪地或双手指天。许多俱乐部在自己的基地都会有小教堂。瓦斯科达伽马的小教堂离球场不到30米，存放着来自葡萄牙三大足球豪门波尔图、里斯本竞技和本菲卡的圣土。国家圣母庙中设有偏房，用以存放他们收到的大量球衣以及其他纪念品。非洲的宗教信仰系统，不论是融入了乡村特色的坎东布雷教，还是来自马库姆巴教的城市化神奇力量，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都在巴西足球中得到了展现，当时有报道称球迷将神符带入了球场。

20世纪40年代，瓦斯科达伽马一直无法获得锦标赛冠军，里约人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一位名叫阿鲁比尼亚（Arubinha）的球员给俱乐部下了诅咒，阿鲁比尼亚来自一家叫安德拉里的小球队，他的球队在1937年被瓦斯科达伽马以12比0的比分羞辱过。

天主教和非洲传统一直存在于巴西足球中，正如巴西社会的其他方面，足球的精神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前巴西社会是完全由天主教徒组成，而现如今巴西的福音派新教徒占据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西仅有一小部分福音派新教徒，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人数开始增多，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音派新教徒人数开始呈爆炸性增长。传统的福音派新教徒对生活作风的要求非常严格：不喝酒、不听与宗教无关的音乐、不看电视、无婚前性生活。尽管是这样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但还是对巴西各个城市周边的迷途和饥饿的灵魂具有吸引力，这些人饱受犯罪和毒品的痛苦折磨。这也为球员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他们能够克服职业生涯中苛刻的条件和各种诱惑。正是这种动力促使福音派新教牧师成立了“耶稣的运动员（Atletas de Cristo）”组织，也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米内罗竞技的“上帝守门员”若奥·雷特诞生了。传教士的头目雇用了一小群人，以一种蜂窝状的结构模式，通过祈祷人群及圣经读书会的途径传播教义。他们宣扬新教教义的行为模范，鼓励球员与上帝建立关系，控制自己的生活，监督自己的行为，与心魔做斗争。这种教义与职业球员的情感需求尤为契合，他们的职业生涯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以及竞争对手和竞技状态的波动。在前F1车手阿莱士·迪亚斯·里贝罗的率领下，该组织从各种体育项目中吸收新成员，尤其是在足球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该组织已拥有了7000名成员。他们中拥有的前巴西国脚都能组成一支足球队来出战。单是1994年这一届世界杯就有6位成员，分别是尤尔金霍、塔法雷尔、保罗·塞尔吉奥、穆勒、津霍和马津霍。里贝罗充当了那届以及之后两届世界杯的传教士。一些传统

的福音派新教徒仍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足球，看待所有的运动项目，他们将皮球视为“恶魔所下的蛋”。但是这种新教的影响被20世纪70年代神学的繁荣而一扫而空。这个时期建起的新五旬节派教堂所宣传的教条语句上借鉴了自我奋斗和积极向上的心态，鼓励教徒将宗教能量转化为钱财和奖金。这一大转变让教堂得以向一批全新的信徒开放，为他们提供了巨大利润的收入来源，让他们能赚取钱财、获得资产。朴素与贫困的生活过时了，支付、消费与花钱成了当下的潮流。事实上，在加尔文主义的一种离奇扭曲的教义中，消费成了虔诚的外在标志。

球员也是福音派信徒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十年中，上百位巴西球员成了福音派基督徒，尤其是海外大量的散居球员，对于身处异域的他们而言，教堂就是与家人联系的强大纽带。巴西国脚中出了名的福音派信徒包括卢西奥、埃杜、埃德米尔森和卡卡。尤尔金霍在为勒沃库森踢球时曾担任过牧师，并开设了一间教堂。慈善捐款源源不断地流入。基督教堂重生教会的创始人埃斯特万和索尼娅·埃尔南德斯据说拥有5000万美元的身家，卡卡就是他们教会中的信徒。这位巴西中场在效力AC米兰时很显然为他们捐助了200万雷亚尔，只是在发生了领导层财务处理不当的指控事件后，卡卡于2010年离开了该教会。

在1994年世界杯上，巴西国脚站成一圈一齐祷告；2002年他们双膝跪下，尽管巴西队长卡福将胜利献给了他的家人和贫苦人民，而不是耶稣。在夺得了2009年南非联合会杯冠军后，队长卢西奥和其他5名球员穿上了印有“我属于耶稣基督”字样的纪念衫。

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主流足球圈中的故事——关于这些球员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的不可思议、充满冒险的故事，以及关于个人虔诚的精神信仰发生改变的故事，其实仅仅只是陪衬情节。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或许放弃了足球，但电视和大众媒体仍然不离不弃。球员和球队高层日益增涨的薪水以及他们不稳定的表现，再加上巴西媒体集团的审美观，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将许多球员的私生活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电视剧”——丑闻、竞争、亲子鉴定、摆阔性消费成了足球媒体报道的中心内容。伴随着那侵犯隐私的摄影、无情的炒作以及愤世嫉俗的杜撰报道的出现，现代名流文化孕育而生。

在足球为巴西所提供的人物角色中，没有谁能比埃德蒙多更特别。他出生于1971年，并于1992年首次代表瓦斯科达伽马亮相，同年晚些时候他完成了国家队首秀。虽然他也曾经历低谷，尤其是在意大利的那段时间，但他还是源源不断地取得了许多进球。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人们的谅解——需要原谅的事情多着呢。在18余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共有17次转会，曾5度与瓦斯科达伽马分分合合。他时常与队友、对手、官员、教练、记者、球迷和管理人员发生激烈的冲突。不久后他便得到了“野兽”的绰号，在首个完整的职业生涯赛季里，他共得到5张红牌，并曾因嘲笑3位科林蒂安球员而遭到了对方的攻击，由此还引发了群殴，引起一时轰动。在南美解放者杯比赛中怒摔摄像机后，他在厄瓜多尔遭到了软禁。1997年是他个人进球最多的一个赛季，瓦斯科达伽马最终问鼎了那个赛季的巴甲冠军，在那个赛季中他共被出示了7张红牌。1995年，他因在里约酒后驾车引起车祸而遭到指控，这起事件导致三人死亡。在接下来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德蒙多都在躲避庭审和判决、上诉决议，在真正被监禁了几个夜晚之后，他将法律制度内的罪行都犯了一遍。伴随着许多精彩的进球，他的职业生涯充斥着过激的愤怒、不守纪律的情绪，以及不成熟与暴力行为，所有这些事件的微小细节都被媒体曝光，比如在他儿子的生日派对上，他本打算将一只猿猴灌醉。

在足球王国自述的故事中，我们看不到穷苦人民和虔诚职业球员的挣扎，看到的是坐拥财富、免受制裁的有钱人和社会名流的故事。

IV

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球迷组织首次出现在里约和圣保罗，当时一群年轻人从20世纪50年代保守的“恰朗加斯”中挣脱出来，并在80年代站住了脚。1997年全国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南大河州的尤文图德对阵圣保罗葡萄牙人队——有55名观众买了门票，像这样少得可笑的观众数在巴西并不常见。在主流足球日报《兰斯》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四分之三的读者认为，是球场暴力让他们远离了足球。巴甲的平均上座率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巅峰期时下降了一半。

而对于那些最盛大的场合，巴西足球仍能号召到巨大的球迷群体。巴伊亚州锦标赛举行时，萨尔瓦多的方特诺瓦球场通常会涌入8000多名观众。就算是到了1992年，弗拉门戈还是能吸引120000名观众前往马拉卡纳球场观战。但人们此行是冒着风险去的。成立于1991年的里约足球特警是球场警力的一个例子。除了护送比赛官员，这些重型武装的特警还负责维护球场秩序，他们主要是通过以暴制暴来制服有组织的球迷团伙。俱乐部及官员早已放弃了对球迷组织的管理和控制。

其余的球迷时常会远远地避开，而球迷组织总会出现适当的位置，让足球比赛保持狂欢节的氛围，组织球迷挥动旗帜、燃放烟火以及喊口号。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扩张，蔓延至每一家职业球会。他们的头领与俱乐部董事建立了非正式的劳动合作关系，免费获取球赛门票，获得交通补助，在某些地方的城市周边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相比起其“前辈”，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代球迷组织总是在作风上水火不容，最终在一次全国性的混乱和暴力事件中球迷组织相互间干起架来，并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从这个方面而言，他们仅仅比针对民众的暴力行为以及20世纪80年代席卷巴西的财产犯罪稍好一些。在极其恶劣的恶性通货膨胀与饥荒的环境中，犯罪率在1980年至1985年间翻了一番，并且此后一直在攀升。在圣保罗，凶杀案于1980年至1996年间翻了三倍，这种造成大家心理上恐慌的情况就是在往独裁制度下未处理的伤口撒盐。在这样的条件下，球迷组织强烈维护集体团结的行为很容易被转化为愤怒和暴乱。

毫无疑问，巴西足球曾经历过死亡事件。1971年在福塔莱萨，1973年在特雷西纳均发生过体育场坍塌事件，造成恐慌，导致数十人死亡，还有许多人受伤。利马·巴雷托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记录下了看台上的第一起枪击案，而在1988年则经历了第一起足球谋杀案。帕尔梅拉斯俱乐部球迷组织的会长克莱奥·丹塔斯在俱乐部前遭枪杀，科林蒂安球迷要对此次枪杀事件负主要责任。1992年，圣保罗球迷在一场青年队的杯赛中向科林蒂安球迷投掷了一枚炸弹，一名13岁的小男孩遇害。1993年，帕尔梅拉斯队的球迷在莫卢姆比球场看台枪杀了一名16岁的圣保罗球迷。

如果球迷没能伤得了你，那么体育场也有可能给你带来危险。20世纪90年代，巴西足球基础设施吱吱作响。二十年来经济的停滞不前以及对经济的忽视使军事时代的水泥底座过早老化。接近半个世纪以前修建的马拉卡纳球场如今已摇摇欲坠。一些广场的水泥墙霉迹斑斑，因为被用作室外小便处而变得破旧不堪。1992年在弗拉门戈对阵博塔福戈的比赛中，球场上层的围栏因球迷数量过多而发生崩塌。50名球迷连同金属栏杆和混凝土碎片齐齐掉到下层在看台上。3名球迷因伤死亡，还有大批球迷被送往医院。

球场上所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993赛季初，平均每场比赛都会出现一张红牌。在与桑托斯交锋时，格雷米奥球员和官员因裁判判罚给对方一粒点球而袭击了裁判。在阿格雷里港举行的一场激烈的

超级杯比赛中，格雷米奥对阵乌拉圭佩纳罗尔队，双方各有4名球员被罚下场，这场球赛以格雷米奥在球场上与警察打成一片而告终。这些都是足球文化中爆炸性的时刻，在场上，假装受伤与暴力铲球事件不断增多，球童被要求拖延时间、转移对手注意力。罚任意球时，防守队员站位靠前的现象超出了控制范围，圣保罗足协只好为裁判引进了可消失的喷雾剂，以此来标记十码线：喷雾剂会在草皮上标记出一个圆圈。1994年，因足球产生的暴力行为蔓延至小城市。一位科林蒂安球迷在坎皮纳斯的球场看台上与人发生冲突，遭到了踩踏，8天后他在医院中不治身亡。在圣卡埃塔诺，一位年轻的圣保罗球迷在捍卫球衣荣耀的过程中被一群科林蒂安球迷追得满街跑。他在逃跑时穿越铁轨被火车撞死。回过头来再说圣保罗，那一年年底，帕尔梅拉斯与科林蒂安球迷在赛后发生了斗殴，一位帕尔梅拉斯球迷在逃跑时被人击中头部后死亡，而科林蒂安球迷又被另一位帕尔梅拉斯球迷用枪击中后脑勺。

1995年发生了后来为世人熟知的“帕卡恩布之战”，标志着混乱局面达到新的高峰。圣保罗和帕尔梅拉斯的数百名来自球迷组织的球迷在一场青年队比赛结束后纷纷涌入球场。在电视直播画面中，他们手里挥舞着木棍和铁棒陷入疯狂的斗殴中，造成一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两家俱乐部的球迷组织双双被圣保罗警方取缔，他们只好将球迷组织变为桑巴舞学校或更换新名字，进行改革。比如，帕尔梅拉斯的球迷组织“绿点”于1997年更名为“阿尔维绿点”。

取缔球迷组织会造成危险，在1999年南美解放者杯比赛中，帕尔梅拉斯在点球大战中击败卡利体育时就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许多改组后的“绿点”成员及其他无票球迷聚集在体育场外，在比赛进行的过程中企图冲入旋转门。警方与球迷组织之间的混战和斗殴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随后帕尔梅拉斯球迷也离开球场，加入了斗殴。防暴警察被召集起来，他们先是向群众投掷催泪瓦斯弹，然后拿起警棍和盾牌沿着圣保罗大街和群众对抗，圣保罗大街位于城市的商业中心地带，两侧均为摩天大厦。帕尔梅拉斯的球迷组织拆掉了铺路的石头以及树立起的临时路障。

球迷组织不满足于相互间的斗殴以及与警方的对抗，开始袭击本方球员。1997年，在0比1不敌桑托斯后，科林蒂安队乘坐大巴返回圣保罗。护送大巴的警卫一离开，球员们就发现乘坐的大巴先是被几辆涂黑了窗玻璃的汽车追赶和骚扰，然后有卡车意外出现，最后在半路杀出了一位教练将他们拦下。教练率领一群来自“信仰之鹰（Gaviões da Fiel）”组织的球迷向大巴投掷石子，然后一拥而上，对球员进行身体上的攻击和语言上的侮辱。

在世纪之交，巴西足坛的伤亡人数继续增长，在接下来的4年中又发生了8起凶杀案。随着枪支的普及，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枪支，圣保罗由此发生了更多起与足球相关的枪击案。一位来自阿雷格里港的球迷将自制的炸弹带入球场，炸弹在他的手中爆炸，他也因此丧命。因此，到了20世纪末，巴西破旧不堪和越来越空旷的球场——足球王国的心脏——愈发被球迷组织向警方实施的入侵和暴力行为所占领。

巴西在世界杯所取得的胜利中至少有一次堪称是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时刻。但2000年年底，巴甲联赛决赛时也发生了一起引发轰动的事件。在这场联赛中，米兰达主席的瓦斯科达伽马对阵圣卡埃塔诺。首回合的比赛在圣保罗进行，双方以1比1战平。决定最终冠军归属的一战在瓦斯科达伽马举行。出于恶意的刁难，原先承诺给圣卡埃塔诺球迷的门票全部被卖给了瓦斯科达伽马的球迷。像往常一样，俱乐部多售出了5千张门票，远远超出体育场所能容纳的观众数量。比赛开始大约20分钟后，裁判暂停了比赛，他发现球门后挤满了人。拥挤不堪的人群和铁丝栅栏一起被挤倒在了球场上，造成168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十几辆救护车赶到了球场，一辆直升机也降落在了球场上，将最严重的伤员送往医院。宪兵队在边线上围住了球员。米兰达激情洋溢地对着摄像头说道：“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但是如果球赛不能继续进行，那就真要

出大事了。我要让这些该死的救护车从这儿滚出去。”⁽¹⁾圣卡埃塔诺足球俱乐部主席则认为按照常理，应该停止比赛。在他喊停比赛一小时后，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因为里约热内卢州州长安东尼·加洛蒂尼奥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场让人丢尽颜面的大混乱，他打电话过来坚持要求停止比赛。片刻后，米兰达和瓦斯科球员又重新出现在球场上，他们抓起仍旧放在中线附近的桌子上的联赛奖杯，进行了并不光彩的绕场庆祝。第二天，《兰斯》报在头版刊登的一篇社评文章中表达了他们的震惊之情：“米兰达主席……一直以来都因他视俱乐部利益高于一切而备受赞扬。谁也不曾想到他对足球的痴迷已然达到一种极限，以致罔顾人命。”⁽²⁾现在，巴西人不必再去想象，因为他过去和将来都获得成功。瓦斯科达伽马在重赛中获得了胜利，而米兰达在瓦斯科俱乐部的主席选举中也成功地获得连任——他偷窃了，但他也干了正事（*rouba, mas faz*）。

在一个法律制度薄弱的社会，在一个上层阶级几乎不会被追究责任的社会，在一个将获胜和效率作为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准的社会，这也是实用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

⁽¹⁾ 《纽约时报》，1994年7月1日

⁽²⁾ 《Gazeta Sportiva》，1992年8月27日

⁽³⁾ J·布鲁克引用，“里约日志：巴西人说他们的世界杯满了”，《纽约时报》，1994年7月19日

⁽⁴⁾ T·恺撒，“一网打尽：1986年巴西世界杯”，《马萨诸塞州时评》29（2），1988年夏，第78页

⁽⁵⁾ T·马森引用，《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

⁽⁶⁾ 引用同上，第150页

⁽⁷⁾ H·托巴尔引用，“巴西赢取‘巨大的幸福’”（Brazil gets ‘Biggest Happiness’），《洛杉矶时代》，2002年7月1日

⁽⁸⁾ A·贝罗斯引用，“犯罪、混乱、无能：开拓者是如何背叛巴西的”（Crime, anarchy, incompetence: how the blazers betrayed Brazil），《卫报》，2001年12月6日

⁽⁹⁾ D·皮涅罗引用，“总统”，《Piauí》第58期，2011年

⁽¹⁰⁾ 《卫报》，1994年1月6日，1995年，第145页

⁽¹¹⁾ 贝罗斯引用，《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

⁽¹²⁾ 同上，第303页

第七章 足球帝国归来：卢拉的执政史（**2002-2013**）

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认为上帝造物弄人。如果我们在2010年没有夺冠，那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在2014年必将夺冠。

——卢拉

I

2002年，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和他的劳工党第四次参加总统竞选并获胜，这也是巴西首届明确社会民主且得民心的政府。卢拉竞选成功，本身就是一大成就，因为他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出身底层，并且是第一个从情感上理解工人阶级并和他们建立起政治关系的总统。就像他在圣路易斯的演讲中所说的，“我真想知道民众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并且我想把他们从那里拉出来。”确实，除了卢拉的死敌以外，绝大多数巴西人都很爱戴他。他在政界取胜的法宝是他的圆滑，以及他的战略能力和妥协能力。他作为总统连任，并在2010年第二任期结束时，民主支持率比他刚就职时还高，最后他把总统职位传给了他钦点的接班人迪尔玛·罗塞夫。

足球是卢拉人格中的一面。当然，他热爱足球的程度和普通巴西足球迷一样，也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们。作为科林蒂安的铁杆球迷，他经常评论球队的表现，并帮助俱乐部确保他们可以通过2014年世界杯获得一座新球场。他在总统官邸举行的足球赛参加人数很多，比赛也很激烈，这是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帕洛奇亲身体会过的，他当时刚参加完一场总统队和渔业部队的比赛，不得不拄着拐杖进入国会。2006年世界杯开赛前夕，卢拉通过视频和巴西国家队通话时，还问及罗纳尔多是不是还在发福。在他会晤外交官和国外球员教练时，经常同他们交换球衣。媒体曾经嘲讽地称之“卢拉诅咒”，因为很多球队在和他见面后就开始在比赛中被淘汰出局。卢拉的语言也夹杂着足球的暗喻，比如在一次主张改组内阁的会议上他曾说过：“贝利是世上最好的球员，然而他也可以被代替。”

对巴西人民的友好和亲近，以及对足球的热爱只是卢拉受欢迎的一方面原因。卢拉能在政坛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是他在任期内对巴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带来的巨变，其中经济发展占重头。虽然巴西没有像远东和中国那样经济腾飞，但是巴西在卢拉任期的十年里经济发展迅速，并且通货膨胀一直处于低位，这使得人民的工资普遍上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南美的普遍工业化发展使得对巴西农产品需求量大增，比如大豆和糖。低利率和信用透支使巴西社会中稍富的打工阶级和初级中产阶级毫不吝啬地购买家电和汽车，这也推动了巴西生产制造业的发展。

由于巴西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上升，卢拉便放开手，相比上一届政府他在制定政策方面更为独立。美国政府当时专注于中东和阿富汗问题，对南美地区干涉相对较少，因此巴西有机会和其他国家拓展新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同盟，比如中国、印度、古巴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而且巴西还与印度、日本和德国一起，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巴西还同中国、印度、俄罗斯共同组成“金砖四国”，这个词是由投行高盛发明的，但是自从四国开始组织峰会起，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个称号了，而是有了实际的政治意义。

在国内政策方面，巴西在宏观经济上采取保守的做法使得社会政策受到诸多方面的局限。其中最显著的是社保和教育两块，资金投入明显不够。但是卢拉在有一个方面作了重大改变，即在“家庭补助”上制定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并且在全国推广，这使卢拉在任内史无前例地削减了国家的赤贫发生率。这对巴西来说意义深远，因为这是巴西政府首次真正意义上关注民生，并且此举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很大。以前巴西穷人都会给保守党投票，因为他们担心左翼政党会把通胀变得更糟，从而吞噬人民仅存不多的购买力。然而卢拉凭借他的魅力，推行保守宏观政策，结合他的“家庭补贴”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幅上涨，这些因素把选民们的选票一致拉向卢拉的劳工党。在此之前，劳工党在国会里自己没有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执政，导致党派政策让他们难以建立政府联盟。因此有些劳工党头目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在国会上组成了“特别联盟”，

即“买选票”小团体，然而卢拉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地下交易”有组织有纪律，在巴西利亚的很多安全场所进行，议员由此获得大量现金。被称为“大月费”的丑闻直至2007年进入公众视野并在卢拉的任期内一直都存在影响。之前政府在反腐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因这个丑闻受到影响。

足球影响了卢拉的执政风格和公众形象。他在就职时没有用巴西国家队的指标来衡量巴西这个国家，相反，他是用有多少人每天能解决三餐，有多少人能获得重要的改变来衡量的。巴西已经蜕变，这反映在人们面对重大问题时的热情和行动上。巴西国家队在1994年第四次夺取世界杯冠军后没多久，卢拉便参加总统大选，那时他曾宣布巴西足球已经觉醒，但这样的豪言壮语并没能使他在大选中获胜。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当他为2014年世界杯的一个新足球场揭幕时，这个国家的命运已经传递给了巴西国足。在卢拉执政期间，巴西还有什么显著的改变呢？这几年内巴西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并且社会也在逐步改变。自从2007年巴西获得2014年世界杯举办权开始，巴西队希望再一次赢得世界杯的信念向整个世界传递着一个信息：巴西在改变，在迈向现代化。

早在1950年，足球王国就像双刃剑一样展示了它的成功和局限。巴西商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和巴西足球界也是一样。在对球员需求大增的全球背景下，巴西的确成了球员输出大国。事实上，这对很多巴西足球俱乐部而言增添了可观的收入，但这不能增加巴西国内足球赛的观众。“家庭补助”或许可以消除巴西人民的饥饿，但是它却未能实质性地改变巴西优秀足球运动员到国外寻求机会的事实。巴西政府试图通过巴西国家队来建立足球外交，使他们更大胆和坚定不移地推行外交政策，直至最后举办世界杯。然而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入中，也暴露了巴西各方面的典型问题：腐败、官僚、不平等和不公正。卢拉政府在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上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在世界足球范围内都存在，但是巴西在这方面正在一点点进步。同样，在公开透明度以及对查腐和处置方面，巴西也同样有进步。但在其他方面，卢拉政府的努力常常受到来自他政治对手的极大阻力。足球暴力问题是最能反映卢拉在任期内受到的种种局限的例子，而足球暴力本身也反映了足球王国是一个暴力的社会。

II

在卡多索政府的最后一年，即国会对足球管理机构进行调查之后，足球说客议员和巴西足协在总统官邸内便不受欢迎。体育部着手通过改革宪法来促使俱乐部能把球迷或更准确地说是“客户”的利益放在关键位置。卢拉和他的体育部部长安杰洛·奎罗斯推行该宪法，并使它成为《支持者宪章》，然后敦促国会通过该宪法，这和那些足球说客议员的意愿相悖。2003年，就在该宪章正式写入宪法一周后，8位俱乐部主席、3位州足协主席以及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都表示反对，特谢拉甚至威胁要暂停巴西足球联赛，因为他认为很多场地达不到新要求。

但是与此同时，政府重新开始私下和足协沟通。在卢拉刚上任的几个月中，他就劝说很多俱乐部通过穿政府提供的球衣，来支持他的政策，特别是支持“家庭补贴”计划的雏形——“零饥饿计划”。但是政府需要通过巴西国家队这样做才能在国内外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就需要巴西足协同意。而巴西足协也需要获得来自巴西利亚政府的支持，以获得2014年世界杯的举办权。就这样，奎罗斯和阿维兰热通过共进晚餐达成和解。虽然卢拉和特谢拉没有正式会面，但他们还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进行了非正式会面。

2003年初，巴西队和中国队在广州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又在下半年和爱尔兰队打了一场友谊赛。这两场比赛中，巴西队球员的球衣上都印有“零饥饿计划”字样。此后的几年，巴西政府和足协的关系非常密切，2004年，巴西队在美洲杯夺冠后，体育部部长奎罗斯亲临主席台为球队庆祝。当巴西队访问贫穷的国家时，会向当地人分发体育器械，这些器械是巴西囚犯在“改造计划”中制造的。巴西国家队还去海地打比赛，因为巴西武装部队是联合国在海地的主要维和力量。

巴西政府的强力支持使巴西取得了2014年世界杯举办权。作为回报，特谢拉在巴西队的球衣上给政府预留了一些空间，当然他没有放弃任何权利的想法，他在政治方面的野心依然不小。特谢拉在没有政府代表参与的情况下，成立了2014年世界杯组织委员会。相比之下，过去的韩日、德国和南非世界杯，国家都会派出政府代表。而特谢拉直接任命自己为委员会主席，任命女儿乔娜·阿维兰热为二把手，同时还招募了律师、新闻发言人、私人秘书、总管和在2001年国会调查期间帮助过他的参谋。然后，他又拉拢了右翼经济学家卡洛斯·兰戈尼，此人曾做过巴西银行主席。当时，足球报纸《兰斯》^[1]做过一个民意调查，询问巴西民众对此事的看法，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希望委员会能够三权分立，能有民间团体和政客一起共同管理，但是绝大多数人表示“无所谓”。所以，特谢拉恰恰是利用了政府的不参与和民众的冷漠而上位。

2003年的有很多条例，最重要的是它给球迷和其他消费者一样的合法地位和权利。虽然《消费者保护法》早在1990年就已入宪法，但是该法律不适用于球赛。因此这也是一种进步。《支持者宪章》会要求所有球场必须配备足够的男女厕所、饮水及医疗措施，这些之前都没有统一标准。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俱乐部需要对球迷的人身安全负责，以前大多数俱乐部都没这项义务。同时，政府也委派了监察专员，球迷可以向他们投诉。为了解决俱乐部因为税负而债台高筑的情况，卢拉政府在2007年引入了新的名叫“时间狂热”的足球彩票。这种足彩之所以得到俱乐部的支持，是因为要以比赛结果为竞彩基础，因此彩票利润的22%归俱乐部以偿还债务。这就要求俱乐部的财务要对政府公开，这一点是《济科法》和《贝利法》里面没有的。

卢拉时代的巴西，很多改革方案总是很容易通过，但很难实行。2013年，《兰斯》回顾了过去十年《支持者宪章》的实施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巴西球迷的确有所获益，但是很多原宪法中的条例却没有实

施。由于政界的冷漠或是人民的漠不关心，监察专员在立法后，没有将很多条款落实。一些俱乐部依然轻视球迷，比如客场球迷被延迟入场或者拒绝入场。总之，《宪章》要求有关部门起草对每一场比赛安全的“行动计划书”就是空谈，很多比赛仍然处于混乱状态。警察仍旧是以处理公众骚乱的态度来对待足球比赛，而不是将民众安排到安全的地方。更糟的是，《宪章》和卢拉提出的其他改革并没有抑制巴西足球场内的暴力，导致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在2010年，政府重新修改了《宪章》，新增了一系列强制措施，旨在打压足球流氓。

改革的结果有好有坏。政府利用巴西队试图推行社会政策但问责很难。《宪章》旨在给球迷更多权利，但却无法约束警察和俱乐部。卢拉的任期于2011年结束，并由罗塞夫接替。在她上台后12个月里，内阁4位部长因腐败而下台。2011年底，奥兰多·席尔瓦成为第5个下台的部长。《观察》刊发了一系列指控，称他从政府项目“下半场”（旨在支持贫困儿童的体育事业）中贪污。一位负责少儿体育项目的警察官员费雷拉称，他曾被迫把从此计划中获得的大量现金转交给席尔瓦，这些钱分别进入了席尔瓦和巴西政党的选举基金里。席尔瓦虽否认了这些指控，但还是辞去了部长职务。

III

在21世纪的前十年，巴西已经成为世界足球经济体系当中的球员输出大国，球员输出依赖于遍及整个国家的球探网络、招募和训练，说好听点是剥削，说难听点就是谋杀。虽然球员转会使得俱乐部赚得盆钵满钵，却也削减了巴西本土足球的魅力。就像巴西球员正面临着来着全球的竞争一样，如今巴西的电视观众也面临着来自境外的争夺。巴西各大电视台在经历了多年的隔绝后，也开始播放数量不小的外国足球比赛：从2006年起，每年总共播放400场比赛，尤其是在周末，都是欧洲各大顶级联赛在播映。因为很多巴西球员参加欧洲冠军杯，巴西电视观众也很爱看欧冠。打那以后，整个国家大街小巷都有了英超和西甲的各种队服颜色。

巴西国内的足球运动员工资与欧洲相比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随着亚洲富庶国家在球员工资方面的迅速提升，导致早在20世纪80年代，巴西球员就开始“往外”谋生。截至2010年，60%的巴西职业球员仍拿的是这个国家的最低工资。即便是对于那收入可观的球星来说，他们也未必能拿到工资——因为巴西俱乐部欠薪是出了名的，甚至有些俱乐部直接不发薪水。欧洲足球的《博斯曼法案》、视欧盟球员为非外援的政策、以及青年球员的球探网络，造就了一个庞大而流动性很强的全球劳工市场。官方数据显示，只有年满16周岁的球员可被交易，虽然足够证据显示很多未满16岁的球员也在被交易，但是尽管如此官方数字也已很可观：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平均每年有200名球员离开巴西，而到了2005年，巴西足协的数据显示，有超过800名巴西球员去国外谋求发展，净流失人数达到500人。2008年是巴西球员去欧洲的顶峰时期，有超过1200人被输出，净流失人数达到700多人。据巴西银行统计，球员销售的净收入达到2.5亿美元。只不过从2008年起，由于欧洲经济的不景气，关于球员的交易也减少了许多。

巴西球员的去向复杂多样。大多数球员去欧洲发展，但是也有很多人去亚洲（特别是日韩）和拉丁美洲。在欧洲，大约一个赛季有超过100名球员去葡萄牙。有些人会在那里定居，但大多数球员把那里当做中转站，之后发展好的可以去欧洲顶级联赛，发展不好的去塞浦路斯、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等小联赛，虽然相比之下收入不多，但比起在巴西国内也要好很多。不少巴西球员也会去一些很远的地方，比如卡塔尔、越南、法罗群岛和澳大利亚。

巴西顶级球员都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最好的俱乐部。基本上在参加欧冠联赛的俱乐部中，除了本土球员外，数量最多的就是巴西球员了。尽管很多巴西球员效力于意大利俱乐部，但几乎很少有人会在欧洲定居，莱昂纳多例外，他当过AC米兰俱乐部的经理和主教练。而有些巴西球员则加入了外籍，这样他们就可以为该国的国家队出征。像马尔科·奥雷利奥改名为默罕默德·奥雷利奥并加入了土耳其国家队，三都主加入了日本队，爱德华多加入了克罗地亚队，佩佩和德科加入了葡萄牙队，罗杰·格雷罗加入了波兰队，埃格马·贡萨尔维斯加入了新加坡队，埃莫森加入了卡塔尔队以及卢西奥·瓦格纳加入了保加利亚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复杂的转会事宜是由俱乐部和经纪人完成的，但是在21世纪，很多外人也进入了市场分一杯羹。Traffic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规模不大，靠在巴西球场内卖广告为生。90年代，它扩张业务至买卖媒体权和提供体育媒体服务。在2000年后，它逐步开始用自己和投资方的资金买卖球员。正如公司总裁所说：“我们投资的不是股票或房地产，而是投资购买球员的经济权利。”^②实质上公司买断了他们感兴趣的球员，然后把他们租赁给其他俱乐部，由俱乐部支付球员的工资并给他们表现机会。

帕尔梅拉斯是Traffic公司的主要合作伙伴，该队曾经一度有12名球员是Traffic公司的。在球员转会的过

程中，Traffic公司和投资者们拿走了大多数的收益。2007年起，国际足联明令禁止第三方机构私自拥有球员，但是Traffic公司和其他公司绕过了这一限制，他们的做法是建立或收购俱乐部，比如巴西竞技俱乐部和伊图阿诺俱乐部，然后以俱乐部名义和球员签约。这使得之后的租借和买卖变成了名义上的“俱乐部”之间的交易。这也意味着很多低级别联赛中的球队实质上是“幽灵俱乐部”，因为他们没有球迷，也不打算在联赛中获胜，他们就是一个“橱窗”而已。除了Traffic，巴西最大的超市连锁店之一松达集团也成立了自己的足球投资部门，他们投资近一千万美元，最后在21世纪初期获得150%的收益。

有像Traffic和松达这样追求“高投资，高回报”模式的俱乐部，同时也有一些巴西俱乐部是实实在在的“血汗工厂”。2012年，一位名叫文德尔·韦尼亚西奥·达席尔瓦的14岁青年球员在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青年训练基地进行5天试训时猝死，引发了媒体报道全国范围内环境恶劣的俱乐部训练营。随后的调查显示，这些男孩被关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处所内，马桶和天花板都是漏的。外地的球员一年只报销一次回家的差旅费，而且得用俱乐部专门配的手机。这些孩子的饮用水是有配额的，他们需要自掏腰包来治疗（如果当时医务人员不在的话）。达席尔瓦猝死的那天就没有医务人员。法官称这些孩子和奴隶没区别，因此下令关闭训练基地。然而，巴西足协在面对此丑闻时，如同之前的事件一样，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沉默⁽³⁾。

由于巴西足球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和各大俱乐部面临的生存压力，明显地导致他们的财务状况岌岌可危，但是当时俱乐部的会计事务不公开，导致根本没人知道具体到底有多糟糕。2007年，在引进了“时间狂热”足彩后，这些状态得到了改变，因为俱乐部如果要想参与分成，就必须将他们的财务进行公开。最新数据显示，在收入和上座率方面，巴西足球的情况良好，因为他们的收入确实在上涨，门票的出售情况也从2000年初的最低点慢慢攀升。但是总体情况依然不乐观，因为很多主要的俱乐部仍然债台高筑，不少都在亏损。2007年，15家巴西最好的俱乐部中有11家亏损，亏最多的是弗拉门戈和弗卢米嫩塞，他们分别亏了2270万和5300万欧元。次年这15家俱乐部中有12家亏损。

巴西足球俱乐部不得不继续着一个不可能的盈利模式：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球员买卖，这些钱让他们能生存，但是降低了本土比赛的可看性；比赛门票收入仅占俱乐部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而泛滥的暴力和杂乱的计划则导致他们不乐意改善陈旧的球场，原因之一是他们缺钱也借不到钱，其二是这需要警察的帮助和球迷组织的同意，这也是他们不愿意的。其三是这需要他们求助于巴西环球电视台。虽然近年来有很多新电视台和其他竞争对手加入，比如福音电视网络，一些俱乐部也试图脱离巴西环球电台，但是巴西环球电台在巴西电视领域仍具有垄断地位，原因是它有张王牌，即很多俱乐部都需要它的定金来保证足够的现金流。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俱乐部也很难换一家电视台。

俱乐部应对财务窘境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对于那些犯了思乡症又有名气的归国球员进行包装，更好地利用归国球员。有些俱乐部拥有可观的球迷数量，因此他们包装自己的球员，然后大幅提高门票价格，以此淘汰掉那些爱惹麻烦的足球流氓。这就导致全国范围的门票价格涨了300%。然而涨门票丝毫没有使俱乐部的手头变得宽裕，圣保罗队是唯一一个没有持续亏本的俱乐部，然而他们也没有盈利。2009年，巴西15家最好的俱乐部累积债务高达10.15亿欧元，其中一半来自政府的税收，并且债务还在不断增加。达伽马是债务最多的，达1.45亿欧元，弗拉门戈和弗卢米嫩塞紧随其后，分别达1.28亿和1.23亿欧元。弗拉门戈俱乐部主席曾抱怨，“即便我们卖掉自己所有的船和前主席的照片，我们还是无法还清债务。”⁽⁴⁾但他们从没有停止运作，也没有宣布破产。巴西仍是足球王国，俱乐部仍然可以无视经济状况而生存。

IV

尽管巴西足球管理混乱，但足球一直在巴西文化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变得更加多元化，并扩展到更多的艺术领域。顶级的足球俱乐部仍具有很大代表性，且象征着整座城市身份。足球比赛也扮演着整个社会关系的晴雨表角色，从腐败的盛行到妇女的地位。在卢拉执政时期，巴西社会继续着90年代末期人们对足球重新点燃的热情。小说家若昂·乌巴尔多·里贝罗会写足球，音乐家兼作曲家约瑟·米格尔·韦斯尼克大量出版关于足球的书，均为传记体。在他2008年出版的《有毒疗法》一书里，续写了吉尔贝托·弗雷雷对于巴西足球的解读。然而，这些作品都是对于早期足球文字的再包装，在2012年由《格兰塔》杂志选出的20位巴西新锐作家中，其作品已经很少再提及足球。

足球持续渗入桑巴文化当中。球迷组织赞助桑巴舞学校，嘉年华也会偶尔发起足球主题，放荡不羁的球员比如罗纳尔迪尼奥一样会参加游行。尽管如此，最流行的歌曲也不是桑巴歌曲，而是雷鬼摇滚乐队“斯坎克”的《这是一场足球比赛》、巴西重金属乐队“Sin博士”的《足球、女人和摇滚》以及累西腓大热明星“芒果”的作品。由巴西电台“自由世界”推出的书《我的计划》中比较了恋爱和进球的狂喜：“她就像医生所说的，是一个里瓦尔多的神话般进球。”然后在随附的说明光盘中附带了足球和音乐为主的起义口号；即使是开了个玩笑，这也是一个几乎独一无二的流行口号，把足球和激进左翼政治联系起来：

“日前成立的AR28——革命联盟，在10月28日，目标是创建国家足球和桑巴大会.....该大会旨在汇集所有相信巴西国力的成员和活动家。来自帕尔梅拉斯、圣保罗、瓦斯科、克鲁塞罗、米内罗竞技、累西腓运动、巴伊亚和所有俱乐部的支持者.....我们将驱逐权力的吸血鬼.....财团、国际和跨国金融机构近四十年从来没有做什么，有的只是谎言和阴谋，夺走我们的汗水，去偿还道德、不合法、无法偿还的债务。”⁽⁵⁾

这还是有怀旧余地的。东北部马拉尼昂州，歌手泽卡·巴列罗联手著名诗人博尔赫斯·塞尔索写了一个甜美的颂歌《坎奥泰罗（Canhoteiro）》——巴西足球黄金时期中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出生在马拉尼昂州，但职业生涯中遭遇许多压迫，导致被放逐在圣保罗。2004年，桑巴在巴西足球中的地位被确认没落了，当时足球杂志《记分牌》发布了一张CD，内容是各豪门俱乐部的官方歌曲，这是各大音乐艺术家，同时也是该队球迷重新录制的。17人中的2人——支持博塔福戈的泽卡·帕戈迪尼奥和支持瓦斯科·达伽马的保利尼奥·达·维奥拉，他们的版本才是真正的桑巴音乐，其他15人的版本都是摇滚、朋克、雷鬼、放克、主流MPB（巴西全域音乐）、乡村塞尔塔内霍和内城嘻哈，反映了巴西日益多样的音乐文化。最近，巴西嘻哈艺术家拉希德和MC奎梅以贫民足球为背景，创作了歌曲《国家足球》，赞美了前锋内马尔。

尼尔森·莱尔纳的雕像展示了更深的感性，他制作了一系列的足球球场，里面整齐地排列了人物形象，从星球大战角色、玩具士兵到迪斯尼人物集结起来。这些奇怪的舞台造型仿佛在进行一种刻板的仪式，给人一种灭亡的感觉。

巴西足球开始关注起茹卡·克弗里（Juca Kfoury）——他深受68年这代学生的早期政治活动的影响。他在专栏文章以及在ESPN电视脱口秀节目里有力地表达和批评着巴西足球。他为巴西足协制造了“土匪的家”一词，特谢拉起诉他将近50次，也不能阻止他的评论。ESPN频道提供给他平台，其他人也加入进来，对这个足球王国进行反思。达尼埃拉·皮涅伊罗在极左月刊《皮奥伊》上为特谢拉创作的肖像是报道足球政治最有力的作品。当然，这些人只是非主流的声音，只被极少部分群众了解，淹没了在众多对足球歇斯底里和吹毛求疵的媒体中，但他们所代表的进步显而易见。

培南布可州州长甘伯斯和很多东北部人一样，担心这个地区的经济和体育发展。他说道：“想到那个地区足球发展恶劣的情况，我们就知道足球在我们文化中举足轻重。这意味着球场里需要我们的球迷。在东北部，只有培南布可州坚持不懈地承受着压力的发展。我们在战壕里需要成为一个好的榜样。”

对于东北部的俱乐部来说，在足球场上无疑进行着一场艰难的战役，自从1988年巴伊亚夺冠后，几十年后才由累西腓体育队获得巴西杯冠军。巴西南北存在着的长期经济不平衡意味着北部球队能获得的资金很有限，那里的球迷、赞助商和州政府都没有钱。因此北部一直有球员去南方，随后又被卖到欧洲。电视台的资金分配也不均衡，那些小球队可以从媒体那里获得比北部强队更多资金，虽然这些小球队参加的联赛等级可能还比北部球队低很多。那些北部最好的球队好不容易升到巴西甲级联赛，没过多久又惨遭降级。所有累西腓的球队，包括圣克鲁斯、米内罗竞技、累西菲航海、福塔雷萨和塞阿腊都经常惨遭降级。

另一方面，东北部的确有灵魂。如同州长甘伯斯所说，这州的球队已经把足球融入地区的文化当中。特别是在圣克鲁斯，球迷文化已经深入骨髓。这里没有那些巴西大俱乐部球迷所特有的浮躁，尽管圣克鲁斯已经经历了三次降级，他们在主场作战时仍有50000球迷到场为他们加油喝彩，这也使得圣克鲁斯成为全球最受球迷支持的丁级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圣克鲁斯队打客场时，球迷数量有时也同样多。

可以说劳工党执政的十年来，南北足球的实力已经趋于平衡，就南方本身而言，近期的信号显示，已经逐渐在偏离昔日的“里约-圣保罗”轴心。2013年，两支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的球队克鲁塞罗和米内罗竞技队都是该赛季的强者。克鲁塞罗在巴甲联赛独占鳌头，在赛季结束前一个月就提前夺冠，米内罗竞技则仰仗着罗纳迪尼奥效力的最后一个赛季，在南美解放者杯中登顶。

然而，在卢拉在位期间，主宰巴西足球的还是卢拉的政治故乡——圣保罗，尽管自从上世纪70年代贝利离去以后，桑托斯俱乐部一度一蹶不振，直到2002年凭借着后起之秀罗比尼奥的发挥才再次恢复往日辉煌，夺得巴西全国冠军。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罗比尼奥被卖到皇家马德里，而且之前承诺的队伍重组和破旧球场的修缮一直未能兑现，导致桑托斯的王朝梦想并未实现。此景和2009至2011年的一幕颇为相似，期间内马尔和归国的罗比尼奥在同一队搭档，就此夺得2011年南美解放者杯，但随后内马尔转会去了巴塞罗那。

圣保罗俱乐部利用他们独一无二的稳定又强大的财力优势，逐渐将足球队打造成一支稳健又成功的队伍，并在2005年登顶南美解放者杯和世俱杯。在主教练墨里西·拉马略率领下，圣保罗队在2006到2008年连续3年蝉联巴甲冠军。墨里西曾有一次用明显带有保利斯塔方言味道的语言捍卫他球队平庸的特质，他说：“如果你想看与众不同的，那请你去歌剧院。”

科林蒂安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社会工人阶级组成的门外汉球队，现在也已经成为专业球队。在卢拉在任的前几年，他们问鼎好几项赛事，包括巴西国家冠军杯，但是后来他们不幸与神秘的MSI体育国际公司结仇，随后降级。在卢拉当权的最后一年，作为一名商人兼劳工党内线人士，安德烈·桑切斯当上科林蒂安俱乐部主席，他引导球队重返巴甲。随后他们一路顺风，首先在2011年登顶巴甲，然后在2012年又一次登顶南美解放者杯和世俱杯。

里约的足球俱乐部没有圣保罗发挥得那么好。瓦斯科·达伽马自2000年那场在圣热拿利奥球场举行的决赛之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佳绩。主席米兰达被迫离开议会并辞去俱乐部主席，他的继任者是当年很受球迷欢迎的前锋罗伯托·迪纳米特，但是最后证明他也无能为力。弗卢米嫩塞和弗拉门戈仍是公众争议最多且管理最混乱的球队，弗卢米嫩塞在2010年和2012年登顶巴甲两次，但在此之后一蹶不振最后在2013年降级。

然而在2013赛季结束后巴西足协推翻了对弗卢米嫩塞降级的决定，这也证明了该队是联赛中最有“政治背景”的球队。最终，波图格萨队被处罚，原因是他们在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中让一个没有上场资格的球员出场了15分钟。这项处罚虽说没什么问题，但无疑又过于严厉，因为巴西足协判他们降级，并保住了弗卢米嫩塞。至于弗拉门戈队，在2009年夺得一次巴甲冠军以后，因为解雇了主教练安德拉德，导致在此后几年碌碌无为。

虽然巴西足球充斥着腐败，但是这主要是在财政层面——贪污、腐败和逃税，很少有操控比赛和作弊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的足球比赛中，比如意大利，因为赛季的降级结果往往要在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才会产生，所以一些比赛确实被操纵了。但在巴西，赛季结束后最终分数会通过相应的调整以及联赛的结构来避免一些强队降级。

但是，在21世纪，随着网络赌球的出现，致使巴西的一系列比赛也被操控。2005年发生了“裁判丑闻”，两名圣保罗裁判，埃迪森·佩雷拉·达卡瓦略和若泽·达内隆被指控在赛季早期至少操控了17场比赛，其中11场是巴甲，2场是保利斯塔州比赛还有4场是巴西乙级联赛。据调查，是一个圣保罗的犯罪团伙在了解到达卡瓦略欠下大额债务后，愿意支付给他每场比赛大约5000美金报酬让他保证吹出他们想要的比赛结果，这可以让他们赢得上百万雷亚尔。巴西最高体育法院坚持要求这11场巴甲比赛重赛，这显然遭到了受影响的球队的强烈质疑。重赛使得国际队失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冠军，同时也使科林蒂安队获得了他们原本失去的冠军。2009年，裁判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这次是裁判丰塞卡指控巴西足联的裁判团主席塞尔吉奥·科雷亚利用裁判的赏罚机制（比如有机会做国内外的大赛的裁判，或者降级去更低级的联赛做裁判）对一些球队做出有利的判罚。科雷亚本身并没有因为该指控丢乌纱帽，但却失去了此前所拥有的管理权。

爱德华多·维亚纳，绰号“水库”，依靠着他强力的手腕，领导里约州足球协会达18年，他在职业生涯里三次被指控贪污，但是每次他都可以避免获罪。2004年，他和其他5个同事被捕，因为被指控贪污，尤其是因为价值约30万美元的马拉卡纳球场门票的发票丢失。法庭驳回了他的申辩，随后他开始休病假，最后在法庭结案之前死于心脏病突发。

种族主义是足球，甚至是巴西整个国家需要面临的一大问题。卡多索政府终结了“巴西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的称号。他们和卢拉政府为了彻底改变在巴西社会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专门任命非裔巴西人担任国家要职（卢拉任命了第一个非裔巴西人为最高法院法官）并在外交、民事服务以及大学招生程序上推行积极的政策。虽然在这些领域有不小的进步，但是也必须考虑到，根深蒂固的巴西种族主义造成起码有一半非裔人口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顶尖职业中人数相对少。在巴西，哪个人是非裔人这个问题人们也不会公开提及，因为在巴西，一个人的肤色或者血统决定着他的地位。罗纳尔多是一个非裔和欧裔的混血，当别人问他是如何看待巴西足球的种族主义问题时，他承认种族问题的存在，但他说：“我是白人，所以我对此不是特别在意。”但是罗纳尔多的黑人母亲曾在她儿子的私人公寓里被拒绝搭乘电梯，并被指引坐货梯。

早在1937年的那场人们熟知的巴西对阿根廷比赛中，阿根廷球迷就对巴西人进行种族攻击，因此巴西足球和媒体对于外国人对巴西人的种族歧视历来十分敏感。同样，媒体也迅速报道了欧洲足球赛中非裔巴西人所受到的种族歧视的种种事件。然而媒体却对巴西本国发生的类似种族侮辱事件报道总是慢半拍。在这方面至少现在有了进步。很多球员使用的种族绰号和球迷用的种族侮辱语言现在被更大面积地曝光，违反者将受到当局的处罚：尤文图斯球迷因为对国际队的廷加使用种族侮辱语言而被禁止进入球场；该队的后卫扎戈因为被摄像头拍到朝热奥万尼奥模仿猴子动作而被禁赛很长一段时间。帕尔梅拉斯队的达尼洛因

为语言侮辱巴拉纳竞技的后卫曼诺尔甚至被判入狱一年，只是之后判决减轻至罚款。

虽然在巴西非裔球员很多，并且巴西也在社会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做出很大努力，但是在巴西足球界里很少有黑人教练，而黑人体育经理或者管理人员更是屈指可数。1958年和1962年世界杯巴西队中场巨星迪迪直到离开巴西之后，才在秘鲁顺利做上了教练。在参加1970年世界杯的黑人球员里，只有阿尔贝托进入了管理层。

这里不得不说，卢拉在任期间既有进步也有退步。2009年，弗拉门戈在一位名叫安德拉德的黑人教练率领下17年来首次问鼎甲级联赛冠军。电视评论员扎尼尼说：“这将成为巴西足球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日子，并且这也会给巴西黑人教练创造更好的机会。”出乎意料的是，安德拉德得到的奖励竟是被下课，因为他成为了球队在此后一个赛季发挥不理想的替罪羔羊，他这一走，使得巴西甲级联赛里没有黑人教练。⁽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西女足整体瓦解，直到21世纪初才慢慢恢复。足球俱乐部开始组建女足球队，但是巴西足协不让女足参加国际比赛，使得她们无法达到组建女足国家队的最低要求。倒不是缺少球员，因为当时很多有天赋并乐于献身的女球员不断涌现，聚集在街头，踢5对5的训练赛。然而就是因为严重的性别歧视，女足比赛还局限于满足男人的观看欲望和电视广告收入当中。最能说明这一切的，是在2001年圣保罗足球协会举办他们自己的女足比赛时的作为，他们承诺这将是一场能将女性和足球完美结合的“富有魅力的冠军杯赛”。然而他们并没有在现有的女足俱乐部中招募球员，而是进行海选。参加海选的球员中，牙齿不齐的遭淘汰，金发的球员会被优先考虑，并且要求所有女球员不能超过23岁。一个参加海选的女球员回忆道：“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在电视上展示一个良好的冠军杯形象，他们不希望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牙齿缺失的女球员，他们希望看到的是金发女郎。这简直就是选美，这让我很抓狂。”⁽⁷⁾

虽然在巴西足球中，性别歧视根深蒂固，而且巴西足协对女足的态度冷漠，但巴西女足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在进步，她们在雅典和北京奥运会上获得2枚银牌，并在2007年里约的泛美运动会中夺冠。女足国家队的前锋队长玛塔连续五次成为国际足联女足球员，这一成就是任何一个男性球员都无法做到的。巴西政府为了对她进行表彰，让她出任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官方大使。但是作为如此优秀的女足运动员，巴西联赛却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她只能从瑞典和美国的女足俱乐部赚一点钱。女足球员不奢望能与男足地位齐平，但是她们作为足球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其他巴西人一样，她们需要的不是参赛资格，而是尊严。一位在巴西联赛踢球的女足国脚说：“我知道男足腐败根深蒂固，我们也不奢望腐败能被消除，但是我们只是希望有尊严地踢我们的足球。我们不想赚大钱，但是我们也不想因为工资微薄陷入极度贫困，很多女球员就像清洁工那样维持着生活。”⁽⁸⁾

V

2006年5月，圣保罗监狱的犯罪团伙首领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全州的13家银行被劫，56辆公交车被点燃，144个监狱中有73个监狱发生骚乱。镇压的警察在城市的街道和监狱里一共发现超过100人死亡。导致暴乱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犯罪团伙提出希望在监狱里安装更多的电视，以观看世界杯巴西队比赛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这个足球王国的所有监狱里，现在一共安装了50万台电视机，导致只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犯人能看到比赛，而这些犯人大部分和组织犯罪或者贩毒有关。

绑架是迅速发展的犯罪产业之一，在2004年，四个非常著名的足球运动员的家属被盯上。桑托斯著名球星罗比尼奥的母亲驾着她新买的奔驰轿车在一个乱得出了名的地区和几个朋友一起吃烧烤时被绑架，她被关了40天。圣保罗东北部的一个有钱的小村庄坎皮纳斯也成为了绑架的高发地区。那时候圣保罗前锋格拉菲特、路易斯·法比亚诺和罗热里奥的母亲纷纷被绑架。这几起绑架案最后都交了赎金，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2008年，贝利曾经遭到抢劫，当时他还被枪顶着，当他告诉劫匪自己的身份后，劫匪还是抢走了他的手机和珠宝。虽然自从卢拉时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数据显示暴力犯罪和谋杀数量在减少，严厉的禁毒法律确保了入狱的人数居高不下，但是巴西的犯罪率仍令人担忧，城市里经常发生枪战。

巴西足球的暴力事件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居高不下，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在之后的十年中，超过100人死于足球相关的暴力事件。《兰斯》报估计，自从1988年起，巴西因足球死亡的总人数达234人。在2011年5月到2012年5月间在西部城市哥亚尼亚发生的一起两帮足球流氓的流血事件中，至少有11名球迷死亡。在周末会有很多骚乱事件发生，特别是在每个赛季末。2004年，博塔福戈球迷因为球队被科林蒂安打败，发动骚乱并袭击了裁判。当比赛结束以后，警察便持警棍一路走上看台，与试图摧毁栅栏的球迷战成一团；巴拉纳竞技的球迷在长途跋涉12个小时后拿着票去瓦斯科·达伽马队的球场时被告之不能进入，随后他们用瓶子和石块同警察打斗起来；警方从克里丘马队的球迷组织“曼查角”查获了数千双准备扔入球场的拖鞋，从而避免帕尔梅拉斯队的球员受辱；瓜拉尼队在输给派桑杜队后降级，他们的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不得不临时在城外的一个球场举行，因为他们被俱乐部的球迷用石块砸得很惨。

除了小骚乱以外，还有的是大规模的骚动。2006年在格雷米奥和国际队进行的阿雷格里港德比大战中，双方球迷在球场内纵火并攻击前来救火的消防员。2012年3月，500个帕尔梅拉斯和科林蒂安球迷在圣保罗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2名帕尔梅拉斯球迷死亡。暴力甚至蔓延到过去还比较平静的室内5人制足球比赛中。2008年帕尔梅拉斯和科林蒂安的比赛后来演变为球迷的互殴，结果9人被捕。

引发骚动的并不仅仅是球迷。瓦斯科·达伽马队主教练安东尼奥·洛佩斯向对方一名受伤球员扔球，引发了双方教练组和警察的大规模斗殴。2012年弗卢米嫩塞队的装备负责人员冲到球场内对一名助理裁判暴力追打，随后由警方阻止，他因此被禁赛12场。2013年，丁级联赛图皮俱乐部的按摩师在比赛临近结束前冲进球场试图完成一次进球实现大逆转，随后被气愤的对方追打并且被警方控制。2012年在帕尔梅拉斯输给博塔福戈后，双方球员和球迷就开始斗殴，帕尔梅拉斯俱乐部主席收到了死亡威胁，俱乐部经理开的饭店被砸。该队的阿根廷前锋埃尔南·巴尔克斯感叹道：“如果天天要开武装轿车手里拿枪的话，我宁可回家。”^[9]一年后，帕尔梅拉斯球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被本队球迷袭击，因为球队在客场输给了墨西哥老虎队。

在玻利维亚的欧鲁罗举行的南美解放者杯比赛科林蒂安对圣何塞的比赛开始前一个月，冲突就已经开

始。有人向玻利维亚的人群中投掷了一枚军用闪光弹，造成一名14岁男孩不幸死亡，随后一个17岁小伙子作为被球迷组织选出的“替罪羊”交给了警方。

2013年6月30日，在马拉尼昂一小镇的一场比赛中，裁判坎塔涅德给场上一名球员兼自己的朋友阿布鲁出示红牌，但是阿布鲁拒绝离场，随后在双方的争执中，坎塔涅德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连刺对方两刀，阿布鲁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不幸死亡。一个喝醉酒的暴徒当时情绪非常激动，他冲进球场，用木棍打倒坎塔涅德，用巴西朗姆酒瓶砸他的脸，并用摩托车在其身上反复碾压，最后将其砍首并肢解。⁽¹⁰⁾

足球成为那些身处绝望的巴西底层阶级的发泄途径。巴西年轻人出门都会带武器，因为他们对这个暴力世界已经习以为常，生命如此廉价，而且当权者、警察或是司法机构又不能带来和平或主持公道。并且整个社会不断剥削人们的经济并使他们不断边缘化，因此人们在公众场合不会注重形象。同样也是这样的愤怒的心态，促使很多人在球队失球时会冲进球场发动骚乱，在球员表现让他们不满时，则会殴打球员。巴西警方和体育当局根本不在意那些在比赛中怪诞的乡村式报复和城市骚乱，巴西足球成为这个依旧野蛮社会的思想和情感病体的导火索。

(1) 《兰斯》(Lance)，2010年8月19日，详见：<http://www.lancenet.com.br/infograficos/organizacao-da-copa-2014/>

(2) 胡里奥·马里兹，被A. 道尼所引用，“巴西人才交易”(Trading in soccer talent)，《纽约时报》，2008年7月19日

(3) 列奥纳·坂本引用，“Após morte de jovem, MPT quer processar Vasco por trabalho infantil”，2012年2月25日，详见：<http://blogdosakamoto.blogosfera.uol.com.br/2012/02/25/apos-morte-de-jovem-mpt-quer-processar-vasco-por-trabalho-infantil/>

(4) M·普罗尼和F·扎亚，“巴西足球俱乐部的财政状况：概述”(Financial condition of Brazilian soccer clubs: an overview)，《足球与社会》，2013年11月12日。上述所有关于巴西足球俱乐部的经济状态数据均引自这篇文章

(5) 详见Mundo Livre S/A于2000年发布的CD《几乎》

(6) R. 肖，“巴西足球种族问题”(Brazilian football's race problem)，《WSC日报》，2009年12月10日，详见：<http://www.wsc.co.uk/wsc-daily/978-December-2009/4194-brazilian-footballs-race-problem>

(7) J·克尼基尼克和P·霍顿，“只有美丽的女子才能享受待遇：巴西足球的人权和性别”，《创新方法研究》6(1)，2013年6月，第60-70页

(8) 克尼基尼克引用，2013年，“性别正义的视角：巴西球场未经测试的可行性研究”，《体育和社会事件日报》37(1)，第8-30页

(9) T·阿佐尼，“巴西国家队陷入挣扎，球迷也成了威胁”，美联社，2012年11月9日，详见：<http://bigstory.ap.org/article/fans-turn-threatening-brazilian-team-struggles>

(10) J·朗曼和T·巴尼斯，“在巴西一张黄牌引发的无尽暴力”，《纽约时报》，2013年10月31日

第八章 足球王国的内战（**2013-2014**）

让我们忘记在巴西发生的混乱以及那些抗议者吧，我们更应该记住桑巴军团是如何与这个国家融为一体的。

——贝利

如果贝利是国王，那我就是雅各宾派。

——里约市内一名抗议者在标语牌上这样写道

I

就像其他巴西当权派一样，贝利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足球王国竟然深陷示威、游行的混乱之中——要知道长久以来，足球就是团结巴西全国上下的纽带，甚至成为这个国家解决诸多问题的核心基础。正因如此，在2013年6月发生的骚乱，几乎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社会事件——无论是1968年10万名学生聚集在里约街头，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两次结束了军政府的游行，抑或在1992年要求弹劾总统科勒，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次，在圣保罗、里约、贝洛奥里藏特和福塔莱萨先后发生了6次示威游行，而参与人数则远比10万要多。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示威规模，甚至达到了30万至50万之间。曾经游行对于政治组织的抗议有着明显的诉求、注意点且只针对少数几个大城市，活动于2013年的新示威者无疑更富于变化、复杂且多元。特别是从地理分布上看，这一次的规模要远超过往。2013年6月20日，示威者在巴西国内的120个城市集结——过去20年城镇化的发展不断拓宽了城市的边界，从而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再加上新媒体技术的帮助，这里早就不是一片孤岛。

抗议者们的诉求是多种多样的，在故事开始的地方——6月初的圣保罗，因为抗议公车涨价而开始的示威，很快演变为成百上千人高举标语提出诉求、表达不满：其中既涉及本州的公共医疗、公共教育，也包括联邦法案中关于同性恋的提案；除此之外，他们还希望可以借此削弱联邦警察的权力，并加强对于政商界高层腐败情况的调查。

其实，上述种种社会现实的存在，都源自巴西近几年飞速增长的经济，但这一切带来的好处却只被足球王国两个阶级的人们享受过。在巴西，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一直享受着因此而得来的种种利好，而一些穷人，特别是巴西东北部及中部并不发达的地区，也曾从卢拉（2003年至2010年巴西总统）的“家庭津贴”政策中得到利好。正因如此，在去年的示威人群中，很少见到这两个阶层的人。至于参与游行的民众，有来自贫民窟反对现行住房迁移政策的人，有许多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年轻人、有保守右翼组织以及一些信福音主义者，不过其中占最大比例的，还是城市中产阶级——从公司职员到大学教授。在卢拉和罗塞夫担任总统时，中产阶级开始不断膨胀，其中也有更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他们的处境却停滞不前。对于自己在社会上的付出，中产阶级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缴纳欧元级别的税款，得到莫桑比克般的服务。”可以说，这些人在去公立医院时都会自带手纸和毛毯，且在负债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一些私人医疗服务。当然，更深层次的积怨还是因为巴西政界高层对于其他阶级都关怀有加，唯独对中产阶级视而不见。

众所周知，如此情况在中产阶级内已经蕴藏许久，直至2013年6月，一切都爆发了。值得注意的是，示威的参与者与评论家对于游行的名字一度很难确定。最终得出的“酸醋运动”，还是因为一些被警方抓住的示威者的书包里放着醋。当然，也有一些人将这次运动定义为“巴西之春”。不过，虽然与“阿拉伯之春”相比二者确实有相似之处，但局限性也很明显：中东地区依赖社交网络的起义，更多反映的是普罗大众对于权贵以及制度的不信任。至于巴西则并不一样，一方面“足球王国”近些年经济增长很快，另一方面也没有军政府以及外国人的问题。或许，对于去年发生在巴西的示威，最准确的定义还是“示威杯”，因为游行人群的目标就是2013年联合会杯——这些人对巴西公共环境的不满，夹杂着对国家在世界杯筹办方面高额花销的抱怨全部爆发，最终还与迎接世界杯的社会舆论交织在了一起。

示威人群中，部分抗议者高喊着：“嘿，FIFA，为我们付公车钱吧。”还有一些人则高举着标语板——上面分别画着闪闪发亮的球场以及破旧的学校和教室……看起来，国际足联在巴西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而游行群众当然也没打算放过本国的高官和政客——制度腐败以及对公众隐瞒真相的始作俑者。众所周

知，在国际足联，诚信早已被深深地损害，更多阴暗面露出端倪。2012年7月，瑞士最高法院公布了“ISL腐败案”相关细节，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和前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被曝在1992年至2000年期间共受贿2200万瑞士法郎（约合1500万英镑）——通过出售世界杯转播权而抽取的分成，当然，这些情况目前还在调查中，而在一些报道中，内容是这样的：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阿维兰热和特谢拉而言，很多钱都是通过不明渠道得来的.....这里没有明确的地指向是哪个机构给予他们回扣。一些报酬很明显就是通过前沿公司掩盖真实的受益者而美其名曰‘委托费’进了他们的口袋，其实也就是现在的‘贿赂’。”⁽¹⁾

截至目前，根据瑞士法院提供的情况，还没有非常确切的事实可以指证像国际足联这样的组织内存在贿赂和腐败的情况。特谢拉，2012年3月突然宣布退休，不仅退出国际足联、辞去巴西足协主席一职，还卸任2014年巴西世界杯组委会主席一职。至于另一位风云人物阿维兰热，虽然从国际奥委会退出，但还是长期享受着国际足联荣誉主席的待遇——直到2013年初才卸任。特谢拉的告别演讲并非由自己宣读，而是交给了其继任者若泽·马里亚·马林。就像多年前小布什在伊拉克发出的声音一样，特谢拉同样表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在结束语部分，马林还说道：“特谢拉的伟大事业将被延续下去。”⁽²⁾

看起来，巴西足协的大权似乎终于被交到了正确的人手中。马林的第一段政治生涯，是加入了前身为20世纪30年代由萨尔加多牵头的法西斯组织的一个党派，而在经过一番卧薪尝胆后他成了圣保罗州副州长。2012年1月，在为圣保罗足球青年杯冠军发奖时，马林把本该发给球员的一块奖牌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很不幸，这个镜头被ESPN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本应得到这块奖牌的科林蒂安守门员马特乌斯，则尴尬地一无所获。事后，马林坚决否认这是一次事故，始终表示这真的是一个玩笑。

其实，并没有多少人期待联合会杯，可能也很少有人能完全说清楚这个赛事存在的意义。而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在巴西蕴藏了太多导火线和助燃物，一场爆发早就在酝酿。

II

“这将是一个混乱时代的开端。”在2007年里约即将举办泛美运动会前最后一个月，巴西记者杰卡·考夫瑞曾这样写道，“当巴西赢得主办权的那一刻，所有人就都知道，随之而来的便是国家隐瞒各类消息，所有常规都被打破，而这些行为的名义都是“为了大局考虑。”^[3]对于举办这次赛事具体花费多少也曾有过广泛争论，有报道说至少是50亿雷亚尔，但有消息透露实际数字应该是6倍以上。当然，这个数字并非全意味着坏事，毕竟当时巴西国内一些交通和基础设施急需翻修，不过本该付诸实现的新高铁和轻轨电车项目却从未真正上马。举个例子，相关部门本计划要改造瓜纳巴推湾周边，但时至今日，那个充满垃圾和工业原料的下水沟仍然存在。除此之外，原本对外承诺的花费3亿美元增加的安保措施——18000人执勤以及1700台监控也不见踪影。

泛美运动员村坐落在里约市西部巴拉大蒂茹卡区一片潮湿的土地上，然而这片土地并不稳固且渗水严重，在建造运动员村时，建筑工人必须深入地下45米处构建电缆，如此一来，虽然满足了17座公寓的硬件要求，花费却比预算高出太多。这个项目的启动资金是由工人援助基金会提供的，该组织由联邦政府牵头建立，为没有保险的工人提供贷款和低保。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贷款和低保并不适用于社会中的有房一族，而且需要为这个粗制滥造的项目买单的人还是上层中产阶级。而对于项目之中存在的违规操作、膨胀税款以及未完成的工作，政府方面最终采取了诉讼。

里约市弗拉门戈公园内的格罗里亚海湾，除了计划被用作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场地，还被视为一个多元化娱乐场所的聚集地：包括会议中心、购物中心以及大型汽车主题公园。以上种种需要占据的空间，都是举办一次综合性运动会时所必须要求的，而这一切就需要将很多公共空间转化为私人用地或以建造高楼大厦——这却有可能遮挡周边居民欣赏瓜纳巴推湾的视线。当然，这项看起来很美的计划还是被当地抗议者及法院制止。不过，最终还是有三座大型场馆拔地而起：阿维兰热奥林匹克体育场、马利亚·伦克水上运动中心以及多功能竞技场，而它们各自的总开销则不出意外地都超过了预算。先来看阿维兰热奥林匹克体育场，被视为里约申办2016年奥运会的核心标志，当时被强制装上了防雨顶棚。但是在2013年3月，里约市长正式宣布以安全理由暂时关闭体育场。再看水上运动中心，虽然功能齐全，但是既没有按照奥运会规格建造，也并不适合用于大众健身——这与另外一座室内自行车场遇到的问题不谋而合。所有以上提到的场馆，无论是在奥运会赛中还是赛后，都需要远远超过市井街头球场的、高规格的保养和维护投入。特雷萨对这种现代巴西城市化的中心元素的描述完美概括了它的特点：它们完全被墙体、围栏、空地和一些带有设计的设备隔离开来，它面朝内部，远离大街，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持有武装的警卫还有安全系统都会实时监控。它们是被集体使用的私有财产，并且强调隐私的重要性。^[4]

那一届泛美运动会的现场观众绝大多数是里约市的中产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他们既可以熟练掌握网上购票的方法，也有足够的资金去支付高价票。至于那些举办比赛的场馆及其管理者，就如同特雷萨·卡拉德拉所言的那样冷酷——“面朝内部，远离大街”。对于这届在里约举行、倾注了大量安保措施的泛美运动会而言，似乎在很多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举办的运动会别无二致，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泛美运动会开幕前和进行中，警察和军队在市内的贫民窟执行了大量的扫荡。2007年5月，距离运动会开幕还有两周，巴西方面的安保设防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1350名特警被安置在里约市北部阿莱芒街区（里约最大贫民窟和毒贩巢穴）周边，对该地区的毒枭给予了严厉的打击。巴西最著名的杂志《观察》将这次行动称为“必要的战争”，而《伊波卡》（Epoca，巴西发行量最大的周刊之一）也把其誉为“一次历史性的进

攻”。^⑤在特警的第一天行动中，总计有19人丧生、9人受伤。而到了一个月以后泛美运动会开始时，整个阿莱芒街区基本都被军方封锁，不仅住户们无法上学或是去医院，生活垃圾也只能随意丢弃。待到7月末，这次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44人。虽然其中有一些人是在枪战中中弹，但联邦政府和一些人权组织都认为，处决和毙命还是发生得太多了。^⑥而最近一年，在维稳过程中，类似打击违法组织的行动已经在里约成为一种常态，许多军队级别的“扫荡”常被用在贫民窟以清除各种毒梟，取而代之的则多是随风飘扬的巴西国旗和着装统一的警察。

2007年泛美运动会成为巴西国内对计划、修建以及承办等各方面的模板。与此同时，整个国家还利用多元化的电视技术为当地观众呈现了宏大的场面，再加上一些媒体的“阿谀奉承”和政客们的“保驾护航”，这届泛美运动会无疑是成功的。至于经济方面，这场盛宴依仗巨额花销，而其中一些公共财产也不出意外地成了私人物品。即便如此，这里还是不会产生什么有意义的民主协商，也不会找回下落不明或浪费的资金，那些所谓“奥运会后的遗产”更是无稽之谈。当然，以上这一切在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甚至远没有阿莱芒街区的问题严重，所以，这也不会影响巴西得到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其实在正式得到主办权之前，巴西就得到过官方消息，申办不成问题。因为德国与南非在2006年世界杯承办比拼中制造了诸多问题，且最终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国际足联为了息事宁人，于是在此后一度决定采用各大洲轮流举办的原则（目前这条规则又被弃用了）。由此一来，2010年世界杯原则上被确定在非洲举办，而南非便顺理成章地拿下承办权，至于2014年则被定在南美洲，起初，哥伦比亚在2006年也有过申办的想法，但是因为一些“潜规则”和“不能说的秘密”，哥伦比亚相较巴西完全占不到任何优势。最终在2007年，哥伦比亚宣布退出申办，巴西不战而胜。

其实，收获主办权绝不是结束，通过各个申办城市也足以看出一届赛事中政治起到的重要作用。国际足联曾经明文规定，世界杯的承办城市应该在8个到10个之间，但巴西却一直坚持需要12个。如此一来，在巴西这个存在“州”的国家就出现了无法回避的逻辑问题，很多球队要从小组赛开始就跋山涉水，在巴西上空飞来飞去。不过最终，12个城市、12座球场的事实没有改变，很多国家注定要被涉及其中，而与此同时，许多赞助和品牌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政治庇护所。在圣保罗，世界杯球场的第一选择本来是翻修之后的莫隆比体育场——圣保罗队的主场，但是在该俱乐部主席胡文西奥与时任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多番政治博弈后，一座全新的、更加昂贵的且是为科林蒂安修建的球场将横空出世，抢走了这里的世界杯氛围。再看巴西的东北地区，这里曾是卢拉的政治要塞，也有4座城市得到了世界杯的承办资格，其中福塔莱萨（塞阿拉州首府）更被赋予了承办6场比赛的优先权，包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而这些背后，是因为塞阿拉州的州长西德·戈麦斯一方面是卢拉以及罗塞夫的知名盟友，同时他也借此对怀有总统野心的伯南布哥州一把手爱德华多·坎波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继续看向巴西北部——玛瑙斯和贝伦，作为前亚马逊州州长的爱德华多·布拉加正处于仕途上升期，他很有希望坐上参议院的头把交椅。同时，作为贝伦所在帕拉伊巴州的州长，卡尔帕同样觊觎着参议院的竞选。最后，这场申办之争还是以贝伦不敌玛瑙斯告终。

作为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政府上下都期望得到一座新球场，但最初的计划，只是建造一座容量为4万人的中型球场，并在世界杯后分配给当地的小球会，也使得世界杯遗产更容易被继承，而按照这个设想，巴西利亚政界人士关于“在本地举办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想法就要泡汤了——至少需要一座花销更大、容量为7万人的球场，当然，第二个建议最终还是被采纳了，只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少有人知晓。至于承办城市中最大的争议，还是针对库亚巴。作为马托格罗索州的中心城市，库亚巴虽然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却还未拥有哪怕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不过，在老牌州长马吉、全国最大的大豆制造商以及劳工党部

分政要的努力下，世界杯还是来到了库亚巴。

不只是这些城市，巴西与国际足联的关系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杯赛常用法规》是巴西政府专为世界杯制定的框架法规，也是国际足联要求承办城市必须签署的文件——为了保护国际足联的利益，这个法律可以直接优先于国家法律，就像一些税务法案。而在世界杯开打之后，其中一些条款和要求也需要“特事特办”。举个例子，在一些隐秘市场营销和当地比赛中，必须保护国际足联赞助商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引起广泛争议的案例：国际足联坚持合作伙伴百威啤酒可以在世界杯球场内进行售卖，但是早在2003年，巴西政府就禁止在体育场内销售酒精饮料，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再有，就是巴西方面希望为学生和年轻人提供一些打折票或特价票，但这个设想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问题还不止这些，国际足联与巴西总统罗塞夫对巴西的签证规定以及移民法都持有不同意见。综上所述，以上种种争议目前仍然没有定论，就像一个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在国际足联所有微观规则中，也许最具杀伤力的莫过于因为南非世界杯上的嗡嗡祖拉而诞生的“禁止携带音乐器具进场”的规定。不过，巴西各方仍然一直在为“推翻”这条规则而努力，然而，尽管这些乐器既便宜又容易演奏，还是统统被国际足联禁止了。众所周知，音乐和足球是社会上联系最紧密的一对事物，然而它们却在国际足联这里变成了可怕的祭品。那么，如果非要在联合会杯上寻找一些音乐的踪迹，或许只有大材小用一下“直流/交流”乐队的《地狱的钟声》，抑或索尼音乐公司推出的瑞奇·马丁最新世界杯主题曲了吧——但这确实不太搭调。

其实，与主办城市达成协议、让他们签署诸项条款并不是难事，新球场的资金筹集和修建过程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除此之外，政府通过的大型项目且与本届世界杯相关的还包括多座机场的重新翻修、交通控制系统的革新、里约和玛瑙斯的铁路修建、高速公交道路的整合以及更新大桥、高速公路的照明设备。如此繁重的议事日程本就需要缜密的方案和计划，然而一名巴西方面的相关人员却无奈地说道：“我们在2007年10月赢得世界杯主办权，但直到2010年1月都没有计划过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甚至在2008年和2009年，我们几乎一事无成。外界可能会认为我们缺钱、缺决心或能力不够，但我们真正缺乏的还另有他物。”[☞](#)正因如此，一些在初期制定的交通改革计划因为时间问题而被迫取消，其他一些下马的工程有的是因为存在腐败问题而被司法干预，还有的则是受到该地成千上万名住户的强烈抗议而无法推进。

至于那些推进的工程项目，在过程中也是走走停停、进度缓慢。2013年中旬，无论是里约还是圣保罗，两地的机场翻修计划都没有按照预期计划进行，且远远落后于既定时间表——以至于棚顶的修建只能推延至世界杯后。在巴西利亚，虽然机场工程按时开工，但是在2011年还是一度暂停——法院认定相关负责人的违规操作导致了花销大幅超过预算。而玛瑙斯方面，也搁置了单轨铁路以及巴士线的修建。在距离巴西世界杯开幕仅有整整一年时，只有一座城市做好了准备迎接这场豪门盛宴——萨尔瓦多，一个没有任何改建工程的地方。与此同时在福塔莱萨，一项项工程还是镜花水月，丝毫没有开启的迹象。

即便没有映衬在奢华背景下的停工，球场修建的故事还是各不相同，这也促使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2014年1月接受一家瑞士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道，巴西是在其任期内在世界杯准备工作方面进展最为缓慢的国家——那时四座球场的修建工程迟迟没有完工，再加上帕拉尼亚州库里蒂巴的工作进展最为缓慢，恐怕到时候游客们只能寄希望于用上临时厕所了。试想一下，即便这些球场疯狂地按时交工、开放，超出预算也会是不争的事实——单是所有球场的花费就达到35亿美金。根据巴西国家审计法院的计算，巴西在2014年世界杯准备工作中的公共开销将是135亿美金，成为历史上最贵的一届世界杯，而这个数字也足以支付巴西每个家庭两倍以上“家庭津贴”。

倘若要挑出最能反映巴西世界杯准备工作情况的项目，非个体基础设施这一项莫属，而最具公众代表性的，就是里约市马拉卡纳球场的翻修工作。20世纪90年代，为了承办2000年首届世俱杯，历史悠久的马拉卡纳球场经历了第一次整修——那个大型杂草盒子终于变样了，部分底层人士也享受着由自己捐助而出现的入口和安检设施。同时，一系列的整改还让马拉卡纳登上了新台阶，过往球场内猛烈的空调也被调至合适的温度，而更高级的看台则被塑料椅填满，但容纳人数也从175000人下降到10300人。2005年，翻修后不久的马拉卡纳球场再度关闭，随即开始为两年后的泛美运动会经历又一次整修。这一次的整修不仅是针对外表，其中既涵盖了马拉卡纳一直存在的积水问题——由于球场本身就下陷于地表，一旦下雨，很容易造成积水，也包括了著名的Geral看台。对于马拉卡纳而言，完全属于草根的Geral看台历史意义非凡，作为一个站台，由于其同样属于下陷状态，所以球迷们很轻易就能够翻进球场，然而在这次翻修过程中，Geral看台最终成为历史的符号。此外，虽然球场负责方许诺会增设较低票价的座位，但是如今看来，这些座位的票价至少要比当年的Geral看台贵了10倍——出自公共资金的巨大投入最终还是没能“用之于民”。

马拉卡纳绝不仅仅是一座球场，它也是一系列公共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在足球场附近，还有一个漂亮的迷你竞技场——小马拉卡纳以及一个小型田径场和一个游泳馆，几十年来，它们都被用来进行校园活动或为公众使用。另外在一旁，还有一个被认为是该城市中最好的小学以及一个19世纪的殖民时代建筑阿尔代亚马拉卡纳——它被称作印第安人博物馆。对里约热内卢当地人和整个国家来说，马拉卡纳除了是一座恢宏的建筑，更是历史记忆的承载，它象征着民族价值观，也是巴西人自豪的源泉，当然更代表着这个国家对民主主义的追求。

2009年，为了世界杯，马拉卡纳体育场进行了第三次翻修，当然，这次可容不得半点差错：足球和建筑部门把体育场的古老元素消除得一干二净。整个翻修计划其实并没有得到正规渠道的许可，翻修后的体育场与周围建筑极不搭调。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在违反巴西法律，但是却没有人站出来为其负责。学校、田径场和游泳馆本来都要被拆除，而且没有任何重置计划。最终，大批民众的抗议让学校得以保留，但是两个小型体育场馆都被关闭，田径跑道也遭到破坏。2013年的一条法律禁令在最后时刻挽救了田径场旁的宏伟看台，现在它的下方是一个临时停车场和碎石堆。世界杯期间，这片乱象恐怕很难被遮盖住。

20世纪70年代末，印第安人博物馆其实已经被转移至博塔福戈，20多年来，阿尔代亚马拉卡纳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无人看管。直到2006年，巴西人才将它重建一新。经过几年的建设，印第安人本已在此安居乐业，但它终究逃不过被移除的命运。当局称这是国际足联下达的命令，因为这里将被用来当作马拉卡纳体育场的紧急出口，而且它还会是巴西奥林匹克博物馆的新址。但他们的话不能完全相信，就像一位前国际奥委会巴西委员所说：“里约热内卢政府想让这座城市焕然一新，显然印第安人是其中的不和谐因素。这是高层的一种种族隔离行为，也对巴西造成了伤害。”^[8]2013年年初，在市政府与居民谈判期间，武装部队利用胡椒喷雾、催泪瓦斯、橡胶子弹等武器强行从手无寸铁的百姓手中攻占了这座建筑。里约负责体育休闲的副市长甚至还挖苦道：“真正的印第安人应该住在热带雨林里，对吗？”^[9]2014年1月，法院下令保留这座建筑，一小拨印第安人才得以重新拥有了自己的家。

在所有变动中，对建筑的破坏和文化的亵渎行为无疑最不可饶恕。一度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壮观的足球场，马拉卡纳如今只是自己前身的一个拙劣的仿制品。曾经的双层看台结构被单层看台取代，从前透过马拉卡纳的顶层看台和顶棚之间的缝隙，人们可以欣赏到里约热内卢美丽的天空，但现在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原本华丽的屋顶已经被一片施工架取代。原来场地、看台和顶棚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360度角的美观画面，但如今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只有丑陋的支架下悬在空中的四个大屏幕。实际上，这些大屏幕只是用来掩盖瑕疵的，它播放的是精心摄制的看台画面，以造成体育场座无虚席的幻觉。

“淘汰赛”是一份将马拉卡纳私有化的计划，在为其投入了超过10亿雷亚尔的公款后，政府还是决定将这个棘手的任务交给私人完成，接下这个任务的机构在30年的租期里只需要承担很小一笔折旧费（不超过20%）。尽管他们还要负责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体育场改造工作，但其实没有人会强制他们做什么。不出所料，这项工程被交给IMX、欧德布莱克特公司和AEG三大公司联合完成。IMX是巴西最大的富豪之一艾克·巴蒂斯塔主要控股的公司，他主要负责研究私有化的经济可行性；欧德布莱克特公司是一个大型建筑公司，它与劳工党有密切的关系；AEG是美国的一家“娱乐集团”，它主要负责经营世界范围内百余座不景气的体育场。2013年4月，当完工的体育场向媒体和公众开放，准备迎来接下来的联合会杯的时候，遭到了看台上抵制私有化分子的抗议。警方再次动用了催泪瓦斯，全球媒体对此都没有进行什么报道。

III

联合会杯是由沙特人发起的。沙特建造了世界上最宏伟却又未被充分利用的法赫德国王球场，为了让足球少年不再无趣，同时也为了足球外交的需要，沙特人在1992年创办了法赫德国王杯。比赛在沙特国家队和世界上最好的几支球队之间举行，而主办方则负责承担全部差旅费用。1995年和1997年，该项赛事继续举办，沙特人一直在试图邀请各大洲的冠军（欧洲杯、亚洲杯等）的冠军球队参与其中。2001年，这项赛事正式交给了国际足联承办，从那时起，它也变成了4年一届，为下一年世界杯进行演练的固定赛事。2001年的日韩、2005年的德国和2009年的南非都没有出什么岔子，巴西当然也不希望成为例外。

然而从2012年秋天到2013年初，巴西民众一直流露着不满的情绪。世界杯和奥运会人民委员会则一直是反对声音中的主要力量，他们主要针对的是世界杯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浪费和腐败现象，他们召集了3000多人在马拉卡纳进行游行示威，抗议球场私有化。与此同时，公共交通的涨价也引发了“免费搭车运动”组织的抗议声，2012年末，他们曾在纳塔尔焚毁巴士引发骚乱。2013年3月，当阿雷格里港宣布巴士涨价的时候，也引发了同样的动乱。5月，更大规模的暴乱在内陆城市戈亚尼亚爆发，但巴西媒体同样未予过多报道，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国家的媒体了。

6月6日，距离联合会杯开幕仅剩6天，“免费搭车运动”组织开始在圣保罗游行抵制巴士涨价，他们堵住了包括保利斯塔大道在内的多条城市主干道。这显然造成了很大影响，警方一如既往动用了大量警力，尽管媒体将此形容为一场反社会暴乱，但是示威者面对残暴的警察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却吸引了更多支持者加入他们的阵营。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私人联络以及媒体宣传，示威活动每天都在圣保罗有组织地进行着，他们甚至还得到了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和贝洛奥里藏特上千名群众的支持。而且，他们谈论的不再仅仅是涨价问题，他们的口号和标语开始针对这个国家令人感到绝望的教育和医疗系统，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警察的滥用职权……尽管如此，抗议之声也只是星星之火，是足球将其发展为燎原之势。

6月15日，东道主巴西与日本在巴西利亚展开了联合会杯的揭幕战。在离体育场不远的地方，抗议者举着类似“医疗？教育？不！这里一切都是为了世界杯”的标语进行游行，防暴警察不得不用胡椒喷雾和橡胶子弹驱散人群。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进行开幕致辞期间，体育场内遍布嘘声。布拉特试图回应观众：“公平竞赛精神体现在哪里？”但这却招致了更大的嘘声。巴西总统罗塞夫下一个登台，她同样引发了嘘声，观众甚至在看台上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标语。此时此刻，弥漫在巴西街头的种种不满集中爆发了。竞技体育将全世界的目光带向了巴西，之前的不和谐声音再也隐藏不住。主流媒体仍将那些抗议者描写成极端主义者，巴西足协依然打着“让足球回家”的旗号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支持他们的国家队。但是终究纸包不住火：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大，媒体的宣传力度越来越充分。足球本是最令巴西骄傲的东西，现在它却将这个国家最丑陋的一面暴露出来。

两天之后，各种大规模游行在巴西全国20座城市内展开，光是圣保罗就有超过65000人参与其中，里约热内卢的参与者更是超过10万人。一小撮人袭击了巴西法院，警方则动用了武力还击，事后他们还试图用“反暴动”的借口来解释自己的武装行为。在巴西利亚，抗议者爬上了国会大楼的屋顶；在阿雷格里港，示威者点燃了一辆巴士；而在库里蒂巴，人们试图闯入政府机关——在警方眼里，这些骚乱就像是武装起义一样严重。6月19日，巴西在福塔雷萨对阵意大利，25000人的游行队伍直接涌向球场，他们也一如既往地遭到了警方的暴力制止。

6月20日，示威游行活动达到高潮。从位于秘鲁边境的里约布兰科，到2000英里外的阿雷格里港，包括每一个州首府在内的120个城市内都发生了暴动。里约热内卢，至少有30000人集中起来，但再次招致了警方的残暴对待。瓦格斯总统大道上疯狂的人群遭到了催泪瓦斯和炸弹的袭击，人们乱作一团。骚乱中，不少人闯入街边的小店躲避。一名目击者回忆道：“警察就像暴犬一样散布在大街上，他们用枪指着每个人的头。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向餐馆里投掷催泪瓦斯。”⁽¹⁰⁾手工制作的招贴和横幅随处可见，内容多种多样，有“这不只是公交涨价，这是民众无法忍受腐败的呐喊”，有“千万种理由让我们这么做”，有“国际足联滚蛋”、“婊子养的FIFA”，还有“巴西，醒醒吧！一个教师比内马尔更值钱”。而在公交车站和地下通道，到处都散布着这样一句话：“世界杯杀死了穷人。”

6月21日，巴西总统罗塞夫终于坐不住了，她在电视上发表演说，赋予了民众抗议的权力，并承诺调低公交价格、从古巴引进更多医生填补医疗空缺，将石油收入投入教育事业，并控制世界杯的支出。虽然这样的承诺不算什么，但足以平息民众心中的怒火。巴西国会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相关立法，同时还撤销了引起颇多争议的有关腐败和同性恋的提案。

此后，抗议虽依然存在，但声势已减弱不少。当巴西在半决赛击败乌拉圭后，12万群众从贝洛奥里藏特市中心游行至米内罗竞技场。人们占领了法院，而在大家通常用来庆祝巴西队胜利的塞特普洛广场，在催泪瓦斯弥漫的夜空中，广场中心30多米高的方尖塔已经变得模糊不清。5天之后，在里约热内卢的决赛之夜，又有5000人游行至马拉卡纳体育场，在那里防暴警察已经严阵以待。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专业医疗人员提供帮助，只有6名学医的学生志愿者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6架直升机在狭窄的街道上空盘旋，当体育场内奏响巴西国歌的时候，场外却混杂着催泪瓦斯手榴弹的爆炸声、防爆盾牌的击打声以及直升机桨叶的盘旋声。巴西最终3比0赢得了比赛，人群则在骚乱中一哄而散……

⁽¹⁾ 国际足联审判室主席约阿希姆·埃克特关于ISL案件审查的声明，2013年4月29日，第3页

⁽²⁾ D·康恩引用，“国际足联腐败阴谋愈演愈烈，巴西人里卡多·特谢拉辞职”，《卫报》，2012年3月12日

⁽³⁾ 罗瑟引用，“对于泛美，最激烈的比赛是起跑线开始的”，《纽约时报》，2007年5月22日

⁽⁴⁾ T·P·R·卡尔代拉，《围墙之城：圣保罗的种族隔离与公民身份》（City of Walls: Segreg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São Paulo），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8页

⁽⁵⁾ R·德·阿尔梅达引用，“巴西：城市战争下的阴霾”，《公开民主》，2007年7月18日，详见：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brazil_shadow_urban_war

⁽⁶⁾ 这正是联合国大会的看法。详见《关于法外处决、总结以及任意处决的报告》，菲利普·阿尔斯通，A/HRC/14/24/Add.8

⁽⁷⁾ 何塞·罗伯托·贝尔纳斯科尼，被A·道尼所引用，“随着巴西世界杯的临近，公共交通的麻烦也日益增加”，路透社，2013年3月5日，详见：<http://uk.reuters.com/article/2013/03/05/soccerworld-brazil-idUKL1N0BW1DL20130305>

⁽⁸⁾ 阿尔伯托·穆雷·内托，J·安德森引用在“马拉卡纳之战”中，2013年5月10日，详见：<http://www.playthegame.org/knowledge-bank/articles/the-battle-of-maracana-5598.html>

⁽⁹⁾ 同上

⁽¹⁰⁾ C·加夫尼，“没有更多的欺凌”，2013年6月21日，详见：<http://www.geostadia.com/2013/06/chega-de-bullying.html>

尾声 2014年2月

在联合会杯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民众抗议的精神得到了传承：7月的大罢工蔓延至10个州，巴西最繁忙的港口桑托斯也不得不闭关歇业。在大多数城市里，公共交通也都处于瘫痪状态。教师和医生纷纷涌上街头，媒体武士组织成员——一个专为联合会杯成立的媒体组织对民众的活动进行了拍摄，并放在网上播出。同时一些小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比如“黑色集团”，也在制造各种麻烦。在圣保罗，巴士被焚毁，地铁也因为人为破坏而停止运营，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活动组织也在不断施压。2013年9月，巴西和澳大利亚在巴西利亚踢了一场友谊赛，却招来了一场抵制游行，直到警方动用催泪弹才驱散了抗议的人群。10月，当国际足联秘书长杰罗梅·瓦尔克视察库亚巴迟迟未能完工的潘塔纳尔竞技场的时候，也遭到了抗议。一些贫民区的抗议活动取得了小规模胜利，关于马拉卡纳体育场私有化的提议也暂时终止。

对于一些乐观主义者来说，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变化即将来临。2005年，前巴西总统卢拉差点因为贿选丑闻下台，幕后策划者就是劳工党的政要们。在他们的施压下，巴西最高法院对包括卢拉的总参谋长若泽·迪尔塞乌等贿选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

其实，报道最为广泛的抵制还是来自足球本身。在巴西国内联赛赛场上，有些球员会在比赛中做出一些反抗举动。比如当开场哨吹响后，他们只是在原地静坐一分钟，或者漫无目的地将球传来传去，甚至全部22名球员背对观众在中圈围成一个圆圈。这些球员也有自己的组织——FC常识。这是几个老球员联合成立的组织，它迅速吸引了超过1000名成员加盟。他们最大的不满源自联赛赛程表。2013年的比赛本就已经塞得很满了，没想到2014年的赛程更糟，一切只是为了给世界杯让路。也就是说，从2013年赛季结束到2014年赛季开始，球员们只有不到一周的假期，这对球员的身体和心理都将造成很大程度的消耗。此外，“FC常识”还威胁，如果航海俱乐部的球员们再拿不到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的薪水，那他们就将发起全国范围内的球员罢工。就像6月的抗议活动一样，球员们自发团结在一起收获了更强的自信，他们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比如要求巴西国内足球财政透明，以及在足协内部安插一名球员代表。但是巴西足协甚至没有给他们商量的余地，完全没有把球员放在眼里。

如果说关于卢拉贿选丑闻的审判和“FC常识”的出现都表明足球王国正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的话，还是有更多反例冒出来。曾有100名科林蒂安死忠球迷闯入俱乐部的训练基地，他们用自带的钳子夹断了铁丝网，与球员和教练发生了肢体冲突，以斥责他们在球场上的糟糕表现。而一直代表着平民的弗拉门戈俱乐部，则以低于正常票价20多倍的价格将巴西杯决赛门票卖给球迷。但是，世界杯期间酒店和国内航班的价格都高得离谱，巴西政府不得不把航空公司和旅游产业的相关人员召集起来，防止哄抬物价。此外，弗卢米嫩塞则再次逃过了降级的悲剧，可怜的葡萄牙人队则成了替死鬼。

世界杯球场施工计划大大落后于预期，库里蒂巴、圣保罗、玛瑙斯的球场能否按期完工都是未知数。施工不得不加快速度，但同时危险也在悄然降临。去年11月底，一台大型工程起重机正要吊起圣保罗伊塔克隆球场顶棚的最后一个部分，但是它却突然掉了下来，重达420吨的石板砸穿了顶棚，还造成了两人死亡。之后，还有报道称起重机司机被要求连续工作好几个星期，却没有一天休息。在玛瑙斯，漫长的雨季延迟了球场顶棚的完工日期，一名叫作梅洛·费雷拉的工人因为安装球场灯光而从30米的高空坠落身亡。巴西劳工部指出玛瑙斯球场的建设已经违反了64条劳工法中的63条，但巴西体育部长阿尔多·雷贝洛却依然很乐观：“在婚礼上，新娘百分之百会迟到，但是我从没听说婚礼会因此而终止。”^[1]

2013赛季的最后一个比赛日，达伽马对阵巴拉纳竞技。巴拉纳竞技位于库里蒂巴的主场正在为世界杯而重建，由于球场迟迟没能完工，该场比赛不得不改在圣卡塔琳娜州的若茵维莱进行。达伽马的死忠球迷

是2013赛季全国最火爆的球迷，他们曾在球队输球后进入更衣室，还擅自闯入球场。由于达伽马需要一场胜利才能避免降级，又考虑到以他们的实力很难赢球，于是赛事主办方没有在球场安排任何警力，自然也没能有效隔开双方球迷。当达伽马0比1落后时，看台上的骚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达伽马的球迷首先寻衅滋事。在全国电视直播中，双方球迷冲突不断升级，直到警方介入，使用催泪瓦斯才控制了事态。比赛重新开始后，达伽马还是没能找回状态，最终以1比5失利。但他们却对比赛结果提出了上诉，认为比赛长时间的中断影响了他们的发挥。达伽马俱乐部的作为当然很可笑，但这个凄惨故事背后还有很多发人深省的东西：巴西球迷有着根深蒂固的暴乱情结，但是各级足球部门却从未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不用说去解决它。俱乐部只会因此受到轻微的处罚，政治家谈及此事时永远是陈词滥调。

几个星期后，巴西政府宣布为了应对世界杯期间可能面临的抗议活动，将斥资10亿美元用于加强安保力量，同时还将设置1万名精英警力遍布在全国各地。政府甚至还宣称，将按照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标准训练这批警察。也许他会像巴西武装力量一样前往海地集训，也许他们要学会镇压在里约的贫民区发生的枪战和示威，也许他们要从圣保罗警方手中抢班夺权，后者曾在2月初的一次镇压游行中开枪打死一名示威者。这件事在巴西国内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更不用说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讨论了。当2014年6月12日到来的时候，让我们看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

就像米尔顿·纳西门托所唱，巴西也许仍然是足球王国，但是当他们的国家队在比赛时，这个国家早已不是万人空巷的场景了。也许在球场上，巴西依然是赢家，但是很难想象他们还能像过去一样用足球团结起整个国家，因为他们的胜利是以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代价换来的。长远来看，我们当然希望这是真正的成功，而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¹⁾ BBC新闻中的引用，“巴西世界杯：揭幕战场馆‘四月中旬就绪’”，2013年12月5日，详见：<http://www.bbc.co.uk/news/world-latin-america-25244199>

参考书目

M·阿尔维托, 2007年, 《我们也分一杯羹: 巴西足球及全球化》, 足球与社会, 第8辑第4期, 第524-544页

P·安德森, 1994年, 《巴西欢乐的黑暗面》, 伦敦书评, 第16辑第22期, 11月24日

作者同上, 2002年, 《卡多索的遗产: 卢拉的继承》, 伦敦书评, 第24辑第24期, 12月12日。

作者同上, 2011年, 《卢拉的巴西》, 伦敦书评, 第33辑第7期, 3月31日

A·贝约, 2002年, 《足球: 巴西人的生活方式》, 伦敦: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R·卡斯特罗, 2004年, 《加林查: 巴西被遗忘的足球英雄的狂喜与悲剧》, 伦敦: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M·居里, 2008年, 《桑巴、女孩和聚会: 谁是世界杯上的巴西球迷? 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的人种志》, 足球与社会, 第9辑第1期, 第111-134页

M·居里、J·尼基克和G·马什卡雷尼亚什, 2011年, 《2007年里约热内卢的泛美游戏: 金砖国家的体育大事件带来的结果》, 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第46辑第2期, 第140-156页

C·加夫尼, 2013年12月, 《游戏开始: 巴西足球社会变迁的挑战与可能性》, 体育与社会问题期刊 (0193-7235)

C·T·加夫尼, 2008年, 《土地神之庙: 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大地上的球场》, 奥斯丁, 德克萨斯: 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

C·戈登和R·埃拉尔, 2001年, 《巴西足球危机: 展望21世纪》, 体育历史国际期刊, 第18辑第3期, 第139-158页

A·汉密尔顿, 1998年, 《一场完全不同的比赛: 英国对巴西足球的影响》, 爱丁堡: 主流出版社

B·布瓦尔克·德·荷兰达, 2003年, 《足球探索: 何塞·林斯·多·雷戈的体育现代主义、地区主义以及激情》, 研究生论文, 历史社会文化毕业项目, 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

J·尼基克, 2013年, 《性别平等愿景: 巴西球场上未经测试的可行性》, 运动与社会问题, 第37辑第1期, 第8-30页

J·尼基克和P·霍顿, 2013年, 《“只有漂亮女人需要申请”: 巴西足球的人权与性别》, 研究的创造性方法第6期, 第60-70页

J·S·莱特·洛佩斯, 1997年, 《“多民族”的成功与矛盾》

《巴西足球》，出自G·阿姆斯特朗和R·朱利安诺蒂（编辑），《进入球场：世界足球新透视》，牛津：伯格出版社，第53-86页

《巴西式足球及其两难境地》出自G·阿姆斯壮和R·朱利安诺蒂（编辑），1999年，《足球文化及特性》，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第86-98页

《人们欢乐的消逝：足球队之死引发的思考》出自G·阿姆斯壮和R·朱利安诺蒂（编辑），2000年，拉丁美洲人类学杂志，第4辑第2期

J·勒维，1995年，《足球疯狂：巴西对世界上最受欢迎运动的热情》，第二版，展望高地，伊利诺伊州：韦弗兰出版社

R·莱文，1980年，《体育与社会：巴西足球案例》，巴西文学书评，第17辑第2期。

J·S·L·洛佩斯，2000年，《巴西足球起源的阶级、种族及人种》，戴达罗斯，第129辑第2期，第239-270页

作者同上，2007年，《通过巴西足球形成的国民身份转型：从两场历史性败北中学到的》，出自R·米勒和L·克劳利（编辑），《足球在美国：足球（西班牙语），足球（葡萄牙语），足球（美式英语）》

T·曼科和C·尼龙，2005年，《涂鸦巴西》，伦敦：泰晤士和哈德逊出版社

T·曼科，1995年，《人们的热情：足球在南美》，伦敦：维尔索出版社

V·德·梅洛和J·曼根，1997年，《财富之网：里约热内卢19世纪文化中的现代体育》，体育历史国际期刊，第14辑第1期，第168-173页

L·佩雷拉，2000年，《足球狂热：里约热内卢的足球社会史，1902-1938》，里约热内卢：新前沿出版社

M·罗德里格斯·费里奥，1964（1947）年，《巴西足球中的黑人》，里约热内卢：巴西文化出版社〔吉尔伯托·费雷雷作序〕

M·舍茨，1988年，《苏格拉底、科林蒂安和民主与公民问题》，出自J·阿尔贝那（编辑），《拉丁美洲的体育与社会：传播、依赖和大众文化的崛起》，维斯波特，康涅狄格州：普雷格出版社，第97-112页

作者同上，1989年，《在巴西踢足球：苏格拉底、科林蒂安和民主》，威尔逊季刊，第13辑第2期，第119-123页

T·斯基德莫尔，1967年，《巴西政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作者同上，1988年，《巴西军事统治政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作者同上，2010年，《巴西：五个世纪的变迁》，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C·泰勒，1992年，《美丽的比赛：拉丁美洲足球之旅》，伦敦：维克多·格兰仕出版社

S·法蒂尔和L·莫朗，2003年，《巴西女性足球：进程和问题》，足球与社会，第4辑第2-3期，第254-267页

J·杨，2012年，《“远角”：巴西东北部足球是如何力争赶上南方巨人的》